

西安五交業
第二次國共合作

胡宗南

陈元方 史础农 编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长城出版社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西安事变
第二次国共合作

胡宗南

陈元方 史础农 编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长城出版社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说明与勘误

本书因出版时间仓促，未经中央有关方面审查，加上校对的粗疏，缺点和不安之处在所难免。现作为征求意见稿，内部发行。敬希读者及了解历史情况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勘误表

页码	行数	误	正
9	2	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931年任潼关行营主任、1932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5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1	4	1890年	1894年
11	5	1905年	1904年
11	5	营口等地。	营口等地。翌年，强迫清政府订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
12	5	30万部队	14万部队
12	7	被断送净尽	大部被断送
16	5	息与全国	息在三个条件（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之下与全国
17	1	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等，首先发动群众	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发动群众，
17	8	1933年冬，	1932年1月3日，
18	5	泰来江桥	嫩江江桥
24	2	5.5万名	3.5 万名
32	8	势力	实力
32	右图	胡宗南（1902—1960）	胡宗南（1902—1962）
32	16	浙江吉安县人	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
32	左图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	国民党甘肃、陕西省政府主席。
33	2	井岳秀（5）	杨永泰（5）
34	1	百万大军	数十万部队
35	4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35	3	及其所领导的抗日红军，	和中华苏维埃政府
36	6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37	6	第一方面军	第一方面军（陕甘支队）
40	1	徐向前（1935）	徐向前
40	下图	有损误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一册（537）图
41	1	第15军副司令员徐海东	第25军军长徐海东
42	3	1月1日，	1月13日，
46	7	龚明贤	龚贤明
49	3	革命纪念馆	革命纪念堂
53	2	杨左第三人为赵寿山，第五人为韩卓儒	杨左第二人为孙蔚如，第四人为邵力子，第六人为赵寿山，第八人为王宗山，第十人为韩卓儒
59	7	上海政府	上海市政府
66	6	“博鹰”	“波音”
66	例3	王普涵	×××
66	例1	龚明贤	龚贤明
70	例1	高桂滋	井岳秀

页码	行数	误	正
70	倒1	井岳秀	高桂滋
71	倒1	井岳秀	杨永泰
71	倒2	1935年10月6日在榆林	1934年10月在西安
74	13	山西洪洞人	山西赵城人
75	1	1935年2月	1935年12月
86	3	安内必攘外	攘外必先安内
94	11	即东征宣言	(删去)
98	6	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	侍从室主任钱大钧
102	2	蒋介石(岗亭前)杨虎城(戴眼镜左)、张学良(右起三)。	左起:蒋介石、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
103	8	缺行	蒋介石后为刘峙。
107	图2	傅作义、汤恩伯	傅作义
110	6	折衡	折冲
119	10	你们的要求	“如果我迟来一会儿,今天你们不知要死多少人。你们的要求,
121	21	就宴	设宴
122	33	在止园	在新城公馆
123	5	甘肃固原	甘肃固原
125	7	我一定	我们一定
125	8	我仍	我们仍
131	9	河北蠡县人	河北宁河人。
133	10	杨虎城机要秘书	杨虎城部秘密电台“破译”工作主要人员
138	3	电经刘鼎发出。	电经刘鼎于12日晨扣蒋之后发出。
146	6	等将军	将军等
150	图二	第一号报头	第二号报头
161	17	我们是谒城	我们是竭诚
162	8	杨发震	杨法震
165	图4	共产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77	倒2	李百朋	李百朋
177	倒1	李士擲	李擲
181	右下	崔廷儒(1937)	张中(1937)
183	10	“9·18”之前两日即9月16日的《铣电》	“9·18”前一个月即8月16日的《铣电》
183	11	挑衅	寻衅
184	5	世甫(张信中的世甫系笔下之误)	时甫
185	1	赵一获	赵一获(赵绮霞)
202	10	重大	重要
232	上图	后排左起:申明申、周梵伯、李子健。	后排左起:李子健、机要秘书周梵伯、侍从副官申明甫。
233	3	阎揆要	阎揆要
233	4	韩子芜	韩子芳
241	4	杨虎城、刘守中	刘守中、杨拯中(杨的孩子)
241	8	突荫三(3)	突荫三(2)
241	9	傅剑涛(8)、李百朋(11)	刘剑涛(8)、李德生(11)
241	12	韩望尘(杜右2)、王捷三(杜右3)	韩望尘(杜右1)、王捷三(右2)
242	3	亢心裁	亢心裁
242	13	已五个月	已四个月
244	6	亢心裁	亢心裁
246	11	秦丰川	秦丰川
后记	倒5	崔廷儒	李锐
后记	13	解放军画报社	解放军画报社、临潼华清池管理处

西安事变
第二次国共合作

胡宗邦

陈元方 史础农 编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长城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序言	7	黎明的枪声——西安事变爆发	122
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学良杨虎城	8	张学良、杨虎城发表对时局宣言	136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我国		南京的震惊、混乱、分歧与明争暗斗	139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1	沸腾了的西安	140
蒋介石瞩目西北	32	“兵谏”后的重大措施	150
红军长征到达西北	34	“讨伐”与反“讨伐”的斗争	156
为策划截击红军 蒋介石第一次来陕	43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来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	54	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	164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58	西安谈判	168
张学良与东北军又被驱上西北内战战场	65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71
为“围剿”初到陕北的红军 蒋介石第二次来陕	69	西安事变前后的中共陕西地方党	178
中国共产党同杨虎城、17路军的合作	74	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	182
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东北军的合作	78	抗议南京扣押张学良和挑动新的内战	190
为联共抗日而斗争	85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202
红军东征	94	西安事变后陕西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208
为策划更大规模内战 蒋介石第三次来陕	98	杨虎城被迫离军出国	232
蒋介石在洛阳36天	103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继续谈判	248
妄图最后消灭中国共产党与红军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	257
蒋介石第四次来陕	111	抗日战争开始	261
“12.9”运动一周年 西安学生大请愿	114	纪念西安事变	279
“山雨欲来风满楼”	119	后记	283

序 言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的联合发动者是中国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兼代总司令）、杨虎城（时任17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主任）两将军。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乃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对我国侵略和我国人民长期要求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当局长期内战的伟大斗争的必然产物。在那国难日亟、内战日炽、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在大变化大转折的前夕，什么事件都会爆发的，不爆发这样的事件，就爆发那样的事件；不在这里爆发，就在那里爆发。它不是任何人物的任何意志所能转移的。

1936年，我国历史已经处在一个大变动大转折的前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联红抗日，国共合作，已成为历史

潮流。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依然背离历史潮流，坚持其对内对外的误国政策。

1936年，蒋介石由南京到洛阳，来西安，又由西安去洛阳，再由洛阳来西安。他一面威逼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一面调兵遣将，把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精锐部队约30个师，摆在平汉铁路的武汉——郑州段和陇海铁路的郑州——灵宝段，把国民党唯一的装甲部队调到豫西。他下令扩大西安、兰州两地机场，陆续集中了用麦棉借款购得的100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他把南京的一批党政军大员调集在西安待命。他还亲自飞往太原、济南等地，安抚一些地方军阀并策动他们反共。他还通过外长张群，驻日大使许世英与日方多次会谈，对日乞求，继续执行妥协退让政策。在这一切都部署停当之后，蒋介石以为最后消灭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与中国共产党以及解决一再要求抗日不愿打内战的所谓张、杨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第四次来到西安，急不可待地向张、杨摊牌：要么服从“剿共”命令，东北军、17路军全部开赴前线，进攻陕、甘、宁苏区；要么东北军、17路军调往福建、安徽，让出陕西，由“中央军进剿”。

张学良、杨虎城痛陈大义，劝蒋抗日，反复苦谏、哭谏，概遭无理拒绝。他们忍无可忍，也没有等待的余地了，

只有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他们的行动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抗日民主党派、团体，各抗日军队的同情与支持。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国家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对蒋介石“兵谏”，迫使蒋介石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促成了国内和平与团结抗日局面的实现。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们的行动，推动了我国社会历史的前进。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是大有功于国家民族的功臣。他们或生或死，都是伟大而光辉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完全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捐弃前嫌，坚定地对事变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其重大的历史贡献。同样，蒋介石氏和中国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接受了事变当局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了内战，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走上团结抗日之路，亦是其重大的历史贡献。这些，都是值得全国人民庆幸的。

我国历史，终于翻过了最沉重的一页。

历史证明，我国人民，包括一部分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历来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当国家遭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他们会义无反顾地为民族解

放而斗争；当国家分裂的时候，他们也将会为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而斗争。

西安事变，已成为历史，过去了半个世纪。然而历史的经验是不应该忘记的。五十年前，国共两党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合作，共同促进和领导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今日中国，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潮流之中，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完全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肩负起历史责任，捐弃前嫌，停止内战，实行兄弟般的新的合作，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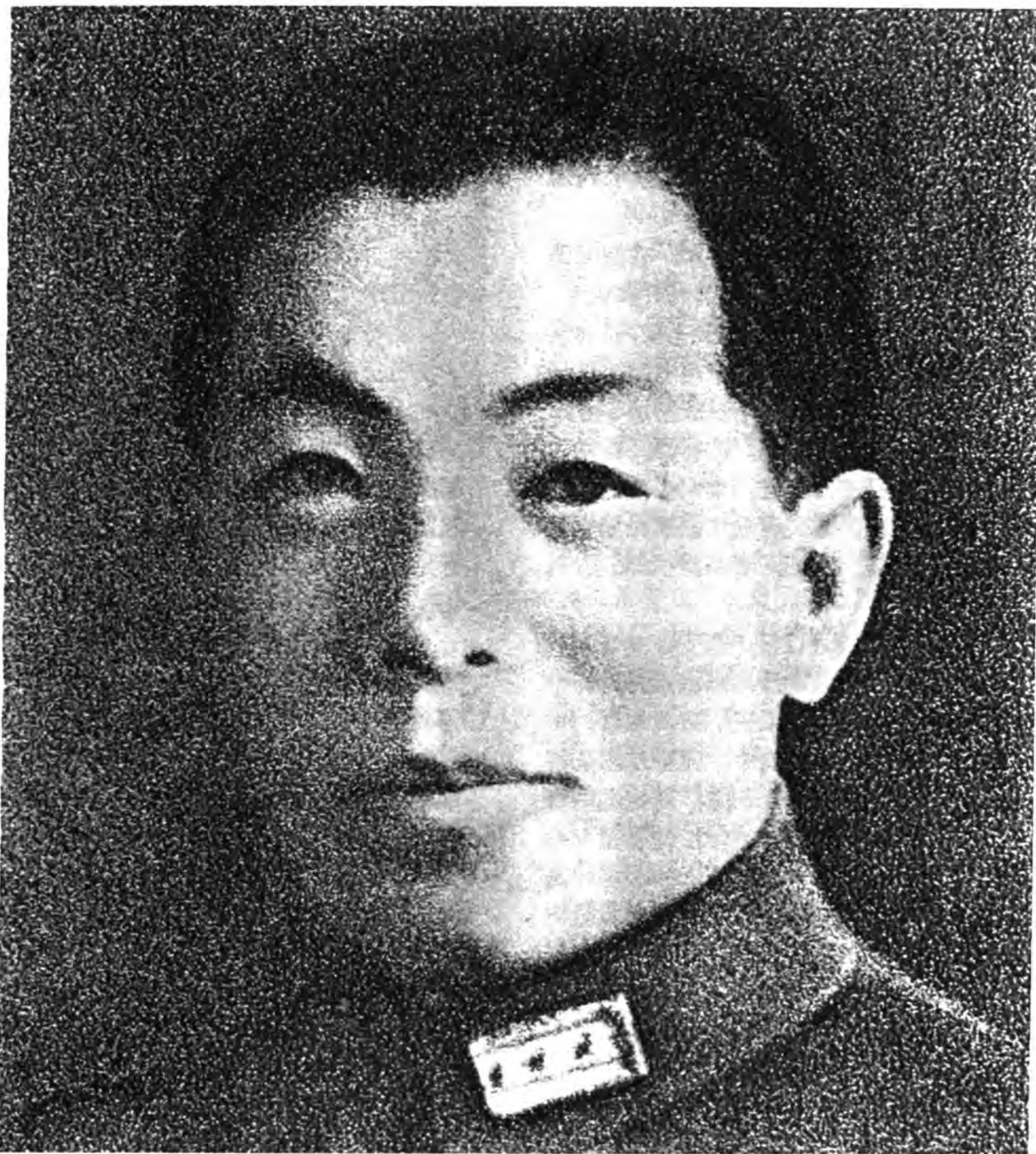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经过广泛搜集研究，编成《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真实的、形象的历史画卷，它对于我们了解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熟悉历史事实，记取历史经验，理解历史发展规律，认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从而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向着前进的方向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即将到来。我热烈祝贺这本书的问世，并希望关于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开展起来。

马文瑞

一九八六年七月

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学良杨虎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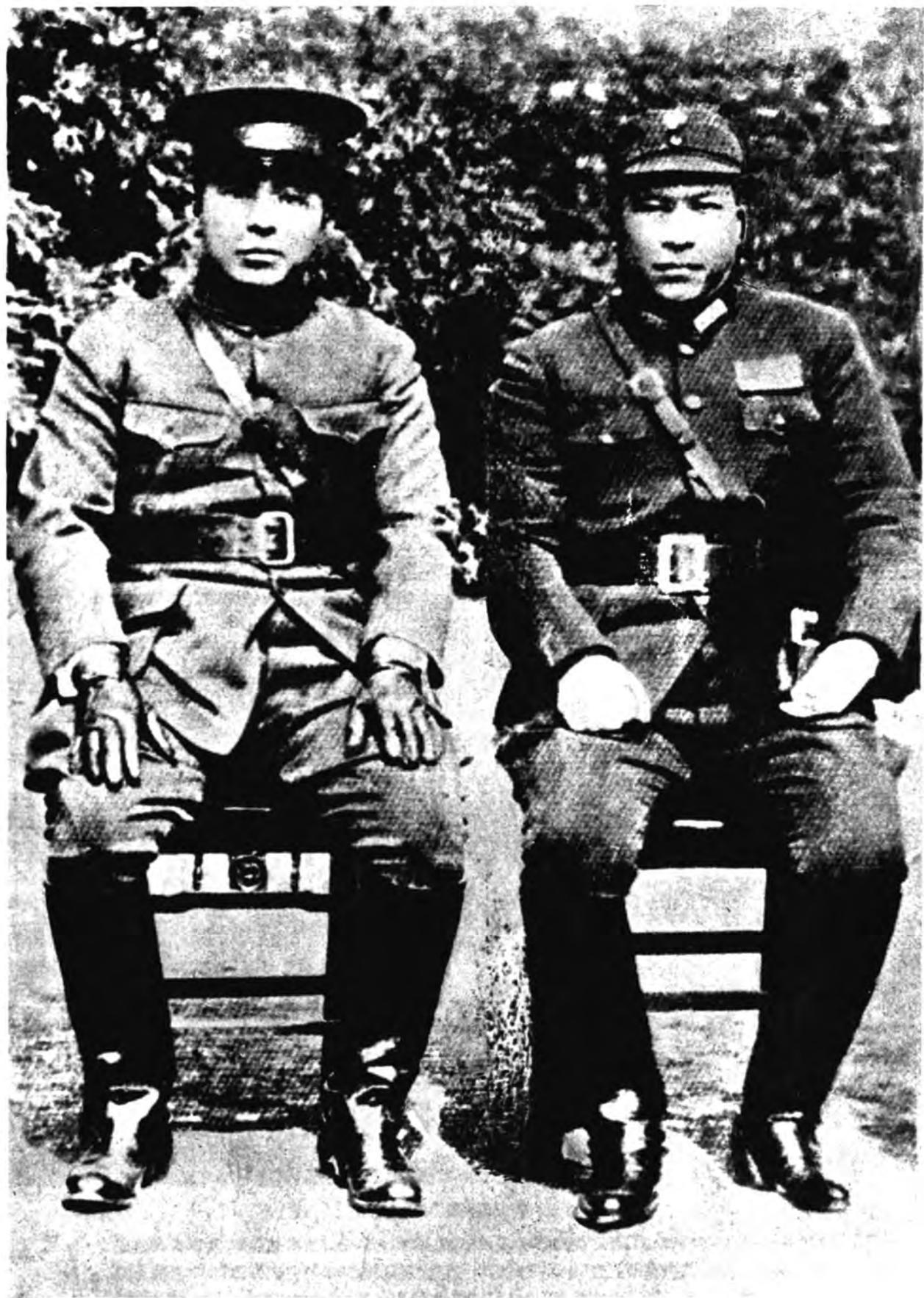
张学良将军(1936)。

张学良(1901—)，著名爱国将领，字汉卿、号毅庵，辽宁海城人。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海陆空军副司令、“鄂豫皖剿总”副司令、“西北剿总”副司令兼代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与反共内战政策，1936年12月12日同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事变和平解决后，护送蒋回南京，被囚禁至今。



杨虎城将军(1936)。

杨虎城(1893—1949)，著名爱国将领，陕西蒲城人。1930年任17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12日，同张学良联合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6月被迫离军出国，同年11月回国，要求抗战，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6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惨遭杀害。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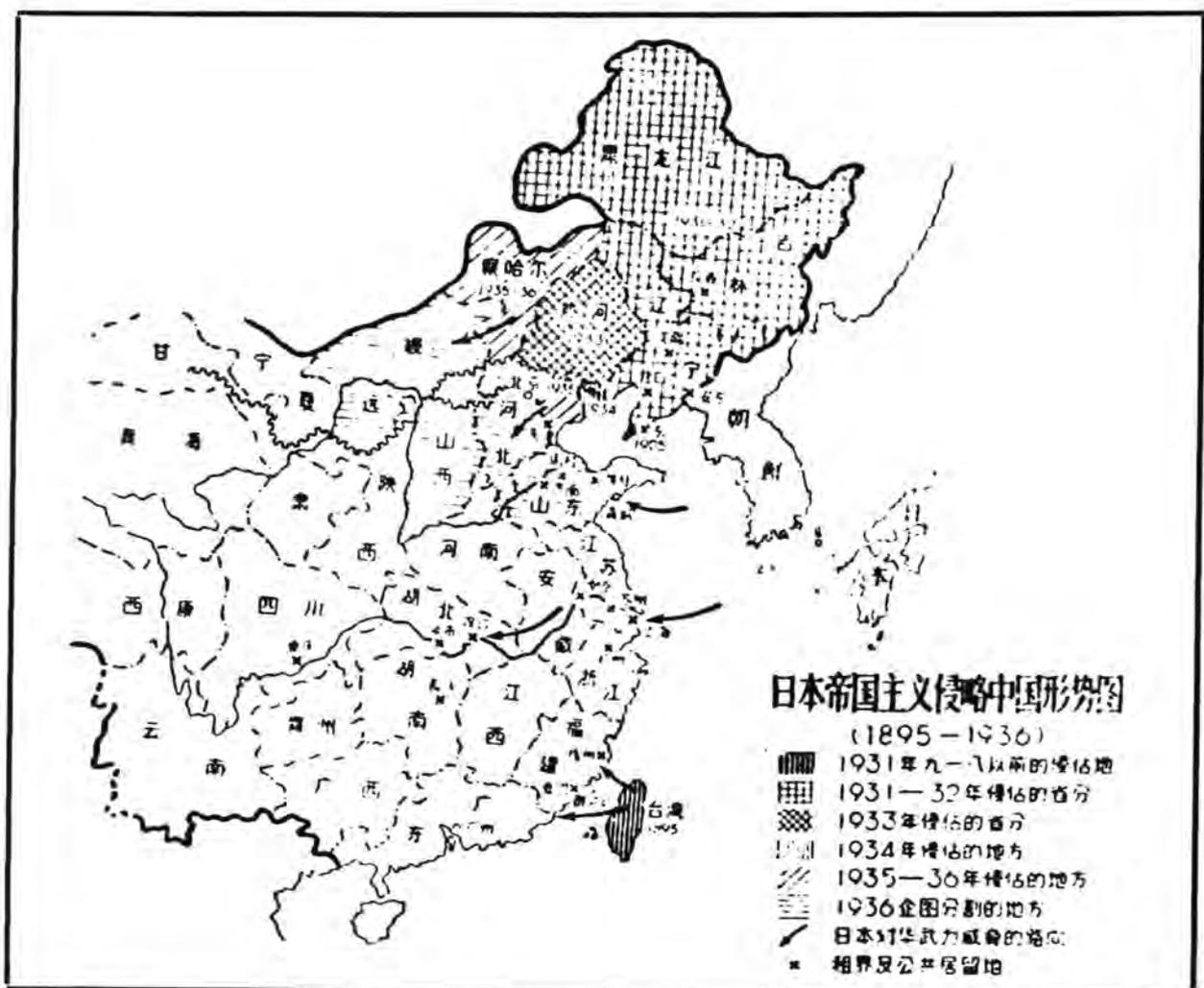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我国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日本侵华步步紧逼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乃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对我国侵略和我国人民长期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的伟大斗争的必然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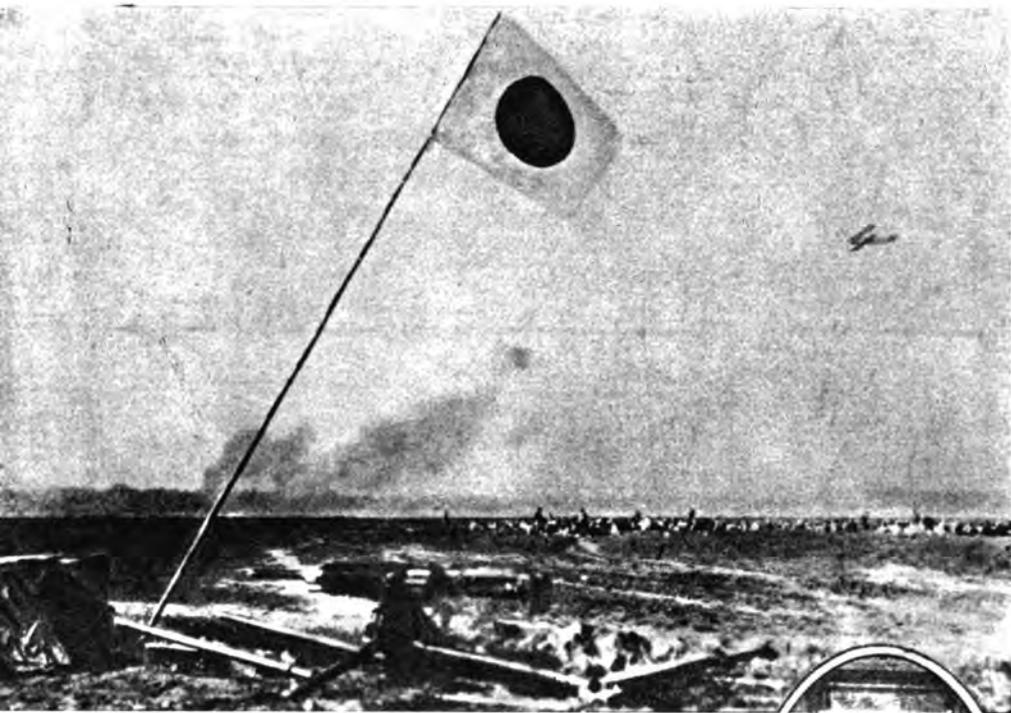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蓄谋已久。1890年(清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首开其端，侵占我国东北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大连、旅顺及山东威海卫军港、营口等地。其后是，1905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分割我东北和朝鲜而在我国境内进行的日俄战争，日本取代了沙皇俄国在我东北的特权。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企图变我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



“9.18”事变

1931年9月18日，中秋节之夜，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关东军，突然炮击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侵占了我东北最大城市沈阳，进而侵占我东北全部领土。史称“9.18”事变。

在日军侵略时，执政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竟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错误政策，命令守土有责的张学良率领东北军30万部队退到山海关内。不到四个月，我辽、吉、黑三省1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3,000多万同胞，4,000多公里铁路以及极为丰富的宝藏，被断送净尽。为我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日军侵占沈阳北大营。北大营及其附近屋宇惨遭焚烧，黑烟弥漫。东北军的营地插上了日本国旗。



自沈阳小西门入城的日本侵略军。

日军侵占沈阳北大营，
反诬我东北军“挑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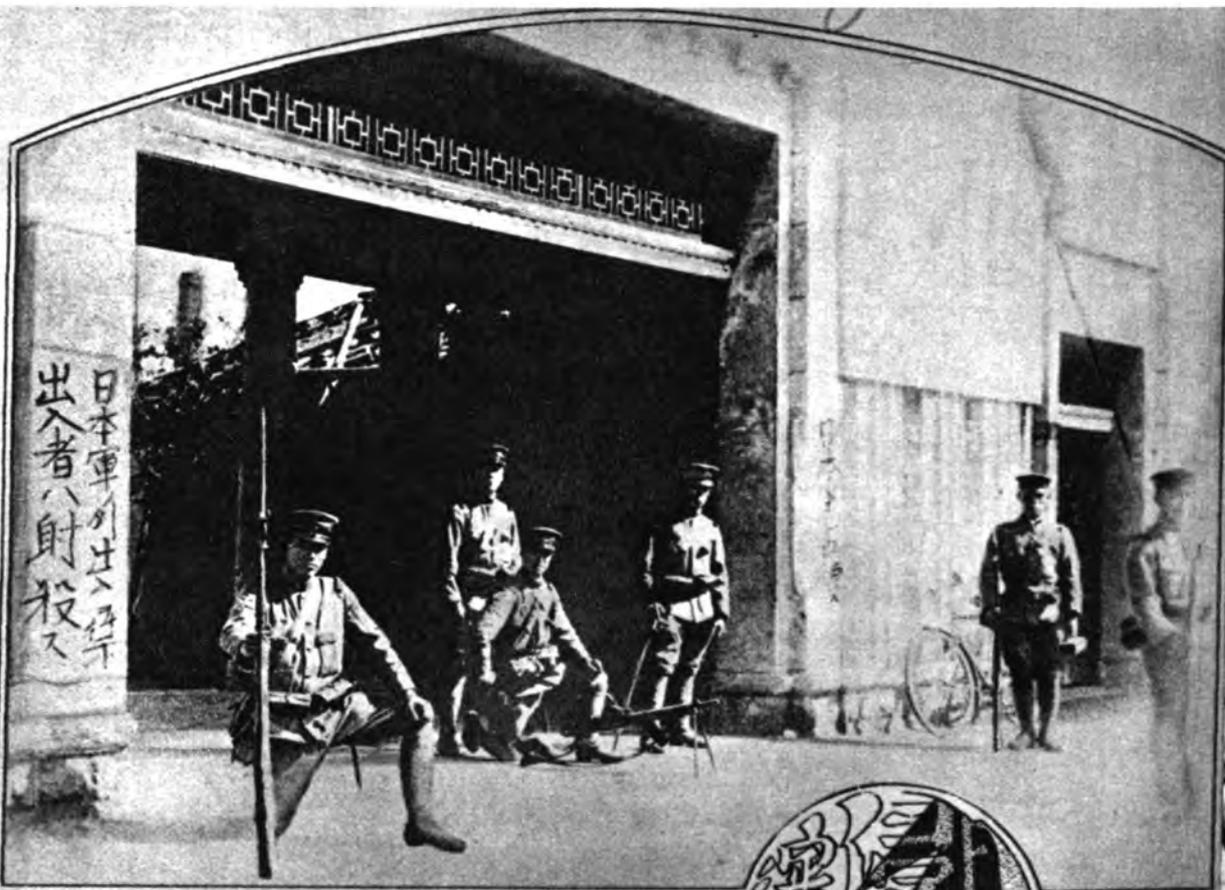
日本軍司令官布告

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大日本關東軍司令官 本庄 繁

（Vertical columns of Japanese text, including the date and the name of the commander, and a long body of text detailing military actions and accus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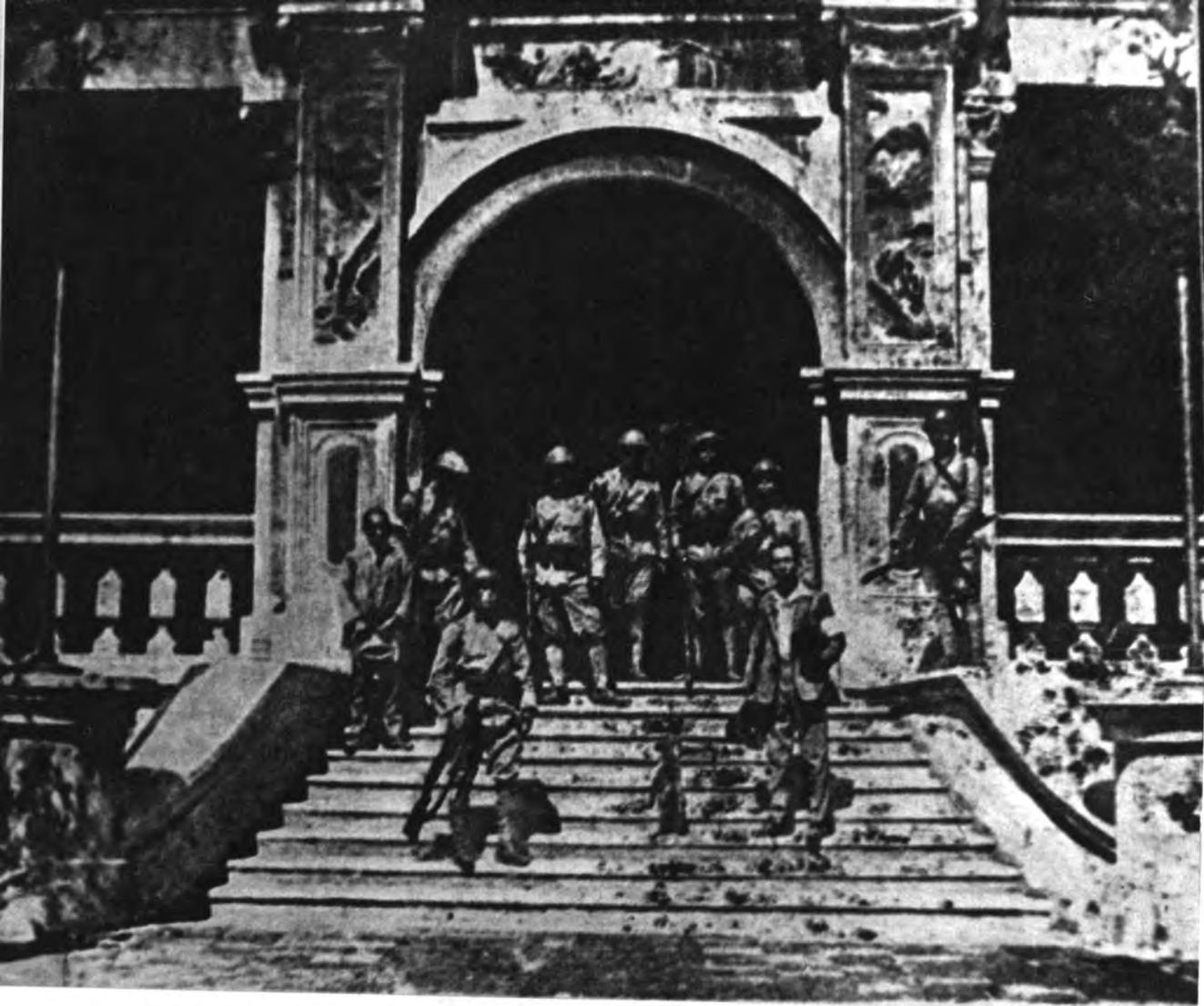
沈阳兵工厂门口。日军侵占我国最大的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在工厂门口大书：“非日本军出入者射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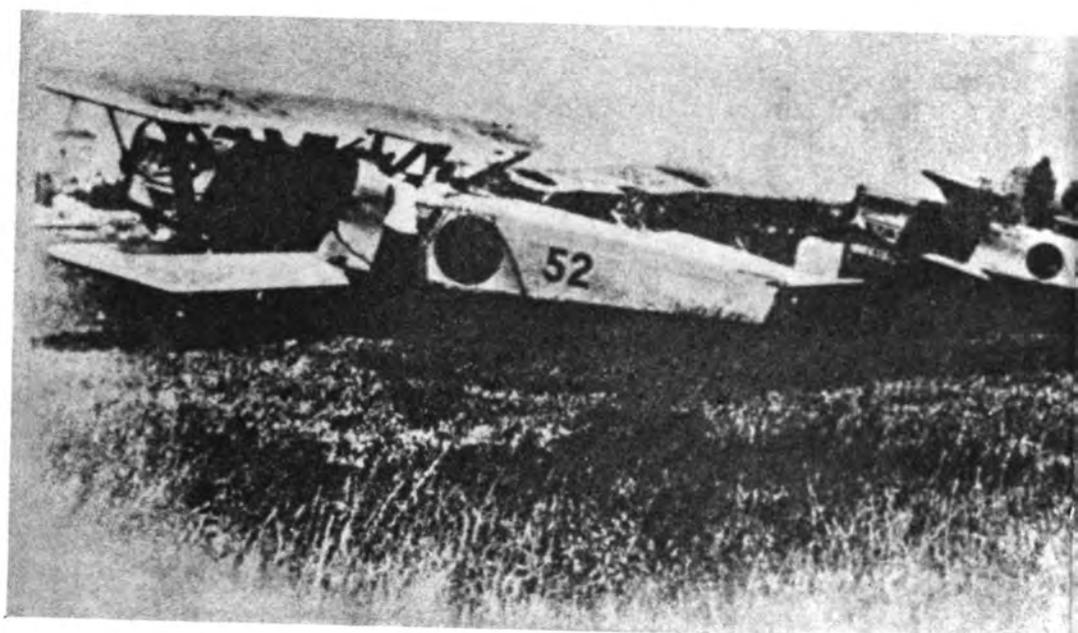
日本佔領東北兵工廠
「門此出入軍日本日非」書大口門
Japanese troops capturing the Shenyang arsenal: posted on the door is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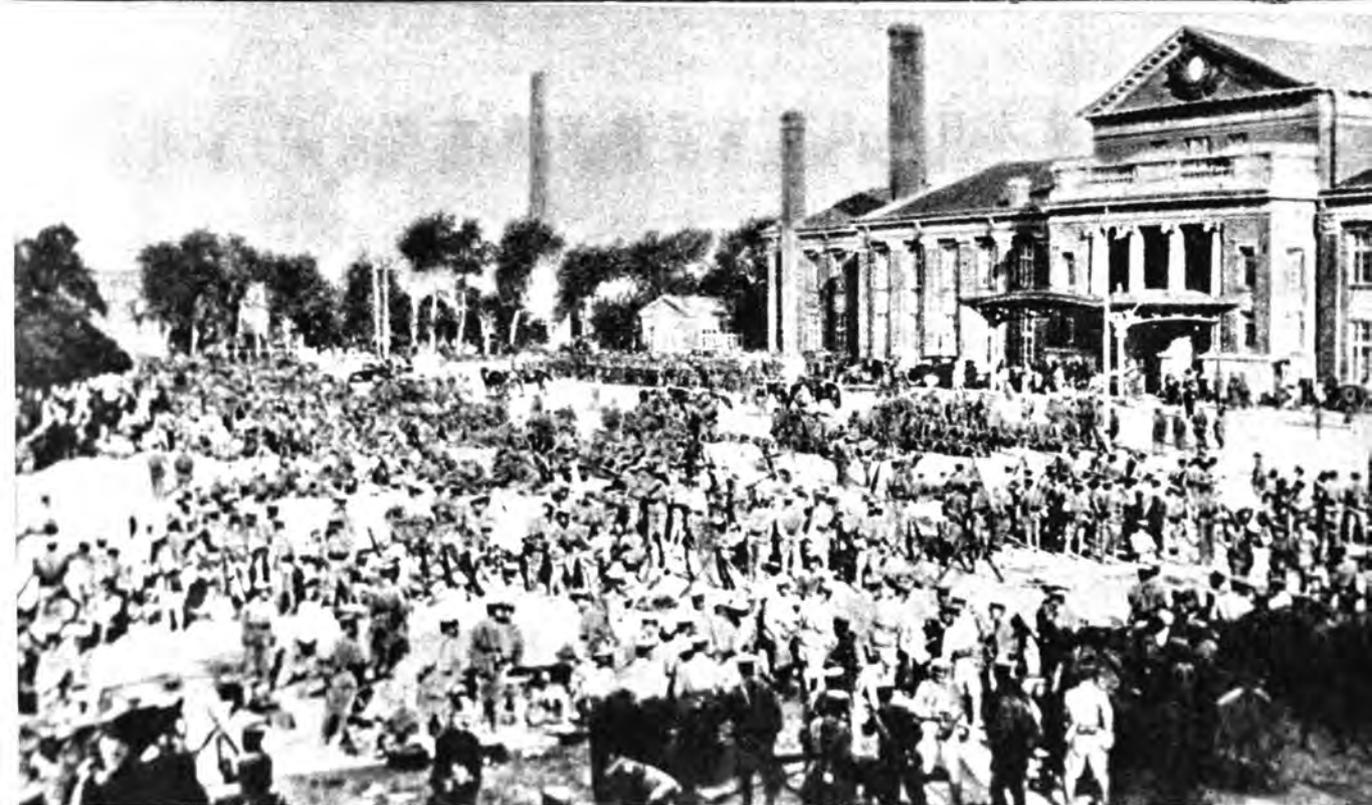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被日军反复搜劫的沈阳张学良私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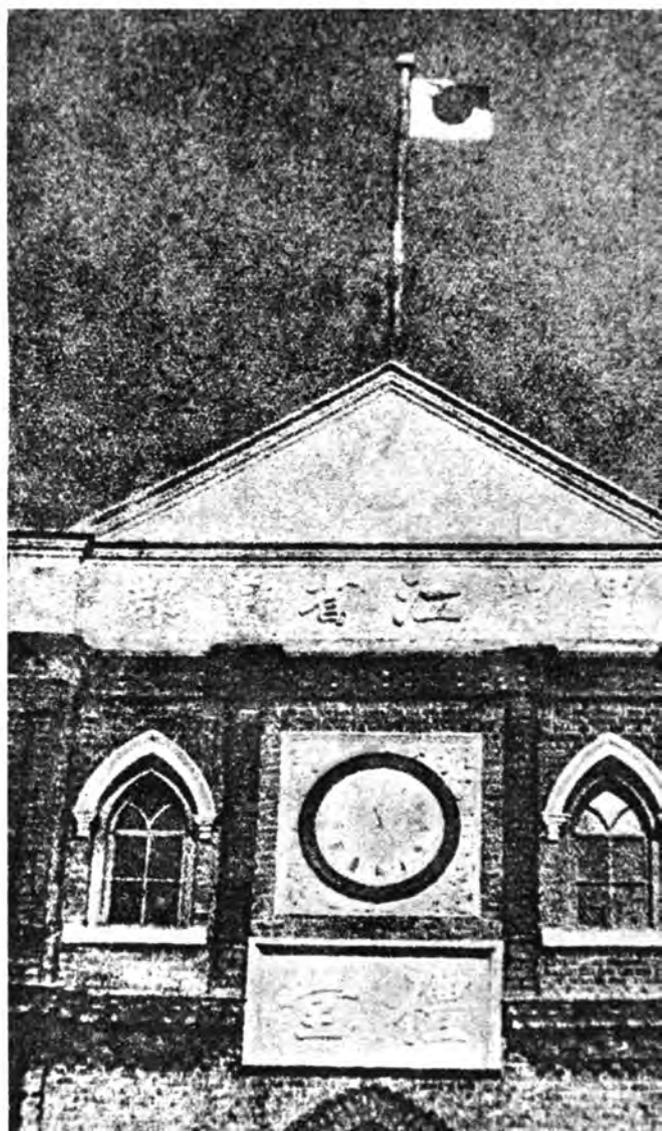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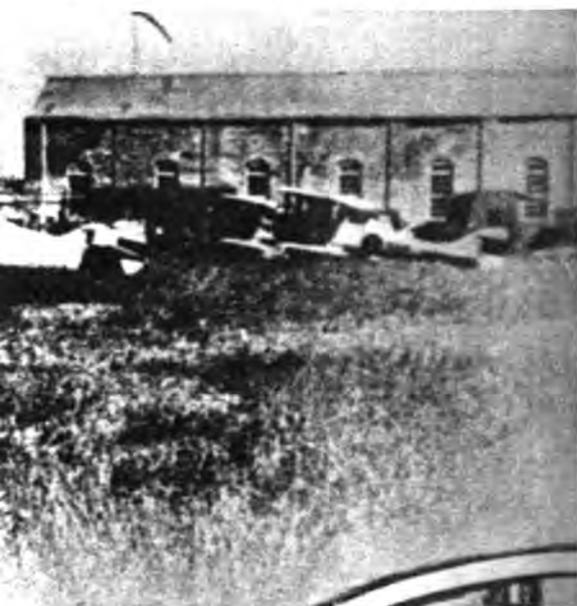


集结在长春的日本侵略军。

1931年9月20日，日军侵占长春。

1931年11月，日军侵占齐齐哈尔。

东北军的260架飞机，落入日军手中，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国徽，被涂改为“太阳”国徽。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侵占东三省发表宣言

“9.18”事变的第三天，即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怒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9月22日，又作出《关于满洲事变的决议》。9月30日，又发表第二次宣言。1932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发出《对日宣战通电》，正式宣布对日作战，领导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进行民族战争，保卫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宣言，愿与全国一切武装部队订立抗日协定。

与此相反，同一时间内，蒋介石多次讲话，要求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侵略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9月22日，蒋在南京国民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9月21日、23日讲话，与此类似。



“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的宣言通电。

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部分爱国将领起而抗战

东北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负责人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等，首先发动群众，广泛组织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长期坚持抗日战争。当日军侵占黑龙江、吉林时，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的李杜、丁超率所部东北军将士奋起抵抗。1933年冬，当日军侵占锦州时，东北军部分将士，又一次作了坚决的抵抗。

1932年1月28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守卫上海的19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下，浴血奋战，打死打伤日军一万余人，使日军四次更换指挥官。1933年3月，宋哲元、傅作义、王以哲、关麟征、黄杰等人率部抗击进犯我长城沿线的日军。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将军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吉鸿昌、方振武等一起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度把日伪军赶出察哈尔省境。1936年10月，日军进犯绥远，傅作义将军率部坚持与日军、伪军作战，11月24日收复百灵庙，歼敌千余。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西安各界召开援绥大会，发表宣言、开展募捐，给绥远抗战以积极支持。

从“9.18”到绥东抗战，六年间，虽然国民党南京政府一直不准抵抗，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与破坏抗战，但局部的抗战，迄未停止。而且每一次都牵动了全局，鼓舞了人心，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每一次都使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全国人民面前陷于孤立和内部不断发生分裂，直至西安事变。

东北抗日义勇军。





抗日名将马占山(1937)。

马占山(1884—1950)吉林怀德人,字秀芳。历任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1931年“9.18”事变后,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率部在黑龙江、泰来江桥等地抗击日军侵略。1936年9月初参加张学良组织成立的“抗日同志会”。1950年在北京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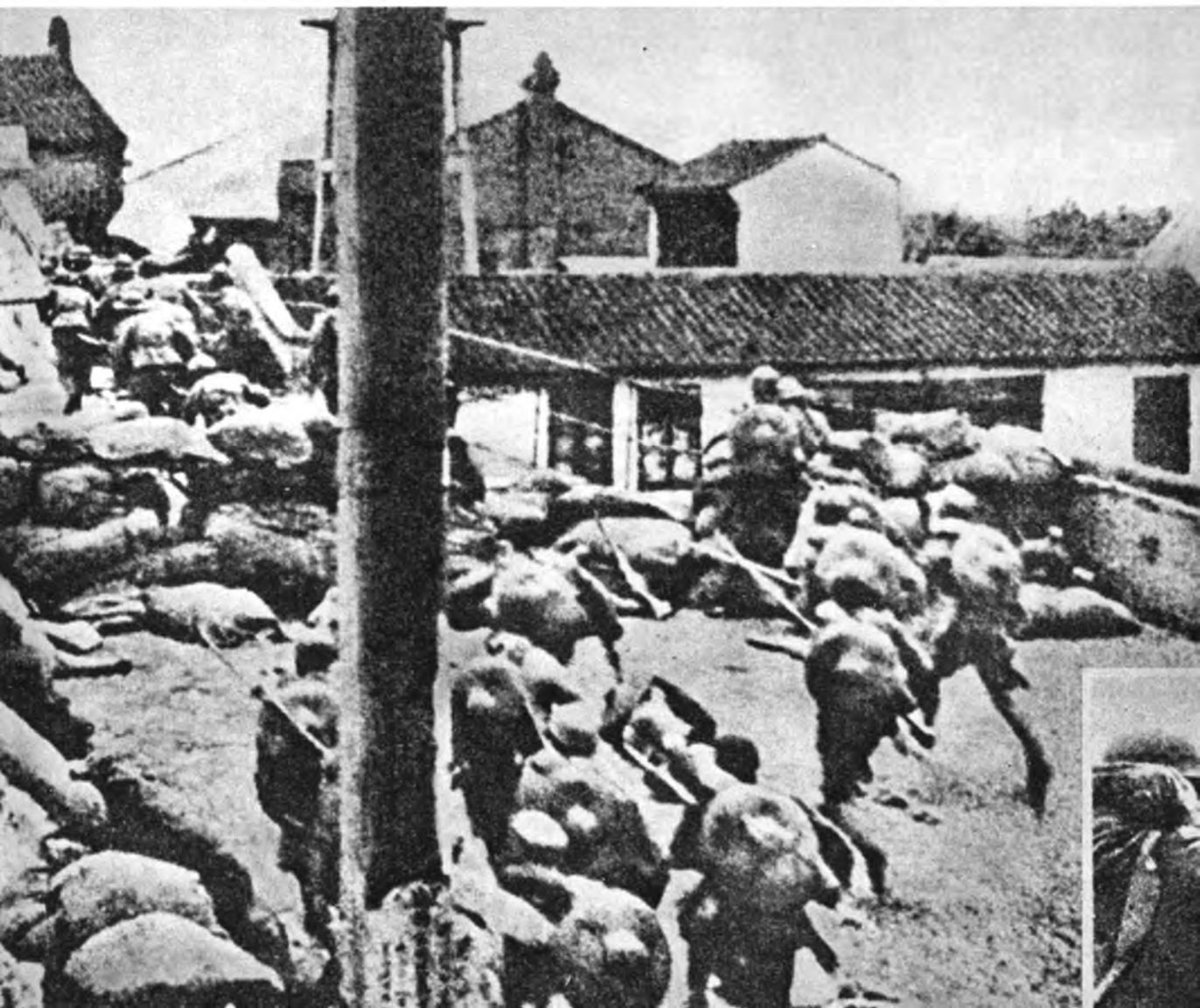
► 19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在前线指挥作战。

被19路军击溃之日军
狼狈逃窜。



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长城抗战将领
宋哲元(1937)。



长城抗战将领
王以哲(1933)。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
司令冯玉祥向部队讲话。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出征。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产党人吉鸿昌。



在绥东抗日前线的傅作义。



收复后的百灵庙。

为绥远抗战募捐于西安街头的西安高中学生。



中共中央及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關於緩遠抗戰通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中國國民黨南京政府全國各報館各團體各界各武裝隊伍及全國人民均鑒：

日偽軍進攻晉綏的動向已經開始，大規模的侵掠戰爭即將爆發。當此中華民族生死關頭，非動員全國民力人力財力以抗戰，則戰勝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實行下列處置：

(一) 調集大軍增援晉綏前線，動員全國海陸空軍準備全國性的抗戰。

(二) 停止進攻紅軍，實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三) 開放人民抗日救亡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立即釋放政治犯及上海各愛國領袖。

(四) 召集各黨各界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商討救國大計。

我們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棄對日妥協政策，停止中日談判，實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誤，坐視倭作踐將軍部局而抗戰不敵，而仍舊專心致力於壓迫人民抗日救亡運動與進攻抗日紅軍，則其結果不但將給民族國家以不能補救的損失，而南京當局亦將自絕於國人。

為了實現全民族的抗戰，我們更號召全中國人民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職業、更嚴密的聯合起來，督促南京政府實現我們的主張，克服一切困難，自動的組織各種救國團體與武裝力量，如救國會、後援會、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慰勞隊、募捐隊等，努力擴大救亡陣線，加強抗日力量，援助現在綏遠堅決鬥爭的英勇將士。抗日救亡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天職，也只有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才能迫使南京政府決心抗戰，給日寇以致命的打擊。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紅軍，一年來雖苦戰門，東進山西，西出寧夏，無非要尋找一條抗日去路，以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然而南京當局總不見說，一再阻攔紅軍抗日去路。當此存亡絕續之際，全國人民均關切生命財產，為民族生存之時，南京當局偏又調動大軍向抗日紅軍進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紅軍在山城伊清滅胡宗南軍一部，實出於不得已的自衛行動。我們對外宣揚，對內諷刺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們認為今日而對敵國內戰，實屬對民族國家之罪惡行爲，實際上，我們執行日本對華之政策，而真民族國家以無窮之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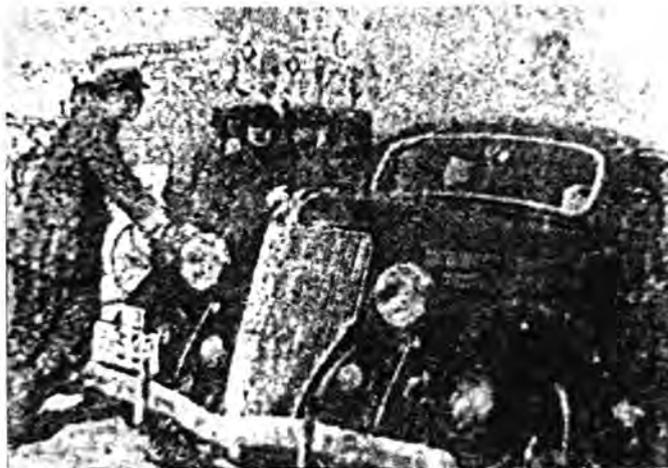
我們要求南京政府，令中國主力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現已集中寧夏，只要給我們以抗日去路，我們準備立刻

关于缓远抗战通电。

西安各校学生出发向各处募捐慰劳缓远抗战将士(1936年11月29日天津《大公报》报道)。



西安学生在城内开展援绥募捐活动。



抗日呼声遍于全国

“9.18”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事变后的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上海爆发了10万学生参加的反日大罢课。24日，5.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纷纷集会游行，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并派代表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出兵对日宣战。

“9.18”事变后，上海20多万群众，热血沸腾，举行抗日救国市民大会。



1931年9月28日，南京、上海的学生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集会示威，要求出兵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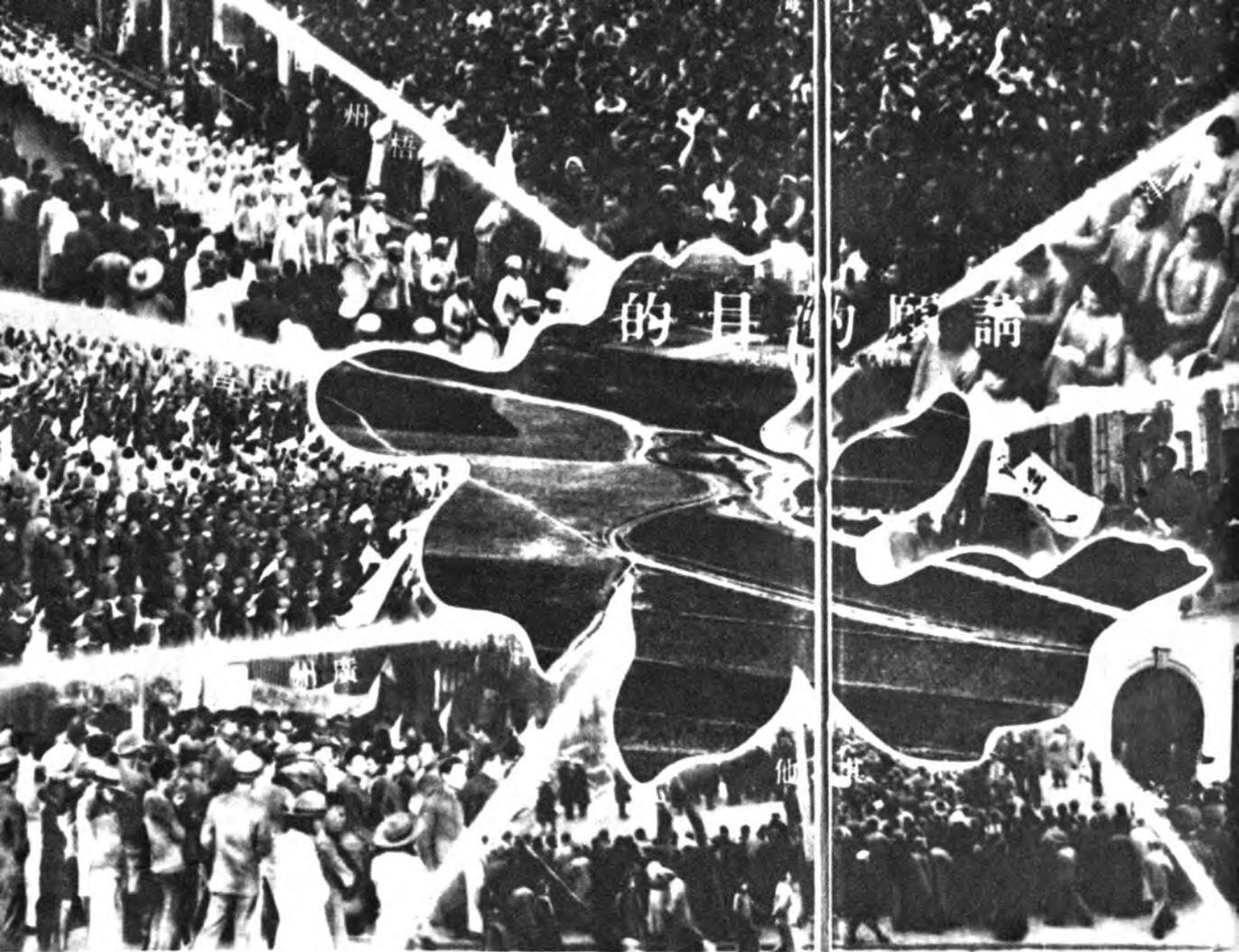


“9.18”事变后，杭州市各界冒雨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参加大会的10万人在雨中站立数小时，精神抖擞，悲壮激昂。



全国各地学生赴南京请愿。





高悬在西安东大街的横幅标语：“在抗日阵线上全民应切实联合起来！”





全国学生代表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大学会合，
向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要求对日宣战。

◀ 全国各地学生请愿游行队伍，势如潮涌。

蒋介石被迫出见赴南京请愿的学生(1931)。



《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

“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并未因南京政府的“睦邻”、“友好”而止步。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犯上海，南京政府于5月5日与日本签订《淞沪协定》。1933年1月3日山海关沦陷。接着热河沦陷，日军又进犯河北、察哈尔、绥远。南京政府于5月31日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5月29日，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把从关外调入的大批日军，摆在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各铁路上，进一步威胁平津，扬言要采取“自由行动”。1935年6月4日，南京政府派何应钦为代表同侵略者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9日达成秘密协定。史称《何梅协定》。《协定》规定取消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组织，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宪兵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平津两市市长，制止反日运动等等。

《何梅协定》。1936年12月19日，西安《解放日报》的报道。

喪權辱國之

何應欽梅津協定全文

無異將河北省及平津兩市完全斷送 國人對於此類秘密協定決誓不承認

年來日本帝國主義者，積極侵略中國，而中央政府，違背民意，一味屈伏，幾經簽訂秘密協定，如上海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察北協定等是，將我土地主權，暗中割棄，上列各秘密協定中，尤以何梅協定最為屈辱，無異於將河北省及平津兩市，完全斷送，國人對此類喪權辱國秘密協定，及其他所有不平等條約，誓不承認，茲我方已將何梅協定全文查獲，特公佈於次。

何梅協定

中國方面對於日本軍曾承認實行之事項如下：

- (一) 于學忠及張廷諤一飛之罷免。
- (二) 蔣先丁及曹錕情何一飛之罷免。
- (三) 憲兵第三團之撤去。
- (四) 軍分會政治訓練處及北平軍事雜誌之解散。
- (五) 日本方面所謂藍衣社復興社等有礙於中日兩國間交之秘密機關之取締，並不容許其存在。
- (六) 河北省內一切黨部之撤退，勵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廢。
- (七) 第五十一軍撤退河北省外。

調練班之解散。

一、關於以上各項之實行，並承認左記附帶事項，

- (一) 與日本方面約定之事項，完全須在約定之期限內實行，更有使中日關係不良之人員及團體，勿使滲透進入。
- (二) 任命省市等職員時，希望察納日本方面之希望任用，不使中日關係，或為不良之人物。
- (三) 關於約定事項之實施，日本方面採取監視及糾察之手段。

以上為備忘起見，特以筆記表達，此致何應欽閣下，昭和十年六月九日，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何應欽復函，敬啟者，六月九日滯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進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协定》之情形。





《塘沽协定》的谈判者。右：南京政府代表。左：日本关东军代表。

《淞沪协定》。



停戰協定昨日簽字

協定全文於昨夜公布
日軍今日起開始撤退
共同委員會同時成立

國媚外荷安簽訂喪權辱 條約者罪浮於漢奸

▲正式簽字情形
▲昨晨開會經過
▲共同委員會入選

▲中文協定全文

华北事变

1935年5月，日本借口“保护日侨”，大举增兵华北，侵入北平。是为“华北事变”。日本叫做“华北特殊化”或“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提出“华北特殊化”口号。所谓“华北特殊化”，即华北政权日本化。这是日本正式向南京政府提出整个华北统治权的要求。“特殊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策略步骤，它的目的是建立脱离国民党政府的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绥远五省的特殊区域，成立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国”。为此到处策划亲日派、汉奸活动。1935年10月公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大小汉奸结队游行，在平、津等地公开活动，伪组织纷纷出笼。1935年10月20日，日本策动汉奸在河北香河等县暴乱，占领香河县城，成立维持会。1935年11月25日，日本策动汉奸殷汝耕窃据冀东22县，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任政务长官。接着大同出现“晋北自治政府”。张家口出现“察南自治政府”。1935年11月26日，南京政府撤销北平军分会。28日与日方商洽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曹汝霖等为委员，自行“特殊化”，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划之外。1936年5月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秘密订立《华北防共协定》。

1935—1936年，全国人民奋起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华北特殊化。与此同时，华北国民党特务则与日本宪兵配合到处逮捕抗日人士。



开入北平的日本侵略军。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中将，在北平车站检阅日本驻军。前中为田代。



全国各地报纸关于华北局势的报道。



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936年5月28日，天津工人、学生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1936年5月，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报道和抗议日本增兵华北。



蒋介石瞩目西北

胡宗南屯兵陕甘 邵力子主陕

1933年3月，蒋介石调派其嫡系部队胡宗南部，进驻紧靠陕西西部的甘肃天水一带。从此国民党嫡系军事势力深入西北。胡部进驻甘肃的目的，是要从侧背监视杨虎城及其所率领的17路军，它反映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嫡系与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

1935年，中国抗日红军长征到达川、陕、甘，胡宗南部即由川北尾随红军直到陇南和陕西的关中，包围与封锁陕甘宁苏区。西安事变之后，国内和平实现，抗日战争开始。但胡宗南部仍然长期屯兵西北。保存势力，准备内战。

胡宗南部系国民党军第一师，名为一师，实为数师。1936年扩编为国民党军第一军，名为一军，实为数军。

1933年，与胡宗南部进驻陕、甘的同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于6月8日，通过报纸突然宣布解除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委派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6月1日邵由南京抵西安。20日，在西安新城大楼，举行就职典礼。



胡宗南(1932)。

胡宗南(1902—1960)字寿山，浙江吉安县人，黄埔一期学生。属蒋介石嫡系。1962年病死于台湾。

邵力子(1932)。

邵力子(1881—1967)字仲辉。浙江绍兴人，前清举人，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主持上海《国民日报》。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1926年退出共产党。1927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



前排左起：邓宝珊、杨虎城、邵力子。

在西安新城杨虎城公馆前。右起：杨虎城(4)、井岳秀(5)、高桂滋(6)、邵力子(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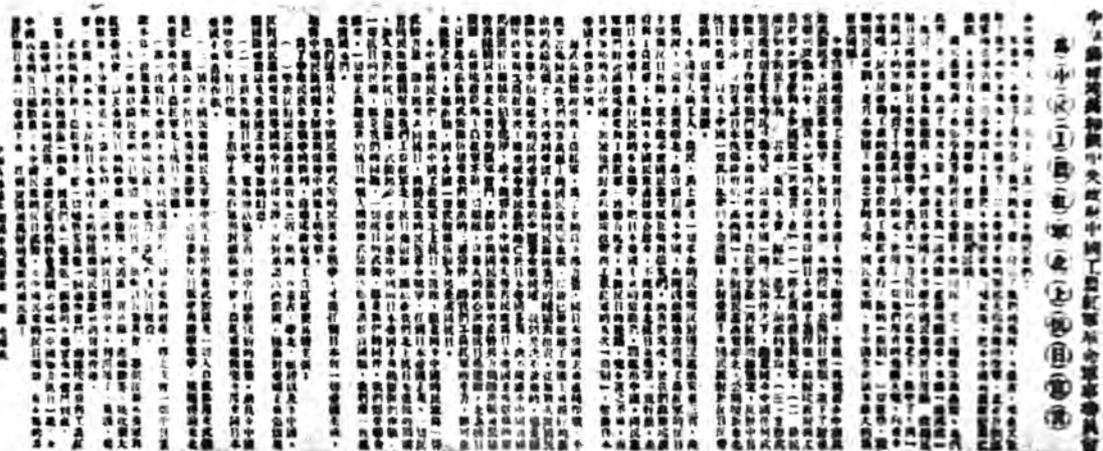
红军长征到达西北

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亲率百万大军扼杀了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又向江西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战局相持了一年左右。

1934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鉴于华北危机，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同年7月7日，红军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江西瑞金出发，北上抗日。7月15日，向全国发出了《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提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4年“9.18”国难三周年，杨虎城在西安新城绥靖公署大门前操场举行纪念并检阅部队。杨发表演说，号召“摒绝内战”。



《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西安“9.18”国难三周年纪念大会会场。横幅标语为：“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阅兵台上左起：杨虎城（1）、邵力子（4）。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

1935年10月，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15军团会师。1936年10月中国红军三支主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红军在陕甘的会师，推动了全国，首先是西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

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1935)。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抗日救国宣言

一九三五·一一二八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兵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在并吞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了。

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中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迫紧了，现在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

抗日救国宣言

九

《抗日救国宣言》的首页。



1935年9月中旬，红25军，原在鄂豫皖根据地，长征中经陕南、陇东到达陕北，与陕北的红26军、27军在延川永坪镇第一次会师。



1935年10月，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第一方面军。





毛泽东主席在陕北苏区保安向红军部队讲话(1936)。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朱德总司令向红军指战员讲话。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第二方面军。二排右起：任弼时(二)、
贺龙(三)、王震(七)。三排右起：李井泉(一)、关向应(四)。





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副主席(1935)



长征到达宁夏预旺堡的彭德怀司令员(1935)。
预旺堡在宁夏东南，是红一方面军的总部所在地。



长征到达陕北的
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



长征到达陕北的叶剑英(右)、徐向前(1935)



长征途中的红军第二方面军领导人。左起：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前坐者王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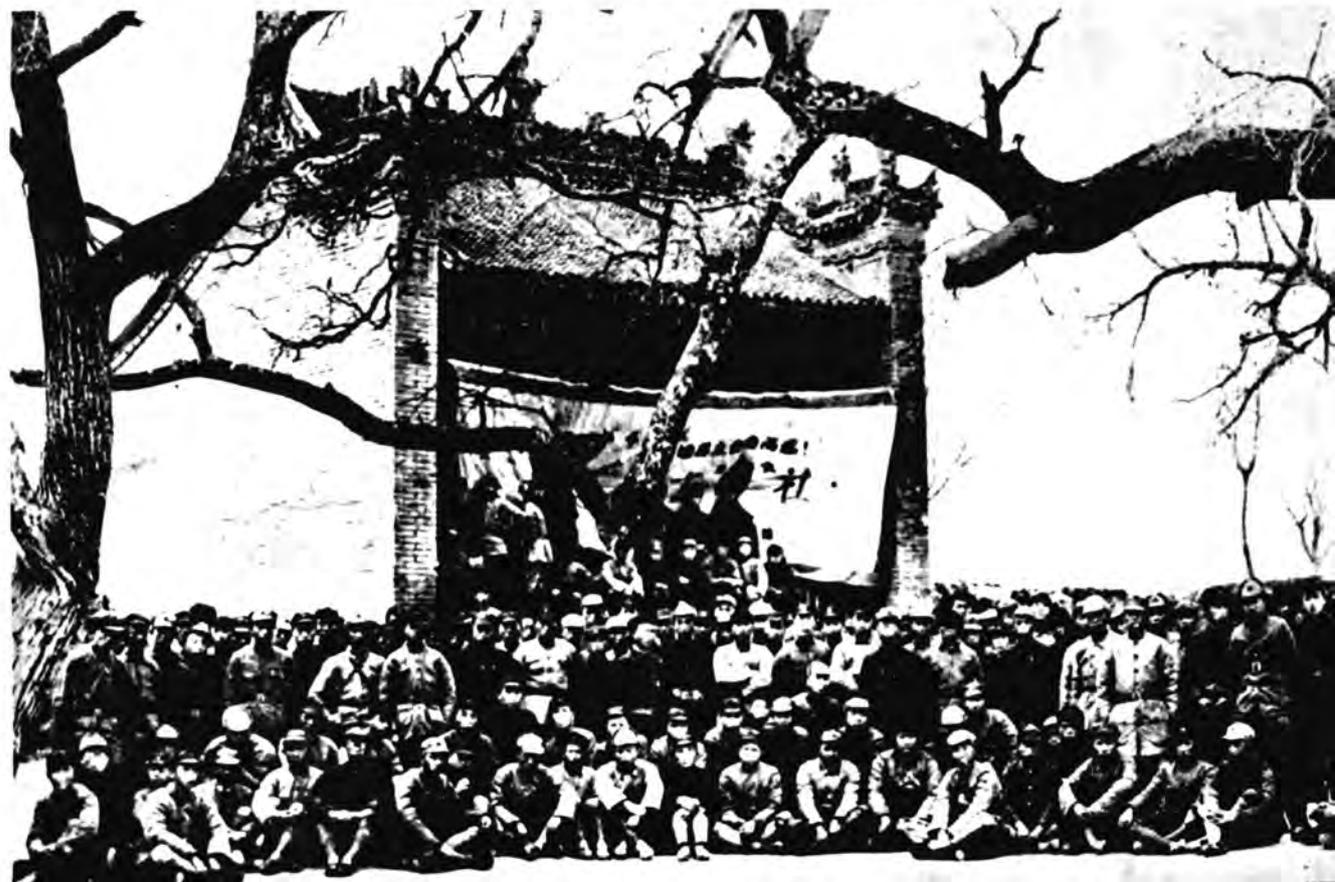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将领的一部分(1935)。右起：邓小平、徐海东、聂荣臻、程子华。



中国抗日红军第15军团司令员徐海东和他的参谋人员(1935年8月1日于甘肃)。前排左二徐海东。

1936年11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





延安清凉山古塔下的红军骑兵(1937年1月)。

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杨家岭。

1937年1月1日，中共中央从保安迁至延安。



1936年12月18日，红军进驻肤施(延安)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首都——陕北保安(今志丹县)。



为策划截击红军 蒋介石第一次来陕

蒋介石到陕

中国抗日红军几个方面军的主力向西北转移的时候，1934年10月12日，蒋介石及“豫鄂皖剿总”副司令(蒋为总司令)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此行的目的，是策划杨虎城部“剿共”，蒋介石想依靠杨虎城所率领的17路军阻击长征途中的红军。蒋在西安期间，还检阅了17路军部队。



在渭南车站(1934)。

1934年10月12日，蒋介石一行由洛阳抵渭南车站，邵力子、杨虎城到车站迎接。右起：邵力子(1)、蒋介石(3)、杨永泰(1)。左一为张学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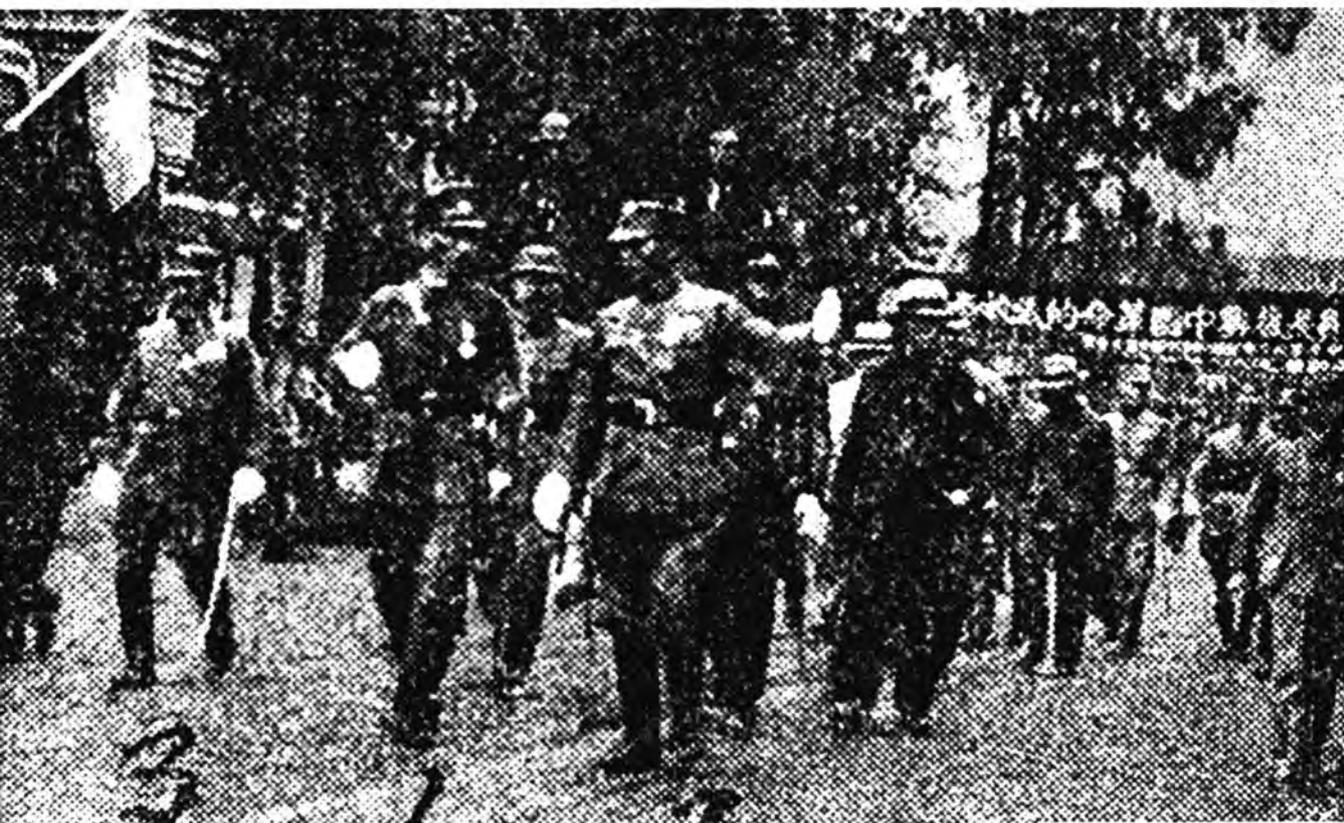
谢葆真、傅学文在渭南车站迎接宋美龄。

左起：傅学文(邵力子夫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谢葆真(杨虎城夫人)。



蒋介石一行到西安中山门。前左起：张学良、宋美龄、蒋介石。右为17路军乐队。

蒋介石来陕之前10月10日在洛阳，参加洛阳军分校军官训练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和国庆阅兵，动员“剿共”。前左起：高桂滋、蒋介石、祝绍周。



蒋介石在西安察看军事要地

1934年10月12日，蒋介石、张学良抵陕后，连日询问治安及公路建设情况，并察看许多军事要地方。

在西安北城门楼上。左起
蒋介石、张学良、冯钦哉。



在西安城内视察。右起：冯钦哉、
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邵力子。



1934年10月21日，蔣介石、张学良一行去茂陵，在咸阳渭河渡口。



下船之后。右起：蔣介石、宋美齡、傅学文、张学良。



1934年10月21日，在周陵碑前。前排右起：龚明贤、邵力子、杨虎城、傅学文、宋美齡、蔣介石、杨永泰、张学良、冯钦哉。左一为温良儒。





在渭河渡船上。张学良、蒋介石(张后)、宋美龄(蒋左)、傅学文(宋后)。



茂陵“石鱼”上的蒋介石、宋美龄、傅学文。



在茂陵群碑间。左起：冯钦哉、蒋介石、宋美龄、傅学文、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杨永泰、龚贤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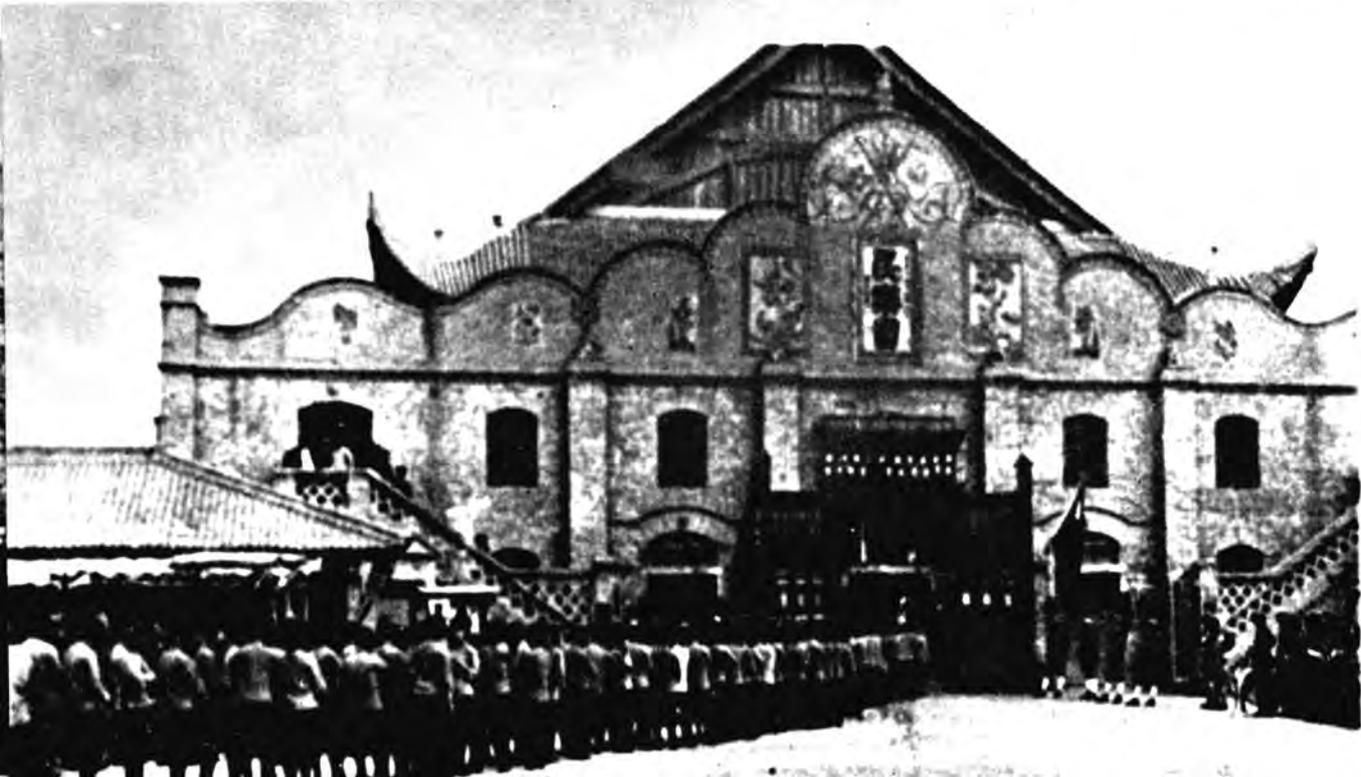
蒋介石在西安民乐园“精神训话”

1934年10月15日，陕西国民党当局在西安民乐园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张学良、杨永泰到会。蒋在“精神训话”中大谈：“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现在要复兴民族、复兴中国，先要复兴民族精神，奉行礼义廉耻”。（见1934年10月16日天津《大公报》三版）。只字不提当时甚为紧迫的抗日救国问题。陕西国民党当局则极力捧蒋：“欢迎劳苦功高的蒋委员长”、“拥护蒋委员长的一切主张”。



蒋介石走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大门去民乐园。右站立者为杨虎城。

西安各校学生列队进入民乐园会场，听蒋“精神训话”。



蒋介石离开民乐园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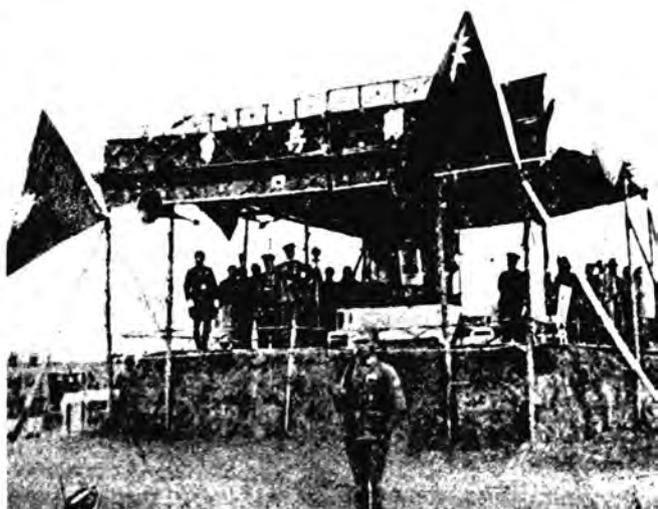
蒋介石离开民乐园来到西安革命公园内的革命纪念馆。右起：邵力子、蒋介石、杨虎城。



蒋介石进入西安革命公园(1934)。左为：张学良。



蒋介石在西安检阅 17 路军部队



1934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西安西关操场阅兵台上“训话”。左一：杨虎城。讲话者：蒋介石。

检阅。



检阅17路军部队。第一骑为蒋介石，左后骑深色马者为张学良，左后骑白马者为杨虎城。



受检阅的17路军步兵部队。

1934年10月12日，张学良随蒋
来西安时，赠给杨虎城的照片。

检阅17路军部队。前：蒋介石。后：杨虎城。



蒋介石严令 17 路军在陕南截击红军

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进入川、陕边境，蒋介石曾多次召慰和命令杨虎城阻击红军。同年秋，命令杨虎城部驻防陕南靠近四川的汉中地区。

1934年10月，蒋来到陕西策动杨虎城“剿共”。

1935年1月，又严令杨虎城率军截击、“围剿”由鄂豫皖苏区转移陕南地区的红25军。红25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连战皆捷，出击秦岭，逼近西安，震动关中。杨虎城部三个旅损失惨重。



1935年1月，进入陕东南山区的杨虎城及其部队。

1933年12月，在汉中机场。左起：赵寿山、杨虎城、孙蔚如。





1933年12月由汉中返西安的杨虎城及欢迎者在西安机场。穿航空服装者为杨虎城、杨右为杜斌丞、杨左第三人为赵寿山、第五人为韩卓儒。

蒋介石“召慰”杨虎城

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为防止陕局不稳，特电召杨虎城赴杭。1936年10月10日，杨到杭州，蒋对杨特加“安慰”，10月18日，蒋介石夫妇邀请杨虎城、韩复榘、徐永昌、贺耀组、杨杰、黄绍竑、蒋伯诚、萧同兹、罗霭天、宣铁吾、周象贤暨随员八十余人由杭赴天目山游览。杨返陕时，蒋一再叮嘱要杨紧密配合张学良“力剿”、“全歼”陕北红军。



1936年10月10日，杨虎城应召赴杭州见蒋介石途经南京与随行人员在燕子矶。左起：李志刚、武士敏、申明甫、杨虎城、李慕愚。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当时成为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同时指出了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毛泽东预见：国民党营垒是会发生分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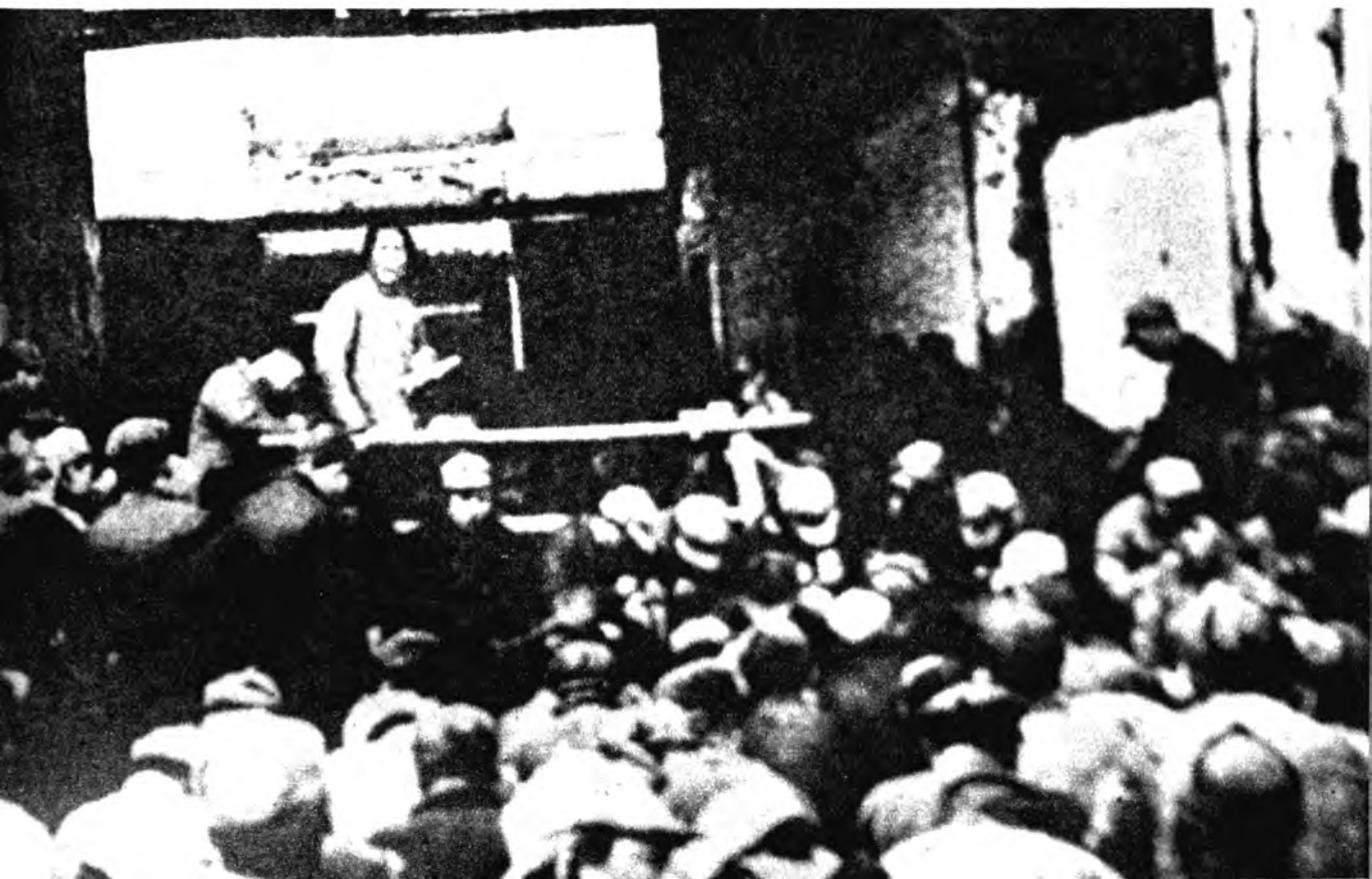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形势的特点和各阶级的动态，预感到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他以蔡廷锴为例：蔡同红军打过死仗，反过来同红军订了抗日反蒋同盟。在江西进攻红军，在上海抗日，在福建又同红军妥协，向蒋介石开火等等变化，认为：“这是国民党阵营的破裂”。“‘9.18’事变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阵营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分裂的。”

从《八一宣言》到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思想上理论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





“瓦窑堡会议”会址。



毛泽东在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致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1936年10月15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1936年10月26日，红军将领46人致电蒋介石和西北各将领，要求停止内战共赴国防前线，合力抗战。

◀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 1936年10月15日，毛泽东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

▼ 1936年10月26日，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諸位先生：敬啟者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大鑒：

自上海華及蘇俄政府與紅軍發表抗日救國宣言以來，忽已一年多了，本黨及蘇俄政府與紅軍創議組織民族統一戰線，聯合全國各黨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張，雖然得到了全國愛國領袖與愛國人民的擁護，但因貴黨及貴黨政府遲疑不肯採納，致使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直到今天還未發動。而日寇則已乘虛直入，得寸進尺，淪亡慘禍，迫在目前，全國惶惶，不可終日。這種全國全民界的絕大危險，完全是由於貴黨及貴黨政府的錯誤政策所招來的。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本黨不得不向貴黨再一大的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如果你們還要繼續內爭，不把向內的槍口轉向外，不把內部的衝突轉到對外，不把漢奸的局勢轉到團結，不把漢奸的情況轉到統一，則禍患之來，不堪設想，而諸位先生千秋萬世的罪名，亦將無可以挽回。為了這個緣故，我們特以誠懇的態度致書於諸位先生及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之前。

據了貴黨二中全會宣言及蔣委員長報告之後，認為貴黨二中全會對於全國人民日夜驚惶的救亡圖存問題，依然沒有肯定的答覆，對貴黨五全大會「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的對外政策，並沒有實際的證明，這對於全國愛國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蔣委員長的報告，曾對對貴黨五全大會的政策作了新的解釋，說：「中央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絕對不容許任何損害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低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這對於前幾種解釋的時效，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是非常需要的，因為中國人民始終不了解如何方可稱為「和平的解釋」，而「和平的解釋」的最低限度，我們承認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較之過去是有了若干進步，我們誠懇的對這種解釋表示同情。但「和平的解釋」基本上依然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因為蔣委員長在自己的報告中，又認為「和平的解釋」是「和平的解釋」，這是不正確的，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與不知是否已達和平的最低限度，我們誠懇的對這種解釋表示同情。但「和平的解釋」基本上依然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因為蔣委員長在自己的報告中，又認為「和平的解釋」是「和平的解釋」，這是不正確的，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與不知是否已達和平的最低限度，我們誠懇的對這種解釋表示同情。

我們誠懇的對這種解釋表示同情。但「和平的解釋」基本上依然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因為蔣委員長在自己的報告中，又認為「和平的解釋」是「和平的解釋」，這是不正確的，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與不知是否已達和平的最低限度，我們誠懇的對這種解釋表示同情。

蔣委員長報告，曾對對貴黨五全大會的政策作了新的解釋，說：「中央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絕對不容許任何損害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低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這對於前幾種解釋的時效，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是非常需要的，因為中國人民始終不了解如何方可稱為「和平的解釋」，而「和平的解釋」的最低限度，我們承認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較之過去是有了若干進步，我們誠懇的對這種解釋表示同情。但「和平的解釋」基本上依然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因為蔣委員長在自己的報告中，又認為「和平的解釋」是「和平的解釋」，這是不正確的，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與不知是否已達和平的最低限度，我們誠懇的對這種解釋表示同情。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伟大的“12.9”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示威游行队伍之一部。



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下，处在华北前线的北平学生，首先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向南京政府提出：公开宣布对日交涉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得任意捕人；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学生们代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停止一切内战，共同对外”口号。国民党北平当局残酷镇压了学生的爱国运动。

12月16日，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日。北平学生为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为回答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于16日拂晓，走上街头，高呼：“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民族解放”、“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在前门广场举行了露天大会。通过：（一）誓死反对华北自治的伪组织；（二）要求宋哲元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并抚恤各校受伤受难同学，惩办凶手；（三）不得禁止学生运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决议。由于学生们的坚决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不得不宣布延期。

北平学生游行示威之后，全国各大城市：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广州、西安……的广大爱国学生，相继举行了示威游行。从此，全国的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形成高潮。





1935年12月24日，西安各校师生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北平“12.9”运动中被捕的学生。

各校師生昨電中央

請維護愛國運動

如能因勢力導自可納入正軌

並電平學術團體恩被難學生

西安各中學校全體教職員學生，昨電中央及北平各中學校全體教職員學生，並電平學術團體恩被難學生，請維護愛國運動，如能因勢力導自可納入正軌。並電平學術團體恩被難學生。

西安各中學校全體教職員學生，昨電中央及北平各中學校全體教職員學生，並電平學術團體恩被難學生，請維護愛國運動，如能因勢力導自可納入正軌。並電平學術團體恩被難學生。

西安各中學校全體教職員學生，昨電中央及北平各中學校全體教職員學生，並電平學術團體恩被難學生，請維護愛國運動，如能因勢力導自可納入正軌。並電平學術團體恩被難學生。

業務極形發達

定期信任存款分紅利

中央信託局辦事處，業務極形發達，定期信任存款分紅利。中央信託局辦事處，業務極形發達，定期信任存款分紅利。

中央信託局辦事處，業務極形發達，定期信任存款分紅利。中央信託局辦事處，業務極形發達，定期信任存款分紅利。

中央信託局辦事處，業務極形發達，定期信任存款分紅利。中央信託局辦事處，業務極形發達，定期信任存款分紅利。

秩序甚佳

西安學生昨遊行請願

並電宋哲元促釋學生措詞沉痛 慰問南大請願生教部代表返京

（中央廿五日西安電）西安各中等學校全體教職員學生，廿四日晨中央暨宋哲元及各大學各學團團體，為對北平學生愛國運動，多予優容，該捕學生，請從速釋放，文詞非常懇切，又全市學生二十日下午大請願，各校學生均出發，向北大街省府前遊行，秩序極佳。

（中央廿五日福州電）省三民主義教育會，決電平黨局，扶植學生愛國運動，並電慰北平受傷學生，對省會各員，由全體會員，分別勸導，對愛國運動，應力求避免，一切行動，切實準備力量，一致有效之努力。

（中央廿五日南京電）南京大學校長張伯苓，前赴川考察教育事業，昨由川飛京，訪談校長王世杰，請示一切，定日內即行返津，主持校務。

（中央廿五日）京電）赴滬慰問南開南下請願學生之彭師長謝樹英，敬應慰問，任務已完，途經滬津視察教外，謝廿四晚返京，據談本人平滬後，即向各生懇切開導，并於動便，各生均甚了解，並由伴送返校，即可恢復上課，此亦各生秩序極佳，本人廿五日已向省文團，下專委，領事，領事，領事。

（中央二十五日天津電）此間中等以上學校，除山下北洋外，一律令其請假，市立中學，亦自二十五日起，一律各官及，將該校學生，一律請假。

（中央二十五日保定電）保定軍警允於二十五日午在省府中入總堂，召各段代表，請假放假，各校五人，到二十餘人，醫學部等二十五日請假放假。

（中央二十四日保定電）保定公債，發售極盛，學生請願大憲請平北已入安定狀態，約努力求學，教務局，

（中央二十五日南京電）省府中書處文書會，二十五日晨中央及華北，對時



1935年12月26日，上海《中华日报》关于西安学生游行请愿的报道。

西安师范学生游行请愿队伍。1935年12月25日下午，西安师范学校学生及西安各中学学生，整队前往省教育厅、省政府请愿。反对华北分离中央，要求政府保全领土完整（1936年1月5日，天津《大公报》报道）。

周廳長昨召集

高中學生訓話

盼勿借救國名義作不軌行動

教育廳長周學昌氏，昨（二十九）日上午九時在高級中學校大禮堂召集該校全體學生訓話，屆時由府校長得源訓導學生二百餘人到場聆訓，周廳長以「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勉勵學生，並盼勿借救國名義，作不軌之行動，語極誠懇，至十時始畢散會。

国民党陕西教育厅长周学昌压制西安学生爱国运动的讲话（1935年12月30日《西京日报》）。

“西安师范学潮”

1935、1936年，陕西国民党当局，配合蒋介石准备发动的西北“剿共”内战，强化了对西安各级学校的控制和对学生的压迫。他们指派“西北剿总”政训人员参加各校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发表反共“精神训话”；实行门禁制度，禁止学生同外界来往；审查图书、杂志，撕毁学生壁报，禁止学生阅读抗日救亡书刊和谈论国事；宣扬读书“救国”；宣扬“拥护领袖”、“拥护蒋委员长的一切主张”与“绝对服从”等。

陕西国民党当局，还滥加罪名，不断逮捕学生。1936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肃反”会，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一次逮捕西安各校学生数十人，关到江苏反省院。他们还以“思想左倾”、“行为不轨”甚至借口“违反校规”，任意开除学生。

1936年10月13日，即蒋介石第三次来陕之前10天，西安师范学生罢课，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与奴化教育。国民党陕西当局竟采取镇压手段，当日夜秘密逮捕学生毕于仁、陈元芳、雒云舫等12人。第二天又挂牌开除王宏谟、张滋润等7人，扬言“不惜解散西师”。

西安师范学生的斗争，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扩大了。西安各校学生起而声援西师，走上大街，要求释放被捕同学，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要求实行国难教育。学生们发表宣言和《告社会人士书》。西安几家非官方报纸连续报道，发表社论，一论再论“西师学潮”。社会人心浮动，陕西国民党当局坐卧不宁。

“西安师范学潮”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西安，是广大学生为和平、民主、抗日而斗争的第一次联合行动，它推动了方兴未艾的西安民众运动，议者认为是西安学生爱国运动高潮的开始。

“西安师范学潮”之后，西安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



“西安师范学潮”中被捕学生的一部分。左起：孙彬水、毕于仁、田惠民、张思明、陈元芳、陈若菘、郝安民(未被捕)。

西安学生与文教界追悼鲁迅的斗争

1936年10月19日，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鲁迅逝世。西安学生与文化教育界人士，万分悲痛，准备追悼。陕西国民党当局得悉，竟多方压制破坏，并抢先在易俗社剧场开会，官办“追悼”。由于无人参加，未开而散。

1936年11月1日，西安文化教育界在马坊门民教馆举行“追悼鲁迅大会”，“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杨虎城夫人谢葆真、西安各文化团体、各学校、北平学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社会名流多人，致送挽联悼词，宋绮云、景梅九等人讲话，与会千余人，情绪至为热烈。

1936年11月7日，西安广大学生冲破国民党警特阻拦，在革命公园举行追悼鲁迅大会，国民党陕西当局大肆镇压，军、警、宪、特包围会场，主席台被破坏，鲁迅画像与挽联悼词被撕毁，广大学生同陕西省会警察局长马志超、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兼“肃反”专员彭震寰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然后在台下广场举行追悼，并请因《闲话皇帝》案而被国民党逮捕出狱不久的《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讲了话。



鲁迅(1881—1936)。

西安革命公园内之学生追悼鲁迅大会会场。



爱国有罪——“七君子”事件

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史良、王造时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国民党政府于11月23日命令上海市警察局逮捕了沈等7人，震动全国，史称“七君子”事件。“七君子”被押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七君子”事件，在西安引起强烈反应。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在洛阳多次向蒋痛陈舆情，要求释放沈钧儒等，均遭拒绝。同年，12月西安事变中，张、杨《八项主张》的第三项即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七领袖。”

▼ “七君子”。右起：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时

► 沈钧儒在狱中，自书“还我河山”以明志。



张学良与东北军又被驱上西北内战战场

东北军开进潼关

1935年5月，日本增兵华北，“华北特殊化”。同一个月，蒋介石增兵西北，坚决要打内战。

1935年6月13日，东北军于学忠部奉命由华北抗日救亡前线的保定撤退，首先开入潼关，转到陕甘宁苏区的外围。从此，张学良及其东北军：51军、53军、57军、67军和一个骑兵军约13万人，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中又被驱上了西北“剿共”内战前线。

西入潼关的东北军兵车(1935)。

左上：东北军57军军长于学忠。



张学良到陕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率军入关。1933年3月热河沦陷，南京政府为逃避舆论谴责，迫使张学良辞职出国。同年11月，为强化鄂豫皖“剿共”战争并利用东北军“剿共”，又电召张学良回国。1934年2月7日，张被任命为“鄂豫皖剿总”副司令。1935年6月“鄂豫皖剿总”改为蒋介石的“武汉行营”，张改任“武汉行营”主任。随着内战的转移，张又被内定为即将成立的“西北剿总”副司令。

1935年9月13日下午，张学良乘自备的“博鹰”号飞机由武汉飞抵西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到机场迎接。



在西安西关机场。前排左起：杨虎城、张学良、邵力子。



在西安新城大楼前(1935)。1935年9月13日，张学良到西安后，初住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前排左起：邵力子、王普涵、张学良、杨虎城、刘竹君。后排右起：龚明贤(2)。



张学良公馆——西安金家巷五号院
内之西楼。1935年9月下旬，张学良
由新城大楼移至金家巷五号，院内有
西、中、东三楼。张与赵绮霞住西楼。



西安金家巷五号院内之中楼。
张学良的侍卫、副官们住此。



西安金家巷五号院内
之东楼。为张学良管理
函电的职员们住此。

1935年冬，张学良到陕后，杨虎城陪同张学良视察17路军兵营。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

1935年10月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特意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该部为蒋介石在西北进行内战的最高军政指挥机关。

1935年10月3日，上海《中华日报》的报道。

“西北剿总”所在地——西安南院门。

澈底肅清匪患將在西安設立

西北剿匪總司令部

俟組織就緒蔣委員長親往巡視

將來由張學良常駐指揮一切

匪主力竄至甘川陝邊境我即開始圍剿

非岳秀擊潰陝北劉股殘匪竄橫南山地

川匪圖竄甘青不逞隴東岷縣已無匪蹤

(中央二日南京電) 國府二日令，特派中正兼西北剿匪總司令，張學良兼副司令此令。
(中央二日北平電) 軍部當局為澈底肅清西北匪患起見，擬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由蔣委員長自兼，張學良副司令，蔣委員長到西安後，恐不能久居西安，茲擬由張學良任副司令，蔣委員長到西安後，即行赴西安，指揮一切，總司令部兵站處業已開始籌備，俟正式命令發表後即可宣告成立，聞蔣委員長即行赴西安一行，現陝甘軍力頗稱雄厚，俟調度妥當即開始圍剿，匪共匪主力則已竄至甘川陝邊境。
(中央一日徐州電) 共匪劉子丹股，日前由安定竄至橫山縣城，被非岳秀騎兵大隊及野圍擊擊潰殘日，斃匪八百餘名，匪不支潰向橫山南逃，我軍仍追擊中。
(中央二日包頭電) 王靖國師二日晨急五原，定五日開五原臨河安北防共會議。
(中央一日長沙電) 蔣委員長到西安後，即行赴西安，指揮一切，總司令部兵站處業已開始籌備，俟正式命令發表後即可宣告成立。



为“围剿”初到陕北的红军

蒋介石第二次来陕

陕北三大战役

1935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日红军多次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但南京政府仍坚持要打内战，并要东北军替“中央军”打头阵。东北军以10万之众发动了对陕甘宁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5年9月，东北军110师何立中部，在甘泉劳山地区与红15军团作战，全军覆灭，师长何立中被击毙。官兵3,000多人被俘。是为“劳山战役”。

1935年10月25日，东北军107师619团高福源部，在甘泉榆林桥地区与红15军团作战，四个营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是为“榆林桥战役”。

1935年11月，东北军109师牛元峰部，在鄜县直罗镇地区，与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作战，全部被歼，师长牛元峰被俘，在追击战中，又歼灭106师一个整团于黑水寺。是为“直罗镇战役”。此时，张学良在南京，接西安“西北剿总”来电，始知又打了败仗。

当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时，《三民主义月刊》报道：“有谣传说，这次指定东北军‘剿共’，实为计划消灭东北军，就象以前消灭各省地方军一样。”现在，在短短三个月中，东北军主力在“剿共”战争中连吃

劳山。

败仗，一个师长阵亡，一个师长被俘，七个团长阵亡或被俘，为东北军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重大损失，在其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南京政府对东北军不予补充，反而撤销了110师、109师番号，减发军饷。对生者不安置，死者不抚恤。东北军感到没有了出路。

榆林桥及其附近高福源部驻地。





董英斌(1935)。

董英斌，东北军57军军长。1935年10月率5个师，进攻陕、甘、宁苏区，11月直罗镇一役，被红1军团与红15军团彻底打垮。张学良因此免去董的军长职务，改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



直罗镇战役之战地(1935)。

张学良、杨虎城飞抵陕北榆林绥德视察

1935年下半年，北上抗日红军，进到甘肃固原一带。蒋介石在四川曾多次催促张学良、杨虎城截击。同年9月20日，张学良赴陕北前线“督剿”，东北军110师何立中部与红军战于劳山，全军覆没。10月5日，张学良飞成都见蒋后，6日同杨虎城飞抵绥德、榆林一带视察部队(当时，国民党在陕北的地方部队有井岳秀的22军，高桂滋的86师)，当日返西安。7日，张一人又飞抵太原晤阎锡山，阎允许派军开陕“助剿”，8日下午始飞回西安。尽管张杨如此奔忙，蒋介石对他们仍不放心，8日上午由四川飞西安，同邵力子、杨虎城研究了陕西“剿共”军事形势。11日，蒋飞洛阳。13日，又飞太原，把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召到太原，和阎锡山共同策划“围剿”初到甘肃固原、平凉和陕北一带的红军。

在榆林飞机场(1935年10月6日)。前排左六起：高桂滋、张学良、杨虎城、井岳秀。后为张学良座机“博鹰”(今译波音)。





在镇北台前。1935年10月6日张学良、杨虎城视察榆林。镇北台，位于榆林北7.6公里处，为明代烽火台基址，台高三层，外用石砌。

1935年10月6日张、杨视察榆林。
张学良在会上演讲(讲台上右)。



1935年10月6日在榆林。左起：高桂滋、井岳秀、张学良、杨虎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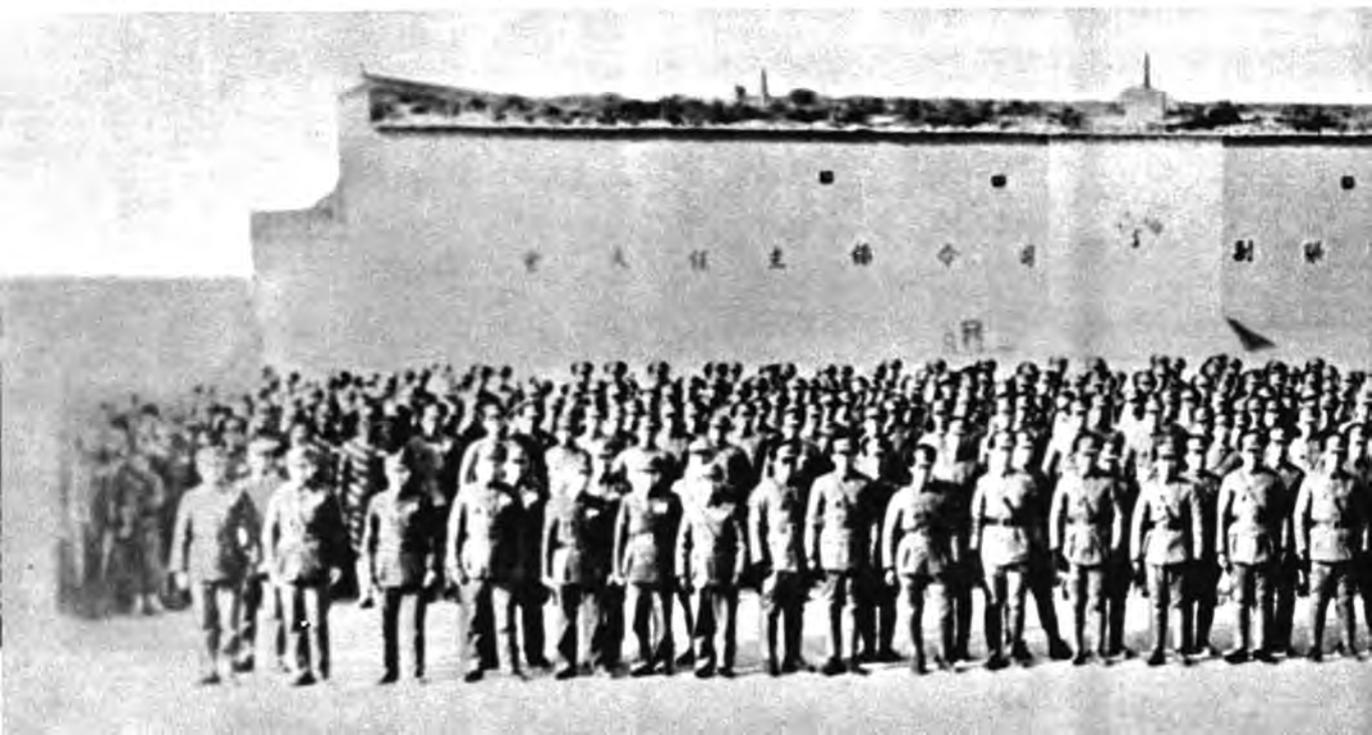


张学良骑自行车在绥德视察部队。

张学良视察部队时和士兵同餐。



1935年10月6日，张学良、杨虎城视察绥德。绥德是延安通往榆林的交通枢纽。





张学良在绥德演讲。



张学良(右)杨虎城(左)在绥德。



中国共产党同杨虎城、17路军的合作

南汉宸同杨虎城的来往

杨虎城是陕西实力派领袖，掌握着17路军的兵权，受蒋介石势力排挤，具有民主抗日思想。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能。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开始争取杨虎城和17路军同红军合作，一致抗日。《八一宣言》发表不久，在天津工作的共产党人南汉宸，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于1935年11月到南京见杨虎城（当时杨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告以《宣言》内容，建议双方合作，并提出：双方停战、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开放交通、购买物资、建立秘密交通站等六条具体办法。杨赞成《八一宣言》，并同意与陕北方面沟通关系。

南汉宸(1937)。

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洞人。共产党员。1930年杨虎城主陕时期任陕西省府秘书长。1932年冬，因南京政府通缉离职。在津沪等地从事共产党的工作。西安事变后回陕，受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领导，主持设计委员会的工作。



王炳南在杨虎城部工作

王炳南陕西乾县人，共产党员。曾留学德国。1936年春回国，经共产党指派，在杨虎城部工作，负责杨与中共的联系。



► 1936年秋，杨虎城与王炳南在陕西临潼。

王炳南(1936)。

汪锋、杨虎城会谈

直罗镇战役之后，1935年2月，中共中央派汪锋拜访杨虎城。汪锋由邠县西部的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出发到西安。

汪到西安时，持有毛泽东、彭德怀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信。毛泽东在致杨的亲笔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两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闲下一军，联镳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汪锋在西安一个多月，同杨虎城三次会谈，向杨说明西北大联合倡议，解释了误会，商定双方合作抗日，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建立联络点等。汪经三原、淳化返回关中苏区。

杨虎城对汪锋之来非常高兴，认为自己过去同共产党来往接触的都是中共地方党一些人士，而这次则是共产党中央直接派人前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看法和关于合作的诚意。



汪锋(1946)。

毛泽东致国民党统治区各方人士的信。1936年，中共中央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曾先后派代表到国民党统治地区，与各地方当局和军队将领协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事宜，凡派出之代表，均持此类信件。



先生鑒
日寇侵略國家危在旦夕
一若輩起頭成堅固的抗日陣綫為着重慶保衛
平津保衛冀察晉綏山東總仇敵血戰到底
之總方針而斗争等語
決心甚為欽佩
同志商末語
請中接洽交授意見並賜指示以期驅除強
敵共救危亡臨書不勝屏營繫念之至
致
抗日民族戰爭之政孔
汪鋒
十月十五

王世英杨虎城会谈

1936年2月，应杨虎城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等问题作了商谈。

王世英(1952)。



1936年11月，红军交通站在西安设立，按照中共方面与杨虎城达成的协议。运输站给陕北装运物资。



张文彬、杨虎城会谈

1936年8月，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最后，就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达成了口头协议。协议确定后，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对外名义是17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此时，红军秘密交通站已设立了六处，计：西安三处，淳化一处，宜川一处，洛川一处。



张文彬(1936)。

孙作宾、孙蔚如会谈

孙作宾(1909—)，西安市坝桥区人。共产党员。长期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至1936年曾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中共中央交通员。西安事变前夕，曾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争取17路军17师师长孙蔚如的情况，后又携带毛泽东致孙蔚如的信回西安，与孙会谈。



孙作宾(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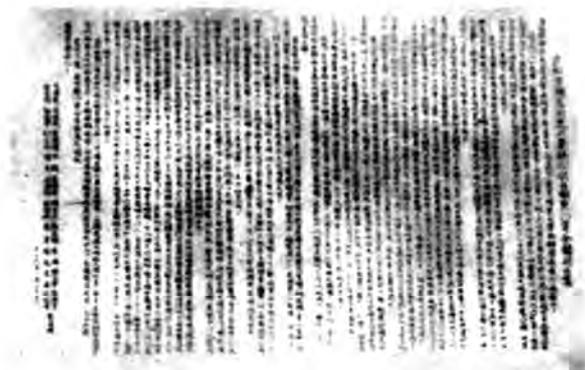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东北军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估计

“9.18”事变中，张学良及东北军放弃守土责任，听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退入关内，丧失人心，受全国人民指摘。东北军退入关内之后，又听从蒋介石的“安内”命令，不断在鄂豫皖与西北“剿共”，连吃败仗，特别是在陕北三大战役中，损兵折将，士气大挫。加上，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红军在陕北前线对东北军的争取，东北军内部反对内战，要求抗日和“打回老家去”的呼声日益高涨。此种情况，使张学良逐渐认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是极其错误的。“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在外敌侵略中，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倒行逆施，丧失人心，丧失土地，结果只有“同归于尽”。因此，张学良一再表示：“非抗日不能统一，要抗日必须联共”。

中国共产党分析了这种情况，特别是张学良同蒋介石之间的某些变化，决定：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同红军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1936年初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也成立了以刘澜波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上到下，从各方面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同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同年1月25日，中国抗日红军将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人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略谓：“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希望共同协商，联合抗日”。同年春，周恩来在《在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东北军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争取东北军及其他可以联合的力量，迅速实现对日作战”的政治任务和战略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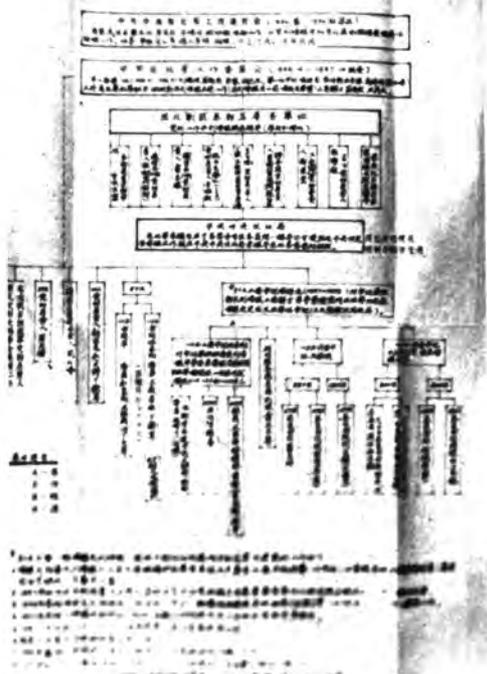


《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周恩来《在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手稿。



中共东北军党的组织系统状况



中共东北军党组织系统状况



刘澜波(1936)。

刘澜波(1906—1982)辽宁省凤城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31年“9.18”事变后，在辽宁参加抗日义勇军。1933年到东北军骑兵二师工作，以后主要在东北军和东北流亡人士中从事革命宣传和统战工作。曾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组书记等职。

张学良多方寻找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多方争取张学良及东北军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时候，张学良也在多方寻找中国共产党，表示愿与中共方面保持接触，共商合作抗日问题。

1935年11月下旬，张学良在南京开会之后到达上海看望上海《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此时，杜因《闲话皇帝》案，尚在狱中），杜在密谈中批评了张学良过去的一些作法，并向张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杜重远认为：中共不久前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东北的主力又集中在陕西、甘肃。在此情况下，完全有条件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杜还认为：杨虎城思想进步，主张抗日，同样有合作的可能。中心点是联合中国共产党，杜重远说：“不联共抗日，就是空谈抗日”。

张学良与杜重远密谈后，于12月中旬，在上海又秘密会见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和杜重远的意见一致，主张联合起来抗击日本的侵略。张向李表示：愿在西北与红军合作，与杨虎城合作。张以为：此时中共中央仍在上海，便委托李杜在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要同中共负责人直接商谈这些问题。

张学良还想通过北平学生运动的一些负责人寻找共产党，他曾当面问宋黎是不是共产党。



杜重远(1936)。

杜重远(1898—1944)，吉林省怀德县人，东北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张学良私交较深。1931年“9.18”事变后，杜在上海一面办实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继邹韬奋之后任《新生周刊》主编。1935年6月由于在《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涉及日本天皇，遭日方抗议，被南京政府判刑一年又两个月。1936年9月出狱，10月到西安。11月7日，参加西安学生追悼鲁迅大会并讲了话。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1943年6月13日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高福源奔走于瓦窑堡与洛川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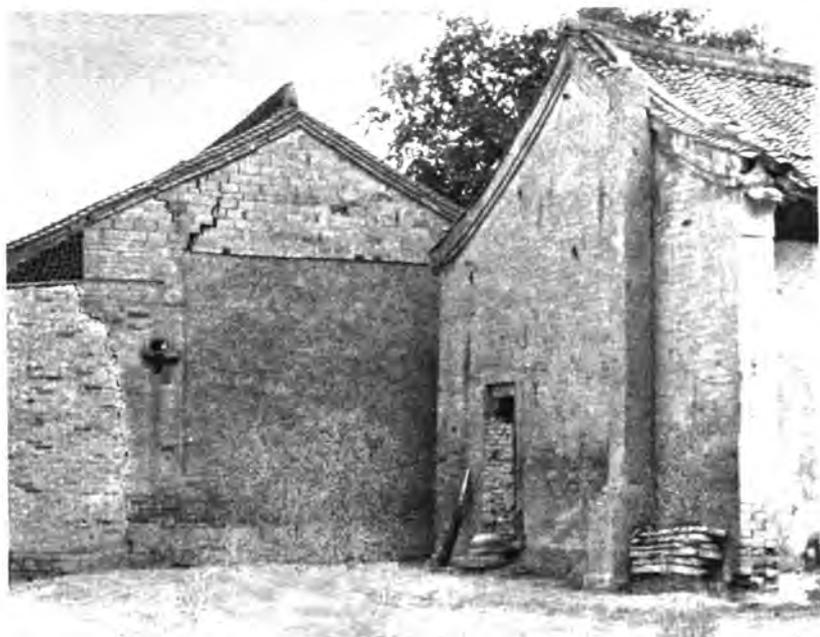
洛川会谈，是经高福源的奔走而促成的。高是沟通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主要人物之一。1935年10月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高福源，在瓦窑堡受到共产党和红军的优待。高参加“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书籍、材料，进步很快。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剿共”内战政策以及利用“剿共”削弱与消灭东北军的阴谋如大梦初醒，有了强烈的抗日要求，自愿做沟通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使者，要求返回东北军，亲自劝张学良与红军合作抗日。1936年1月，高福源带着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致张学良的信回到洛川，首先见到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接着又见到由西安飞到洛川的张学良。张学良听了高福源的一切陈述之后，确定派高仍回瓦窑堡，约请中共中央派代表于洛川相见。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持张学良信，由洛川回到瓦窑堡，向周恩来副主席作了全面汇报。



为洛川会谈而奔走的高福源(青年时代)。

李克农、王以哲洛川会谈

洛川会谈地址——东北军67军军部。



中共中央接受张学良所提在洛川会谈的建议。1936年2月21日，中共派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偕同苏区外贸局局长钱之光等一行五人，由高福源陪同，从瓦窑堡出发，25日于大雪中到洛川。张学良因事去南京委托王以哲和王的参谋长赵镇藩妥为招待，先谈局部具体问题。

李克农、王以哲在会谈中主要商谈了东北军67军(王以哲部)与红军的合作，协议如下：(一)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67军在肤施、甘泉、鄜县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67军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购买；红军转饬地方政府发动群众送柴粮进城，恢复正常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双方均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之责；(五)67军在甘泉的两个营被红军包围半年要求红军不加阻挠，准予换防。甘泉城10里内及肤施、鄜县公路沿线双方均不驻军，以保证双方安全。

李克农、张学良洛川会谈

1936年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回西安，第二天飞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张首先表示，赞成李克农、王以哲双方已经谈定的具体协议。然后希望李克农谈谈中共对时局的看法，李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了说明，张学良提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主张反蒋抗日”？“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张估计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况且他手中主要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兵权，抗日必须联蒋。李克农强调：要共同抗日必须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但蒋介石专打内仗，拒不抗日，所以把他不能列在团结的范围内，如果蒋真的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团结抗日，对他的态度当然可以重新考虑。张、李两人经过争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又转入其他问题的交谈。双方协议，（一）共产党派一位负责人（在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中选派），共商抗日大计，会谈地点在肤施城，时间由中共方面确定。（二）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由张学良与新疆盛世才联系。（三）中国共产党派出一位相当负责而又声名显赫的人物常驻西安，便于同各方接洽，组织和扩大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这次会谈中，张学良一再表示，希望能见到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



红军代表、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1935）。

刘鼎、张学良西安会谈



刘鼎（1983）。

1936年初，张学良在上海曾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并曾委托李杜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936年3月李杜电告张学良“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此时，张学良已在洛川和李克农会谈过，但对李杜介绍的朋友仍很重视，当即派他的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迎接李杜介绍的朋友——刘鼎到西安。3月11日，张学良与刘鼎第一次谈话，刘向张说明此次来西安是听取意见和要求，然后去陕北中共中央汇报，再作正式回答。此后十多天，张、刘多次长谈，刘对张所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原则性的回答，得到张学良的称赞。

周恩来、张学良肤施会谈

洛川会谈中，张学良曾希望能见到中共中央负责人，这个愿望实现了。

1936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克农关于洛川会谈的汇报。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同张学良会谈。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会谈有关问题：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商谈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商谈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肤施会会谈地址——城内的天主教堂。

4月9日上午，张学良自驾飞机，由王以哲、刘鼎陪同飞到肤施。当日晚8时，周恩来等进城，即同张学良等彻夜长谈，直到10日凌晨4时。两方参加会谈者为：张学良、王以哲、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会谈中，张学良重提到底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不应把蒋排斥在外。蒋的错误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我们要设法把他从这种错误中扭转过来。应该采取各种办法，迫使蒋介石走向抗日的道路，“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逼，内外夹攻”。周恩来听了张学良的意见后，郑重表示，这是一极为重要政策问题，需要提请党中央考虑后，再作答复。

肤施会谈，对停止内战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红军集中到河北抗日问题，派代表赴苏联问题，通商问题等，都进一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真正“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具有决定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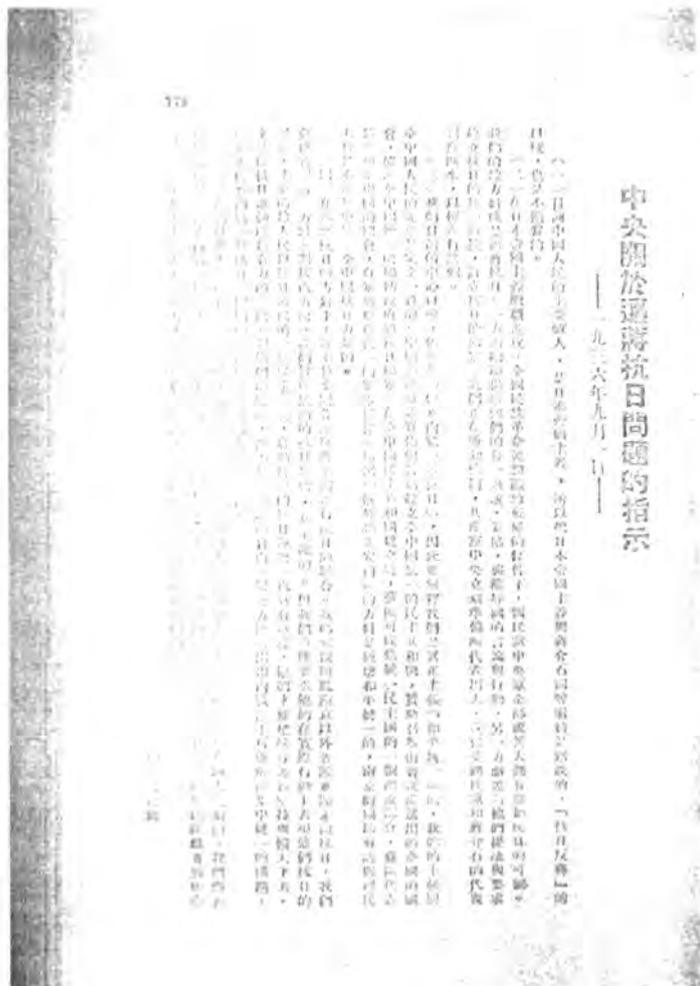
1936年8、9月间，中共中央委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东北军、17路军改造部队，准备抗日。



肤施会谈中周恩来与张学良聚餐。

左起：张学良、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对蒋政策的转变——逼蒋抗日



肤施会谈后，中共中央慎重考虑了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的意见，故在5月5日发表的红军抗日先锋队东征回师通电中，即不再有“反蒋”的提法，而是向“南京政府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1936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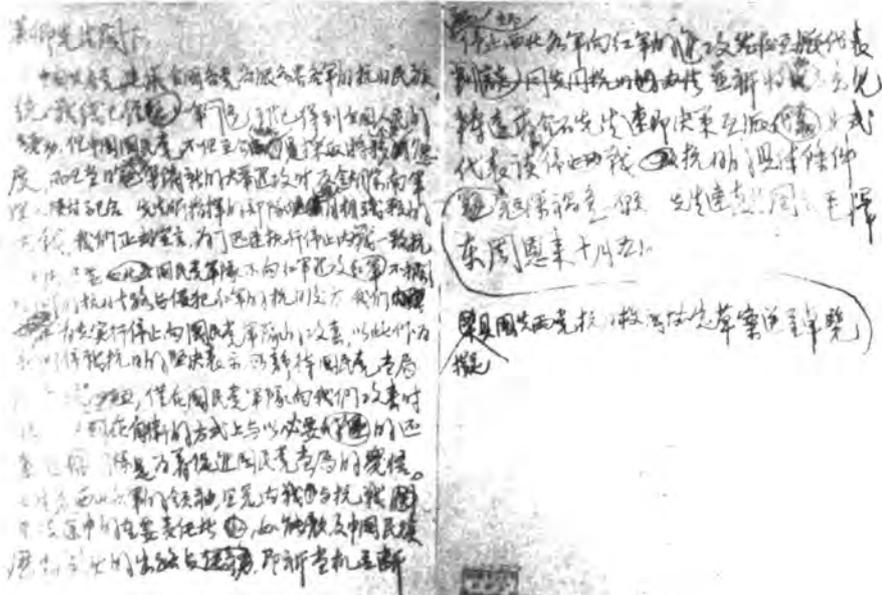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中共这一主张转达蒋介石。

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一）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单独拿出来同等的看待，「抗日反蒋」的提法，也是不适当的。
（二）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应当把日本帝国主义单独拿出来，作为我们主要的敌人，而把蒋介石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的口号，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不是「抗日反蒋」。
（三）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应当把日本帝国主义单独拿出来，作为我们主要的敌人，而把蒋介石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的口号，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不是「抗日反蒋」。
（四）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应当把日本帝国主义单独拿出来，作为我们主要的敌人，而把蒋介石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的口号，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不是「抗日反蒋」。
（五）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应当把日本帝国主义单独拿出来，作为我们主要的敌人，而把蒋介石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的口号，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不是「抗日反蒋」。
（六）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应当把日本帝国主义单独拿出来，作为我们主要的敌人，而把蒋介石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的口号，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不是「抗日反蒋」。
（七）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应当把日本帝国主义单独拿出来，作为我们主要的敌人，而把蒋介石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的口号，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不是「抗日反蒋」。
（八）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应当把日本帝国主义单独拿出来，作为我们主要的敌人，而把蒋介石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的口号，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不是「抗日反蒋」。
（九）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应当把日本帝国主义单独拿出来，作为我们主要的敌人，而把蒋介石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的口号，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不是「抗日反蒋」。
（十）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应当把日本帝国主义单独拿出来，作为我们主要的敌人，而把蒋介石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的口号，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不是「抗日反蒋」。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稿。

为联共抗日而斗争

张学良创办学兵队

1936年2月，张学良邀请在北平的东北学生马绍周、宋黎等人到西安工作。

同年9月，张学良为培养抗日骨干创办政训队，后改称学兵队。学兵队一时成为北方流亡学生的集中地。学员多为参加“12.9”爱国运动的北平大、中学生和抗日积极分子。学兵队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由驻在这里的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和马绍周领导。先后到学兵队讲话的有刘澜波、刘鼎、苗剑秋、应德田等。这批学员经过训练后，大都成为东北军的中层军政干部与抗日骨干。



学兵队地址——西安东城门楼(1936)。

张、杨联合举办王曲军官训练团

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后，决心整顿内部。根据中共“改造部队、准备抗日”的建议，张学良于1936年4、5月间同王以哲等在洛川商议，决定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团的建立，标志着张、杨联共抗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训练团的团址在陕西长安县南的王曲镇。6月末开学。训练团由张、杨分任正副团长。教育长1、2期为王以哲，3、4期为黄显声。总队长为缪激流。学员为东北军、17路军连以上军官。每期500余人，训练两个月，共办四期。每期开学典礼会上都由张、杨讲话，张在讲话中，以“披甲还乡”、“打回老家去”和“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相号召。学员中要求抗日与反对内战的气氛极为浓厚。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需要准备”等谬论。

张学良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的住处和办公室——太师洞上。



总队长缪激流(摄于台湾)。





1936年6月，杨虎城(左)于学忠(右)视察王曲军官训练团时，在王曲野外。



杨虎城(门口)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视察。

西安举行“东北沦陷五周年纪念大会”



1936年9月18日，在西安南院门“西北剿总”门前举行“东北沦陷五周年纪念大会”。会场公开贴出“团结抗日，共赴国难”“放弃安内必攘外的政策”等标语。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提出“组织西北五省联军”的建议。张学良在会上发表演说，向学生群众说：“我张学良在千军万马中毫不畏惧，但在大家面前深感不安和惭愧。因为我是国家民族的罪人。”会后接见群众代表，一再说：“要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表示了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

张学良在“9.18”国难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演说。



1936年9月18日，为纪念东北沦陷五周年。
西安学生举行集会。图为会场的悲壮情景。

“还我河山”！流亡西安的东北学
生在“9.18”五周年时的纪念活动。

纪念会后之游行队伍。



宋黎事件

宋黎，北平学联和东北大学学生会代表，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分子。1936年春，来西安作抗日救亡宣传，除在东北军中宣传之外，也曾受杨虎城接见，并在西安绥靖公署纪念周会上讲话，宣传东北沦陷后的惨状和北平学生运动情况。

1936年8月28日晚，宋在西安东大街西北饭店被预先埋伏的“中统”特务秘密逮捕，同时被捕者有马绍周。前往探望宋黎的张学良的副官关沛苍亦被逮捕。

宋黎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绑架，在被解押途中高喊“土匪绑架！救人！”适遇17路军宪兵营巡逻队。巡逻队问：“为什么抓人？”特务们声称：“奉蒋委员长命令，抓共产党”。巡逻队要看逮捕证，特务们说：“我们抓人从来不用逮捕证”。巡逻队说：“没有证明，随便抓人。土匪！”，即将宋黎与特务们一起带至17路军宪兵营，宋黎得救。

张学良问明情况后，又悉马、关两人已被解到省党部并很快要解送南京，即找省主席邵力子询问，邵说不知此事。经邵查问后，始悉省党部奉命逮捕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等人。张学良对非法逮捕抗日人士十分义愤，次日晨六时派卫队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救出了马、关二人。



宋黎(1936)。



被张学良派卫队查抄了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办公室。

张学良“双十节”西安阅兵

1936年10月10日，为民国25年度国庆纪念。此时杨虎城应蒋召赴杭，张学良于西安阅兵。张在讲话中强调“今日外侮频仍，失地未复，吾辈身为军人者，对此奇耻大辱，实又不能时刻或忘”。同日，报纸发表杨虎城题字：“勿忘国耻”。

同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派员张丹柏则对对外屈辱妥协、对内战争的国民党开脱罪责，竟谓：“‘9.18’国难发生，乃历史的各种因素之累积，非本党应负其咎”云云。

1936年10月11日，国民党《西京日报》关于张学良在西安阅兵消息的报道。

各界舉行慶祝會

張代總司令閱兵

對受閱官長訓話勉以為國雪恥

黨政軍各機關領袖均參加陪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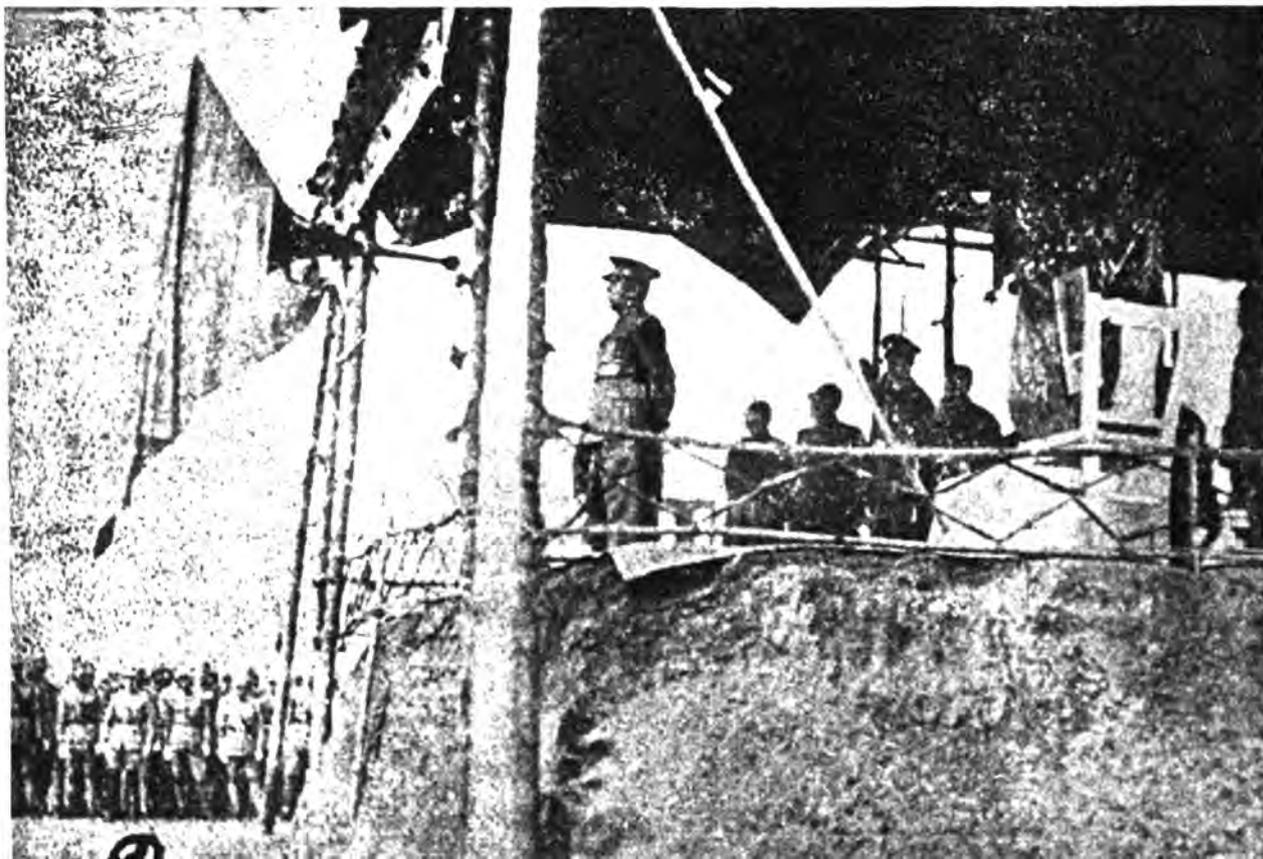
國慶紀念日，西北四省領袖及各機關領袖，特於上午九時在西安西門外舉行閱兵大會，由張代總司令親臨主持，並對受閱官長訓話，勉以為國雪恥。屆時各機關領袖均參加陪閱，場面極為熱烈。

閱兵大會由上午九時開始，由張代總司令親臨主持，並對受閱官長訓話，勉以為國雪恥。屆時各機關領袖均參加陪閱，場面極為熱烈。

張代總司令在訓話中，首先對全體官兵表示慰勉，謂：今日為國慶紀念日，吾人心中實有無限感慨與快樂之感。同時值今中外無日不談，失地未復，吾輩身為軍人者，對此奇耻大辱，實又不能時刻或忘。今日外侮頻仍，失地未復，吾輩身為軍人者，對此奇耻大辱，實又不能時刻或忘。今日外侮頻仍，失地未復，吾輩身為軍人者，對此奇耻大辱，實又不能時刻或忘。

閱兵大會由上午九時開始，由張代總司令親臨主持，並對受閱官長訓話，勉以為國雪恥。屆時各機關領袖均參加陪閱，場面極為熱烈。

张学良向受阅部队讲话。



不分畛域，年來電切聯絡，團結堅固，已足為全國之模範。此後地方與地方，中央與地方，能若切實。雖理道實行均權。而如新疆孤懸西陲，消息隔絕，另成局面；西北各省，均苦貧瘠，中央能以昔日應付兩粵之物力財力移於西北，則建設前途當更有焉，自不待言。

勿忘國恥

楊虎城題

凡此所陳，卑之無甚高論，辱承西京日報遠道徵詢，聊貢芻蕘。竊願以民國成立二十五年之日，為西北建設發軔之時，則此後年年國慶，在西北，猶有特殊價值，豈獨西北之幸，亦舉國之福利的攸賴也。謹以為祝。

關於實業教育實施上幾

點之商榷

齊敬齋

緒言

今日為民國二十五年之雙十節，各界人士熱烈慶祝，演講作文，不一而足，洵盛舉也！願吾人在此興高彩烈之時，偶念及先烈創遺之艱難，則對於吾人以往之言行，應加以深切之檢討，默思所言者是否為心之聲，能否見諸實行，會否期其實行，既行之後，是否能行之而不惑？如是探索，則吾人自不敢作不由衷之言，而一切皆惟出之於「誠」。「誠」之所至，金石為開，則所言者自可見諸實行。是吾之旨，乃為吾之主張。吾以熱烈情感以赴之，以實踐態度而守之，自能不為外物所誘，見異而思遷矣。果如斯，則所著者為學，理可開明，所言者為行，品可敦篤，所著者為社會問題，風俗可為之轉移。非然者，實論自實論，

1936年10月10日，楊虎城為紀念“雙十”節題詞。

東望

東北為何偉大，如何富饒？在我國經濟上國防上如何重要？以及關係我民族生存上如何密切？世人之論，至詳且備。所欲告我武裝同胞者：不徒東望，必須東歸，不達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方不愧為東北健兒，方不愧為現代革命軍人。

王以哲 二五〇二

1936年10月11日，東北軍67軍軍長王以哲為《東望》雜誌題詞。

张学良杨虎城联合纪念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

北洋军阀吴佩孚以武力控制华北后，又极力向西北扩张。

1926年北伐中，属于北洋军阀势力的河南镇嵩军首领刘镇华，以所谓“陕甘讨贼军总司令”名义，亲率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大举犯陕。5月11日，包围西安。

当时驻西安的有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部、国民军第二军第一师李虎臣部、第四师卫定一部，他们当镇嵩军越过潼关直驱西安的紧急关头，在共产党人魏野畴参与讨论之下决定联合行动，坚守西安。坚守西安的战争，经过八个月，死伤军民四万余人。

同年9月，冯玉祥、于右任及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由苏联回国，接受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建议：“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师潼关，策应北伐”。于五原誓师，组成国民联军，挥师入陕，击败镇嵩军。11月28日，西安围解。

1936年11月28日，为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为发扬坚守西安的革命精神和呼吁抗日，杨虎城和张学良联合举行纪念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大会。会场设西安革命公园，东北军部队和17路军部队肩并肩站在一起。张、杨先后发表演说。大会提出，“用死守西安击退刘镇华八个月围城的精神，反对内战，支援绥东抗战，保卫西北”口号。张学良在讲话中，对杨虎城坚守西安、策应北伐的革命精神，予以高度评价，勉励17路军以更坚强的意志与牺牲精神，同东北军一起对日军作战。杨虎城在讲话中表示：17路军愿在张副司令的领导下，共同抗日。



张学良在讲话。

杨虎城在讲话



杨虎城陪同张学良进入大会会场。





纪念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大会会场。

西安各界向坚守西安而死难的军民致哀。前排左起：杨虎城、张学良。





冯玉祥将军(1926)。

冯玉祥(1882—1948)，北洋军阀时期曾任旅长、师长、督军、督办。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将部队改组为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取消废帝溥仪宣统年号。1925年国民军第一、二军在华北、河南失败，一军退至南口，坚守察绥，仍遭奉军压境。10月，冯赴苏考察并寻求军事援助。1926年9月17日，冯回国于五原誓师，就任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

1926年坚守西安之陕军总司令李虎臣，陕军副司令杨虎城(右)。



红军东征

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号角。

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

中国共产党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于1936年1月15日，以红军主力第1军团、第15军团和第28军，约30,000人，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陕西出发，东进抗日。1936年2月20日，抗日先锋军由北起绥德沟口，南至延长延水关一带200里的防线上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境内。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同日军直接作战。2月21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即《东征宣言》）。

抗日先锋军在山西同阻拦前进抗日的晋军、国民党军作战中，所向披靡。先锋军越过吕梁山，直插汾河流域与同蒲铁路沿线，北至苛岚县，南至距离太原25公里的晋祠。先后占领与围困了吉县、隰县、石楼、祁县、永和、孝义、汾阳等48县。消灭阎锡山的晋军和国民党军17,000多人。



1936年2月20日，从延水关至河口一线东渡黄河的红军抗日先锋军。





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佈告

——九三六年三月十日——

爲佈告事：照得日本帝國主義橫行強北，無人制止。蔣介石、閻錫山、宋哲元、馮玉祥、張學良、關外成性。全國喪亡。迫在聯軍。中華蘇俄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擬定本軍，東行抗日。一切愛國志士、革命仁人、不分階級、不分出身、不分國籍、凡願同情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本軍均願與之聯合，共同進行民族革命之偉大事業。本軍所到之處，保護貧苦農民，保護革命利益，保護知識分子，保護工商業。本軍主張停止一切內戰，紅軍、白軍聯合起來，一致對日。本軍願與全國人、不論階級與本軍聯合抗日，或消極的不反對本軍及愛國人民抗日者，本軍均願與之進行協商、協定或合作。凡中華人民願爲日本帝國主義、凡屬賣國賊之類，均應一致奮起，團結爲國。夜之不存，毛頭不存。凡屬賣國賊、身居何處？建義於國中，申天討於萬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以當十。是救國唯一之途。是救實力。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必倒，勝敗之數，不勝自明。其有不明大義，煽惑民衆，甚至勾結日寇者，是百業之國人，本軍當以重行實國賊罪。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自由平等與進步！救中國前途！特此佈告。

總司令 彭德懷
總政治委員 毛澤東

佈告。

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的紅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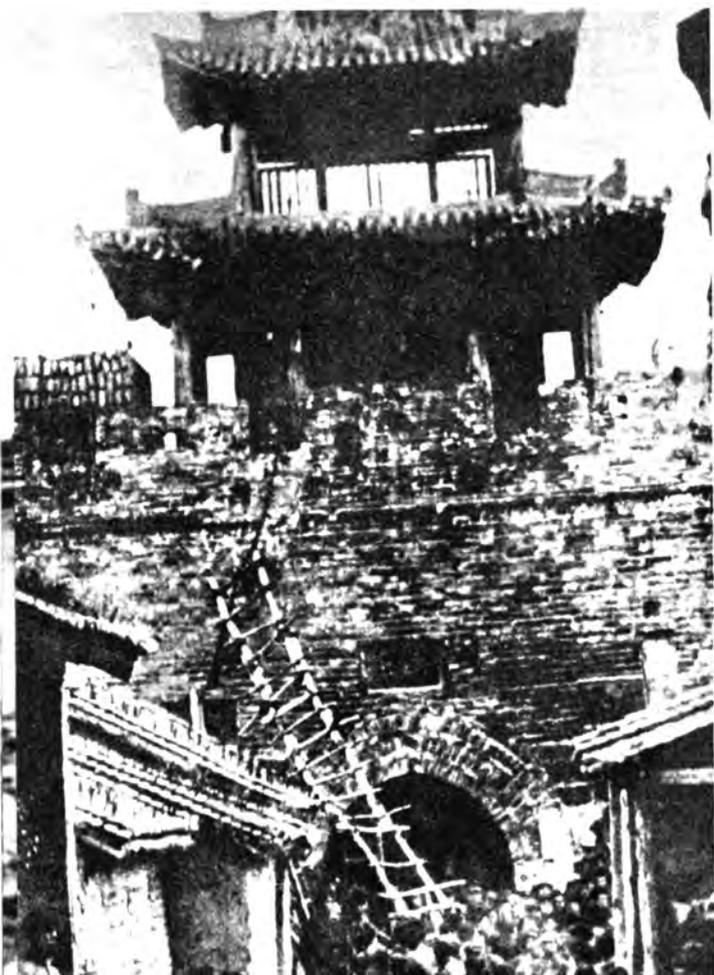
東渡黃河的紅軍抗日先鋒軍騎兵。





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红军。

红军抗日先锋军攻占祁县。



刘志丹(1935)。

刘志丹(1902—1936)，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学生。1928年与唐谢、谢子长等组织陕西渭华暴动，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暴动失败后返回陕北。1928年，参加中共陕北特委，任军委书记，1931年“9.18”后，和唐谢等组织西北工农革命军，任副指挥及参谋长，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历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与参谋长等职，创建陕甘苏区。1934年冬，率主力红军与陕北地方游击武装汇合，先后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扩大了陕北苏区。1935年秋与红25军会师，组成红15军团，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936年，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任红28军军长。同年4月中旬，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时年34岁。

红军抗日先锋队回师黄河西岸

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把抗日的旗帜插到黄河以东，极大地鼓舞了华北人心，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为堵截红军抗日先锋队抗日去路，蒋介石调集洛阳、徐州、浦口等地重兵30万人入晋，协助阎锡山的晋军与抗日先锋队作战。并令张学良、杨虎城向陕北红军后方进剿。

敌寇深入，国难当头，岂容同室操戈。红军抗日先锋队从民族利益出发，不愿同阻拦抗日去路的国民党军作战。认为：“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

同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回师通电》）并将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回师通电》说：为了避免“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內，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回师通电

为策划更大规模内战蒋介石第三次来陕

仆仆登华岳 风烟望三秦

1935年，日本大举进犯华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蒋介石仍然决意要把内战打下去，而且准备在西北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

1936年，蒋介石在扼杀了“两广事变”之后，两次入陕，调兵遣将，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扬言要用两星期(至多一个月)，血洗陕甘宁苏区，彻底消灭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1936年10月22日上午12时，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秘书毛庆祥等十余人，由南京飞陕，当日下午3时到西安。驻华清池“行辕”。是为蒋介石第三次来陕。10月25—26日，蒋介石忙里偷闲，约同张学良，畅游华山、潼关山。

蒋介石由西安至临潼华清池“行辕”。



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西安绥靖公署招待大楼前(1936.10)。

华清池大门(1936)。





在华山苍龙岭。

由华山南峰去西峰途中。





在华山绝顶。
左起：张学良、蒋
介石。



在华山北峰。
左起：张学良、蒋
介石。



在潼关山上。
蒋介石在潼关山上翻阅
《潼关名胜要览》。

蒋介石王曲“训话”

1936年10月26日，蒋氏游罢华山，27日上午召见“西北剿总”高级职员，宣布“剿共”计划。并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张学良对蒋据理相劝，认为：为了拯救国家民族，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说：“这是东北军大多数将士的希望，全国人民的要求。”蒋闻言大怒，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

召见杨虎城时，杨表示：“部队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值得忧虑。”蒋说：“风吹草动，兵随将走，统帅不动摇，士兵就不会动摇。”“剿共势在必行。”“士气问题我来解决。”因此，蒋决定向军官们“训话”。

1936年10月27日下午，蒋介石由蒋鼎文、顾祝同陪同特意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以示“统帅的不动摇”。蒋在“训话”中说：“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为不孝，在国为不忠”。“对不忠不孝的军人要制裁”。又说：“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这是东北军必须要打的敌人。日本离我们很远。”“如果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就是远近不分，内外不分，是非不分，缓急不分，本末倒置，便不是革命”。蒋的“训话”，既是一次内战动员，又是对反对内战的军官们一种威胁与警告。

在王曲。蒋介石(右前)、杨虎城(左前)、张学良(杨后)。



1936年10月27日下午，正在“训话”的蒋介石。





在王曲。
蒋介石(岗亭前)、杨虎城(戴眼镜的左后)、张学良(右起三)。

苗剑秋怒斥《王曲训话》

1936年10月间,西安与南京之间,在“剿共”内战还是联共抗日问题上的斗争,进一步激化了。

蒋介石的《王曲训话》,激起了军官训练团学员们的强烈不满。第二天,东北人士苗剑秋,应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邀请,赴训练团讲话。苗慷慨激昂地驳斥了蒋介石的谬论。他说:“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绝对正确;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绝对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本是外敌,共产是内患,内患之害胜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失地,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们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我们东北人亡省亡家。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应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

苗剑秋此番讲话,为“西北剿总”参谋长、国民党特务晏道刚所悉,晏要张学良交出苗剑秋。张答:“一定严办”。



右起:苗剑秋、应德田、孙铭九(1936.12)。苗剑秋,辽宁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曾因公开骂蒋被张学良监禁过。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公开驳斥蒋介石“训话”后,因特务追究,秘密离开西安。

蒋介石在洛阳36天

“祝寿”

1936年10月29日，蒋介石离开华清池“行辕”，东赴河南洛阳“祝寿”待了36天。实际是以“祝寿”为名，策划西北“剿共”军事部署和准备解决一再要求抗日不愿再打内战的所谓“张、杨问题”。

洛阳东站(1936)。1936年10月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抵洛阳东站。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等陪同。



洛阳西宫旧址。

1936年10月31日上午9时，洛阳各界在洛阳西宫广寒宫内为蒋举行“寿礼”。





祝寿后在四维堂。1936年10月31日，从各地赶到洛阳参加寿礼的国民党大员。前排左起：傅作义、张学良、宋美龄、蒋介石、阎锡山。



寿庆之日蒋氏夫妇。



蒋介石在称觞典礼中致词。

阅兵与“训话”

1936年11月蒋介石在洛阳“祝寿”期间，张学良约同阎锡山向蒋进言，说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必要性。蒋极不悦。说：“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张、阎反复申述己见，蒋板起面孔，说：“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11月15日、22日，蒋借在洛阳军分校总理纪念周会上训话之机，大骂：“有人想联共”。“任何想与共产党联合的人都比殷如耕还不如。”等等。张学良听后为之忧伤流泪。张回西安后，对人表示：他要求蒋实现停火，未能获准，但仍将继续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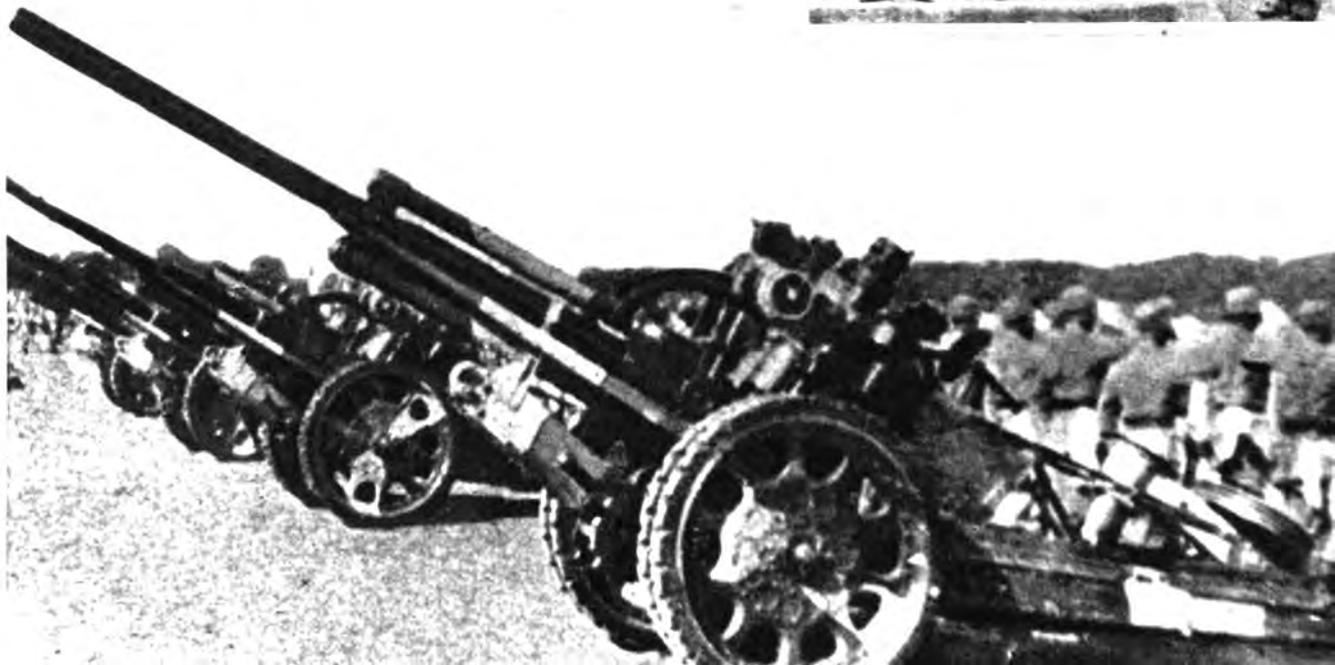


洛阳军校正门(1936)。

在洛阳电厂。右起、蒋介石、冯钦哉、何应钦、张学良。



在洛阳受蒋介石检阅的重炮兵。



安抚与策动非嫡系势力“剿共”



在济南。

左起：蒋介石、韩复榘。

蒋介石在洛阳36天中又一活动是安抚与策动非嫡系势力参加“剿共”，他偕夫人宋美龄飞太原、飞济南、又飞绥远，先后会见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要他们集中力量，紧密配合，共同“剿共”。

在济南机场。1936年11月19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由洛阳飞济南，安抚与策动山东省政府主席、军阀韩复榘“剿共”，并通过韩向宋哲元转达“剿共”方针。

前排左起：蒋介石、韩复榘。





▲ 在太原。

1936年11月17日，蒋介石、宋美龄由洛阳飞太原，安抚与策动山西省政府主席、晋系军阀阎锡山“剿共”。18日飞返洛阳。左起：蒋介石、阎锡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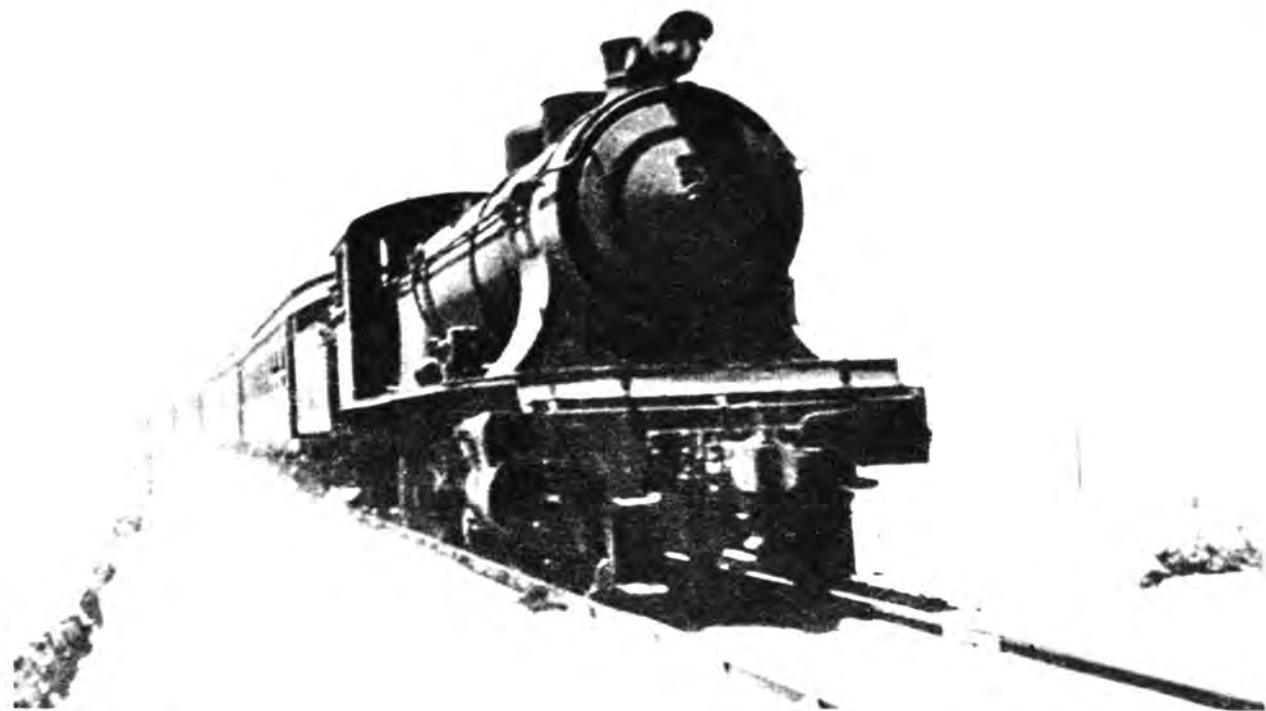
▼ 在绥远。

1936年11月28日，蒋介石、宋美龄由洛阳飞往绥远，安抚傅作义，并策动傅作义、汤恩伯、门炳岳准备“剿共”。前排右起：傅作义、刘芸生(傅夫人)、宋美龄、蒋介石。



蒋军北调

1936年11月间，蒋介石为在西北发动“剿共”内战，把解决“两广事件”的嫡系和精锐部队约三十个师的兵力北调，摆平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伺机而动。同时，下令扩大西安、兰州两地的飞机场，把用麦、棉借款在美国购买的一百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部署在两地机场。在此期间，对抗日民主力量，则大肆镇压，11月23日，下令逮捕了全国救国会七领袖，封闭了10种著名的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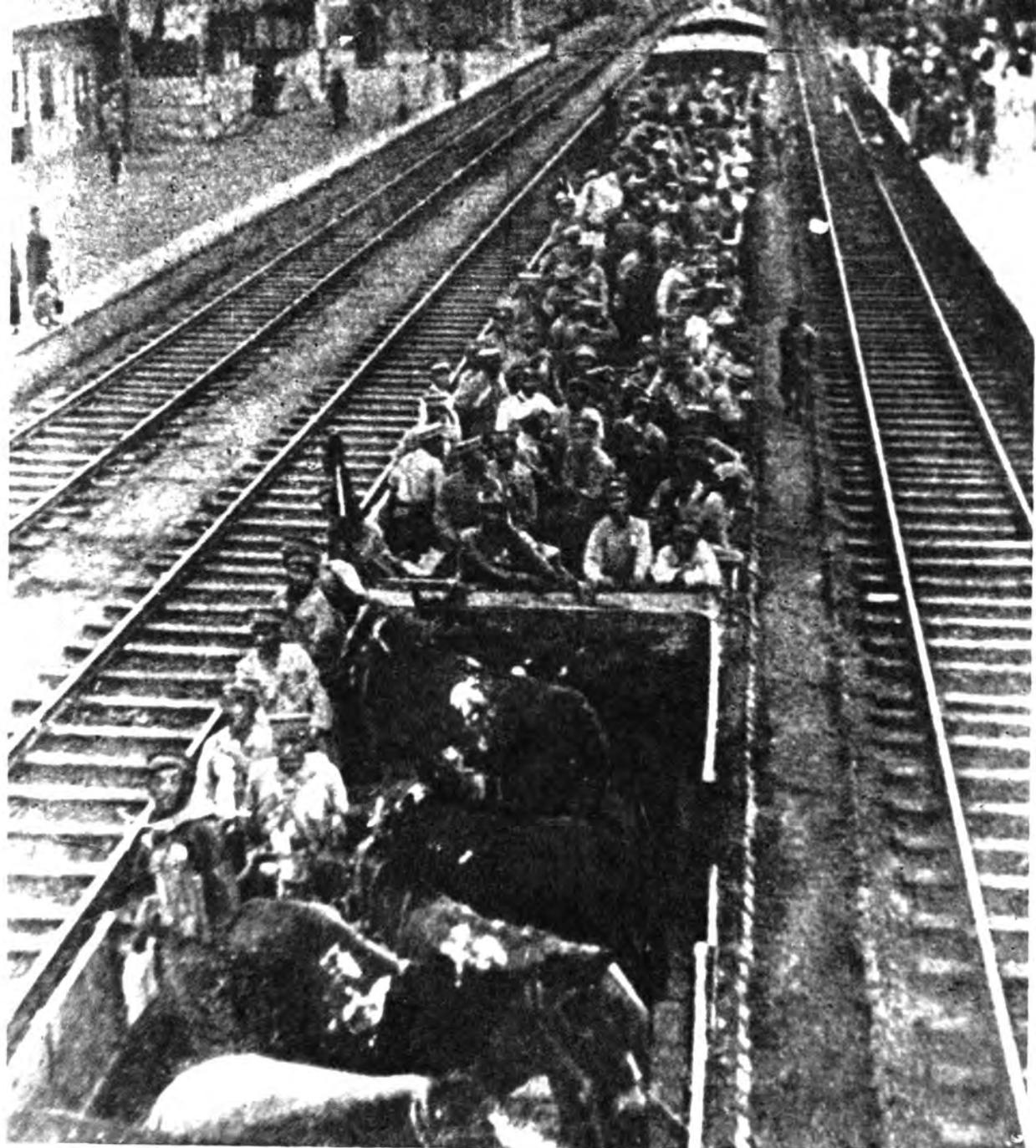
蒋军北调之兵车。

北调兵车上的蒋军装甲部队。



正在扩建中的西安机场。





西安机场之蒋机。

北调兵车上的蒋军骑兵部队。



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外交活动

左起：蒋介石、川樾茂。



与蒋介石在洛阳紧张地部署“剿共”的同时，南京政府为适应日本“共同防共”的需要，也加强了对日外交活动。

1936年10月8日，蒋介石亲自接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在会谈中，蒋表示有调整中日关系之意。会谈后，1936年11月至12月初，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先后八次密谈，“有所折衡”。在会谈中，日方要求：（1）沿山海关至玉门整个长城线实行军事合作；（2）其余地区中日政治上合作反共。南京政府竟接受日方要求：在东北、热河、冀东、察北合作反共，其他地区的共党由中方自行处理。

许世英与有田会谈。1936年9月至11月，蒋介石正奔走于西安、洛阳期间在东京的南京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于9月4日，再度拜访日外相有田，“有所折衡”，申明南京政府之立场。左起：有田、许世英。



妄图最后消灭中国共产党与红军

蒋介石第四次来陕

由洛阳到西安

蒋介石以“祝寿”为名，在洛阳策划部署“剿共”战争之后，于1936年12月4日来陕。是为第四次来陕。

蒋介石此行的目的是妄图最后一次消灭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他一到华清池，即紧张地分别单独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的师以上军官，要他们服从命令，进攻红军。蒋认为消灭红军与陕甘宁苏区“已到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

12月5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到华清池访蒋，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气氛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标志。蒋说：“我来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分歧论调。”同日，蒋召见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安排“剿共”部署。从12月6日起，依次召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驻陕各军高级将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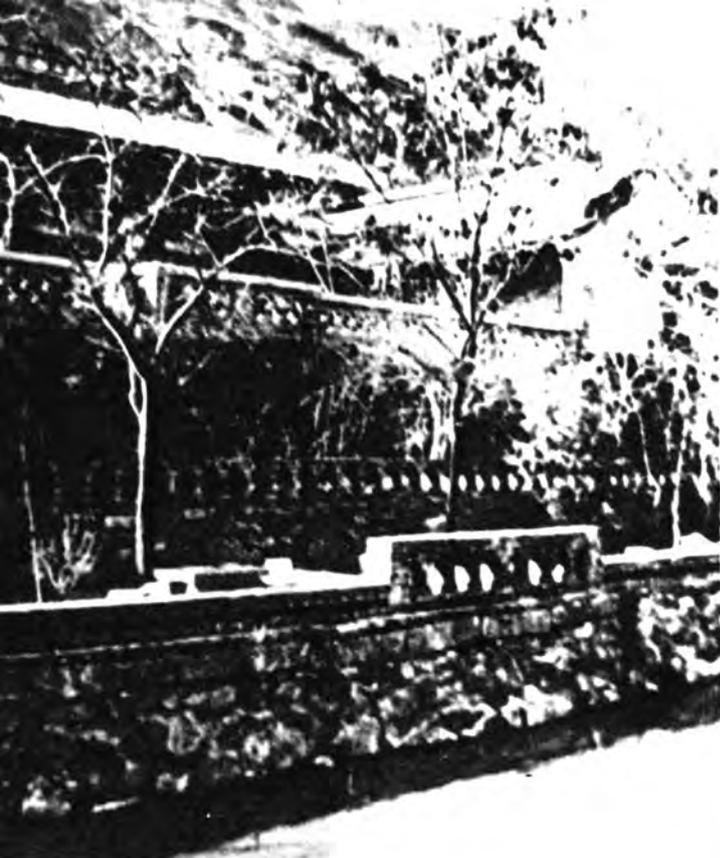
西安火车站(1936)。1936年12月4日上午9点40分，蒋介石、张学良、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等乘专车由洛阳启程，下午9时抵西安。到车站迎接的有邵力子、杨虎城、朱绍良。蒋即乘汽车赴临潼华清池“行辕”。



第四次来陕的蒋介石(1936)。

五间厅前之警卫亭。





五间厅。



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驻华清池五间厅内。自东至西：第一间：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住室；第二间：蒋的办公室；第三间：蒋的卧室；第四间：会客室；第五间：蒋的侍从秘书肖乃华住室。



蒋介石卧室之门前。站立者为蒋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

▶ 在华清池宴会上。右：张学良。左：蒋介石。

华清池内景(1936)。

12月6日

12月6日，蒋介石召见张、杨向他们摊牌。蒋提出两个方案，要他们选择。第一方案：服从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向红军进攻。第二方案：东北军调到福建，17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剿共”。



蒋介石向张、杨摊牌。右起：蒋介石、杨虎城、张学良。

12月7日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赴临潼晋见蒋，痛切陈说利害。蒋则坚持“剿共”，不谈抗日，两人发生激烈的争论。

张说：“当今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张还说：“东北军抗日情绪很高，不可压制，”等等。蒋说：“你不明白共产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今天确是到了剿灭的时候了。你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争论达两个多小时，张学良声泪俱下。蒋介石把桌子一拍，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午间，蒋介石在华清池宴请驻陕各军高级将领，席间蒋对张学良“剿共”不力，多所指责。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最后一次谏诤失败。



12月8日

1936年12月8日清早，张学良到杨虎城私邸——止园，与杨商谈。

两人认为：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决心既已无法改变，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只有实行“兵谏”，逼他抗日，再无别的办法了。随即初步商定行动计划：在华清池拘禁蒋介石和临潼公路沿线的警戒任务，由东北军负责；在西安城内拘禁南京政府要员，解除蒋系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机场的作战飞机及火车站的警戒等任务，由17路军负责。具体行动日期根据形势和准备工作情况再定。

杨虎城私邸——西安九府街（今青年路）止园大门（1936）。



“12.9”运动一周年 西安学生大请愿

向“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请愿

1936年12月9日，为“12.9”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举行了空前规模的请愿与游行示威活动。广大爱国学生坚决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生们热血沸腾，激情呼号。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向“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门前集结，准备举行纪念大会，却遭到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多方阻挠和破坏。

这天早晨，处在西安东关的东北竞存小学和私立中学等校学生，整队出发，参加西安学生的请愿大会，国民党警察们如临大敌，他们一面前堵后截，粗野地叫骂；一面不断鸣枪示威，竞存小学一名12岁学生被击重伤，另有学生数人的头发被呼啸而过的子弹烧焦。学生们对国民党当局不打日本打学生的法西斯暴行，无不义愤填膺。

1936年12月9日上午9时，在国民党军、警、宪、特的阻挠与破坏之下，学生们坚持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大门前，举行了“12.9”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大会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宣言》。

上午10时，纪念大会派出代表团直接向“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请愿。站在请愿队伍前列的东北大学学生们悲壮沉痛地连声高呼：“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声声催人泪落。学生代表团递送了请愿书，要求见张学良。张适公出。由交际处科长周某接见，答称：“学生爱国热忱，本人极为钦佩。所陈各节，当一一代为转达”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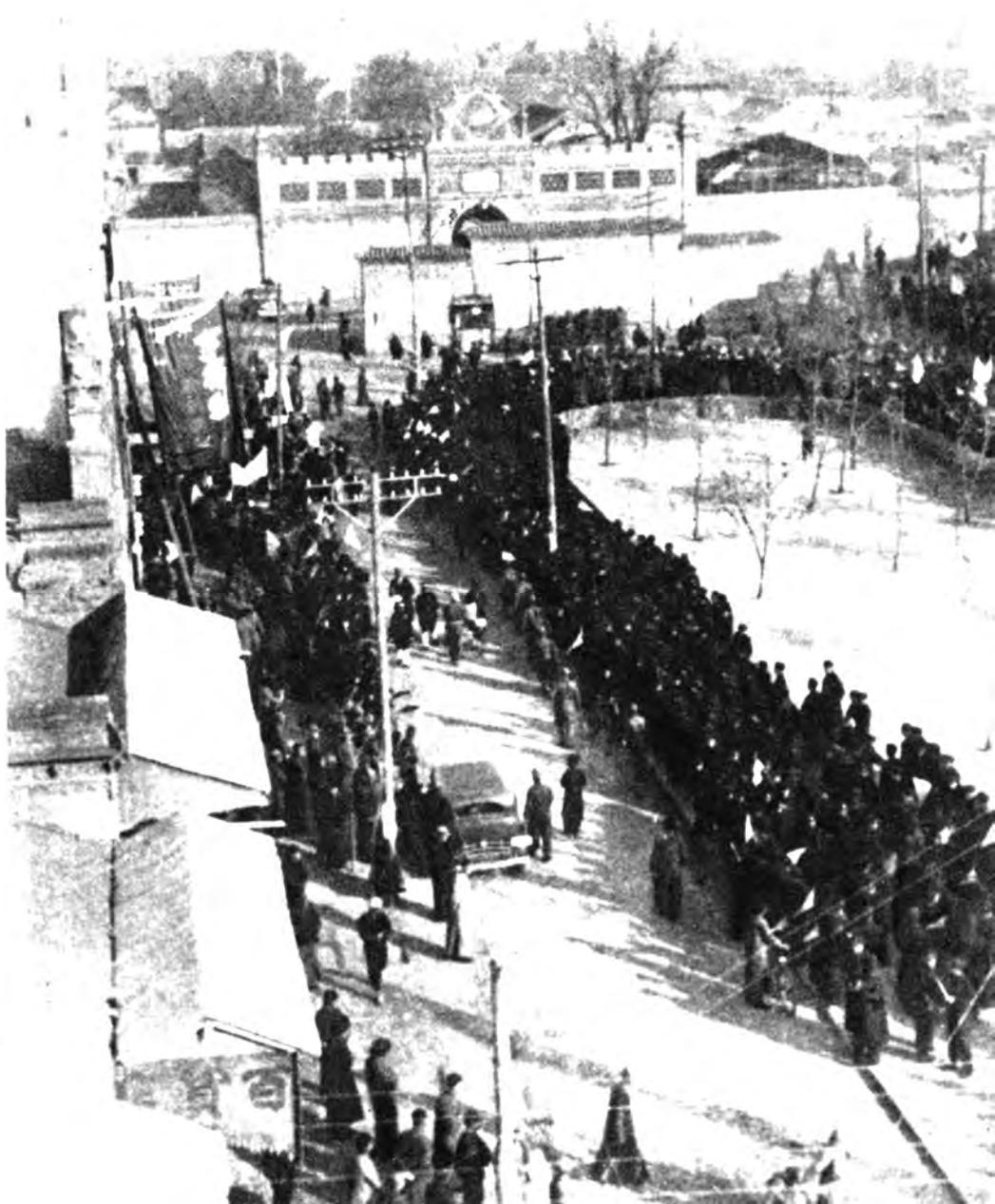


请愿与游行的学生队伍开始出发。

东北竞存小学校门(西安湘子庙街)。1935年夏，东北人士车同忱在西安创办私立东北竞存小学。地址初在西安东关索罗巷，后迁城内湘子庙街。学生为流落西安的东北儿童。办学的宗旨是“抗日”与“打回东北去”。



请愿与游行的学生队伍之一部。



西安南院门“西北剿总”门前游行请愿队伍之一部分。



西安学生游行请愿队伍向张学良请愿后离开南院门。

向陕西省政府请愿

1936年12月9日上午11时，西安学生游行请愿队伍由南院门到达北院门，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请愿。学生代表团递送了请愿书，要求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接见。两旁警卫林立，邵力子出来了，邵说：“保护爱国运动，当然不成问题”。但是“爱国运动一不要荒废学业，二不要违反校规。”对于请愿学生所提各项要求，避而不答，学生们很不满意。



在北院门请愿之
西安学生代表。



1936年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大
门(今为西安市人民政府大门)。

向西安绥靖公署请愿

1936年12月9日下午1时许，学生游行请愿队伍来到新城大操场，向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递交请愿书，并要求接见。杨因公出，由参谋长李兴中代见。李在讲话中嘉许学生爱国热忱之后，说：“军人的责任是捍卫国家，现在我们国家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到这种地步，实在是我们军人的耻辱”。又说：“对于上海七名救亡领袖，我是非常钦佩的，我们要请求政府赶快释放他们”。“关于警察开枪打学生的事，我向杨主任讲，一定要恩办他们”。



1936年的西安绥靖公署(今为陕西省人民政府)

到临潼去向蒋介石请愿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游行请愿队伍从清晨集结出发，先后向“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请愿，所答均不得要领。此时已下午3点了，学生们情绪激奋异常，一致要求到临潼去，向蒋介石请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下午3时许，队伍行进到西安东大街。总指挥部接大队交通队报告，中山门已被国民党封锁，游行请愿队伍不得不绕道中正门(今解放门)出城。下午4时，游行请愿队伍到达中正门。中正门又被关锁，学生们向把守城门的军警多方宣传，后经17路军少将参谋处长王根僧暗示门卫，城门的锁被打开，在“欢迎军警参加”的口号声中，请愿队伍蜂拥出城。

西安学生游行请愿队伍走向西安东大街。





西安学生游行请愿队伍行进在西安东大街。

西安中山门(大东门, 1936)。



西安中正门(1936, 今解放门)。



“山雨欲来风满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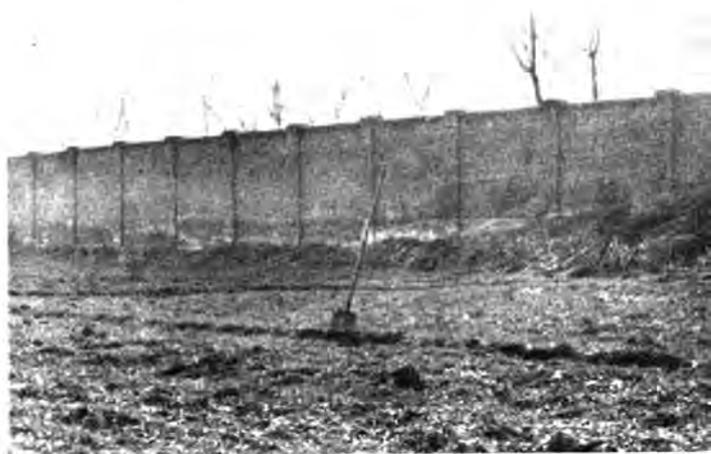
张学良东十里铺讲话

1936年12月9日下午5时，西安学生请愿游行队伍在急速地向临潼进发。蒋介石闻讯，立即用电话命令张学良加以制止，并说如学生不听制止要“格杀勿论”。与此同时，蒋的侍从室组长蒋孝先、国民党中央宪兵二团团团长杨镇亚，在产、灞河之间布防设伏，准备屠杀赴临潼请愿的西安学生。

西安学生请愿游行队伍，已经行进到灞河西岸的东十里铺。忽见后边急速地赶来一部小汽车，从车上下来两个穿便服的人，大家以为又是国民党的什么大人物压制学生来了。原来是张学良与王以哲。张学良找学生代表谈话。要大家立即停止前进，否则会有大危险。学生们坚决不同意，学生代表讲了许多理由，有的学生失声痛哭，一定要到“行辕”去请愿。

面对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张学良激动得不能自己。大家要求张讲话，请愿队伍才平静下来。张学良沉痛地说：“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要迫切”。“我们大家的期望会实现的，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张学良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人的走狗！”“你们所提的要求，我一定转呈蒋委员长，我代大家请愿”。“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学生群众们对张学良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直到深夜，才陆续返回西安。

张学良离开东十里铺，当晚赴临潼向蒋介石报告西安学生请愿的情况和要求，并陈述了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蒋不接受，反斥张不是站在他的立场上讲话。“不是代表政府，而是代表学生”，“失掉了国家大员的身份”，“一个人绝不能同时代表两个方面”。“使得西北社会浮动，人心不安”，等等。张说：“我在陕甘干不成了，让我到绥远去抗战”。蒋说：“你的任务就是剿共”。“要不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去”。



这儿是1936年12月9日薄暮。张学良向赴临潼请愿学生队伍讲话的地方(原为十里铺公路旁之地畔，解放后，公路改线，现为昆仑机械厂北面农田)。

观看陕西地方剧

1936年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下了对蒋“兵谏”的决心之后，有关的准备工作，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张学良每日仍然照常到临潼“行辕”见蒋。对来到陕西的一批南京军政大员，仍然照常殷勤接待。12月9日晚，张学良、杨虎城邀请南京军政大员们在西安易俗社观看陕西地方剧。此时，张学良尚在临潼“行辕”，由杨虎城在演出前作了招待讲话。



观看秦腔《柜中缘》

杨虎城在演出前，作招待讲话。



12月10日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将“兵谏”的计划分别告知其部下的师长白凤翔、刘多荃，旅长唐君尧，团长刘桂五，营长王玉瓚、孙铭九等。并于同日上午带领白凤翔、刘桂五到临潼“行辕”谒蒋“请训”，目的在于认路、察看华清池地形和蒋的住室。张学良对蒋介石介绍刘桂五作战勇猛，和共军多次交锋，颇有战绩。蒋很高兴。

刘多荃（1898—1985）字芳波，辽宁省人，保定军校九期炮科学员。1936年任东北军105师师长，该师是集合张学良的卫队而成。西安事变前，该师一团张治邦部驻临潼担任华清池周围的警戒。



刘多荃。



刘桂五(1936)。

刘桂五(1902—1938)，字馨山，热河省（今属辽宁省）朝阳县八家村人，庐山军训团二期学员。东北军骑兵军第六师第十八团上校团长。1937年初，刘率部赴绥远抗日，同日军多次交战。1938年在呼和浩特与百灵庙之间的固阳县江油杆子同日军作战，中弹牺牲，时年36岁。

12月11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陕后，曾多次在华清池“行辕”召集东北军、17路军高级将领开会，询问各部“剿共”情形，但均不通知张、杨参加。

12月11日，蒋介石把他9日写好的对蒋鼎文、卫立煌、陈诚等人的任命手谕交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要邵交《大公报》发表，暗示准备由此人接替张、杨指挥部队，进攻红军。

同日，蒋介石在“行辕”召集参谋人员会议，决定12日颁布第六次“剿共”总攻击令。如张、杨两部不听命令，就解除他们的武装。

同日，还令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和马志超的陕西省会警察局，开出东北军、17路军中的共产党人和同情共产党人的黑名单，准备于动员令下达后，大肆逮捕。

同日下午五时，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在新城大楼就宴，招待来陕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大员和西安各界人士。此时，张学良去临潼，宴会由杨虎城、于学忠主持。

同日晚上，蒋介石召集驻陕中央军各将领和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商定军事行动计划（杨、于因准备当晚宴请南京来陕大员，未及参加）并定在明日（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

力子巨亨无如董不
 表以下三消息
 蒋对文卫煌煌先遣到
 西各团已派蒋以此文为
 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
 蒋之煌为晋陕绥甯四省
 边区总指挥蒋以军
 改部次各名义指蒋任东
 中央军各部陈云
 但此消息不必示中共社反
 于他死者西各各板亦不必
 某表为要
 忠 十月九日

蒋介石“手谕”。这个“手谕”是1936年12月12日晨在骊山战斗现场发现的



新城大楼

黎明的枪声——西安事变爆发

紧急军事会议

1936年10月在西安，11月在洛阳，12月上旬在临潼，张学良向蒋介石多次陈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忠言逆耳，概遭蒋氏无理拒绝。

12月11日这一天，蒋介石在临潼“行辕”剑拔弩张的阵势，逼得张学良、杨虎城再也无等待的余地了。不得不立即行动。晚上，新城大楼宴会毕，已是午夜时分。张学良乘车由临潼直奔西安杨虎城私邸——止园。一见面就说：“情况紧急，连夜行动。”两人就“兵谏”军事行动略谈数句，便分头于午夜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宣布行动计划。

张学良在新城大楼会议厅召集东北军高级军官紧急军事会议，宣布“兵谏”行动计划。到会的有：51军军长于学忠、67军军长王以哲、57军军长缪激流、105师师长刘多荃、高级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西北剿总”办公厅主任洪涛、“西北剿总”政训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未到会。

张学良在讲话中略谓：“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9.18’时，就是委员长来电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10月间在西安，11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的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

杨虎城在止园内召集17路军有关人员举行紧急军事会议。17师师长孙蔚如、51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绥署参谋长李兴中等都应召到来。杨虎城宣布了“兵谏”行动计划。

杨虎城在讲话中略谓：“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并且挑拨东北军和17路军的关系”。“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想一箭双雕，也要消灭17路军和东北军”。“为了挽救国

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已和张学良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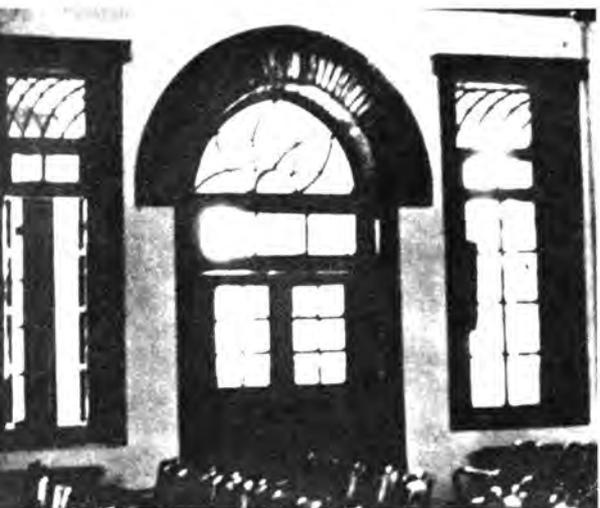
西安事变临时军事指挥部设在西安新城内的杨虎城公馆。张学良为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指挥。11日午夜紧急会议毕，张学良即带领几十名高级将领和僚属到新城杨虎城公馆，和杨虎城共同指挥临潼骊山战斗和西安城内的战斗。当晚，张学良又指定黎天才、卢广绩、王菊人等人起草通电。



杨虎城召开紧急会议会址——止园(1936)。



骊山战斗示意图。根据王玉瓚手稿整理、绘制。



张学良召开紧急会议会址——新城大楼会议厅(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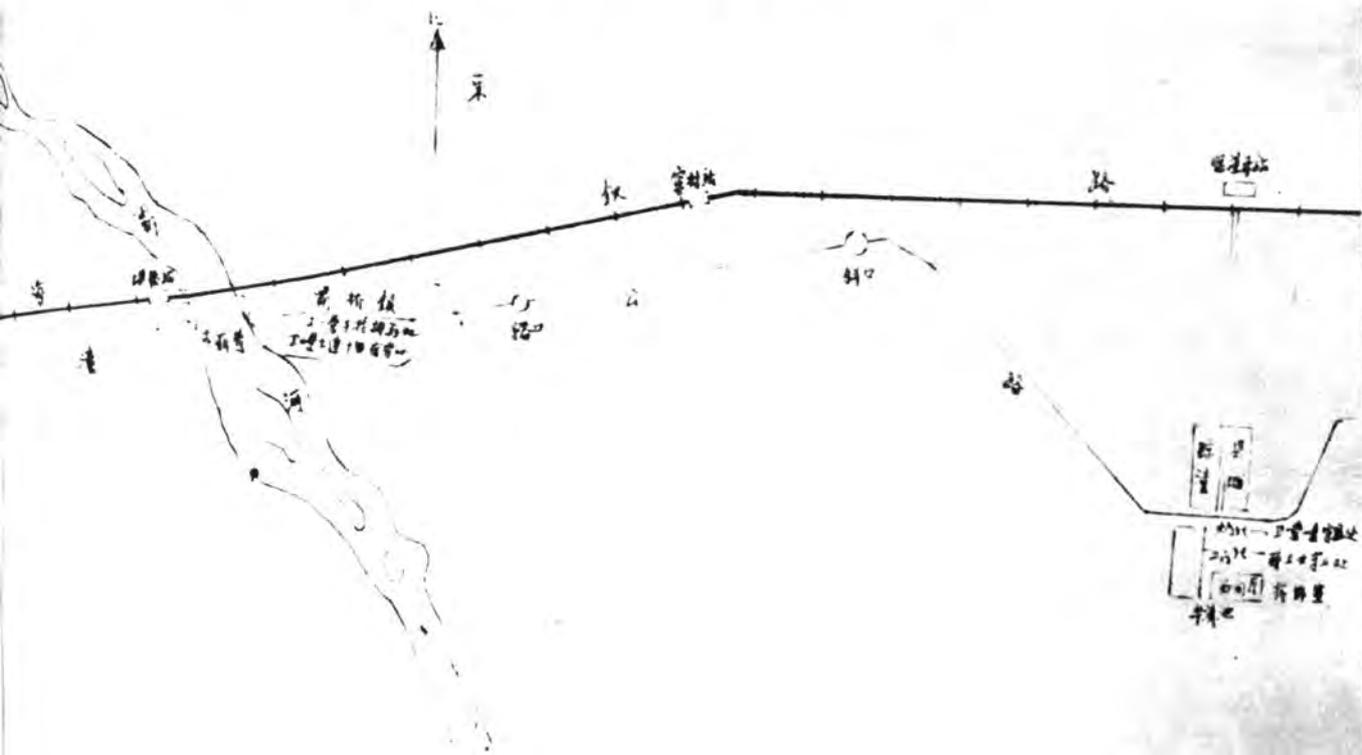
西安事变军事指挥部——新城杨虎城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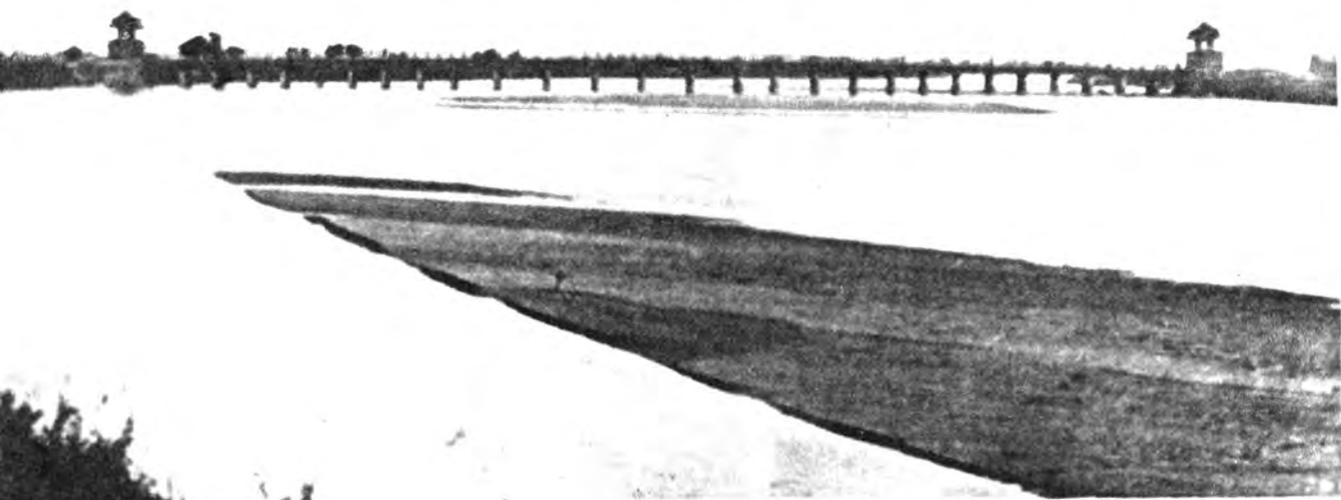
骊山战斗

西安事变中的骊山战斗，由东北军担任。105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整个战斗分为内外两线：129师师长周福成为外线指挥，指挥105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较远的地方警戒，防止蒋介石的侍卫队突围；105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为内线指挥，指挥王玉瓚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一个连(二道门以内由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守卫)和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两个连，担任拘捕蒋介石的任务。此外，还调派枪法准确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从甘肃固源调回)、骑兵第六师第18团团团长刘桂五(正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受训)两人，参加扣蒋行动。蒋介石“行辕”的侍卫亲兵约30人，守卫华清池二道门内及五间厅。另有宪兵约50人，驻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

12日凌晨三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105师的两个团在周福成指挥下，分别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四时许，内线部队在唐君尧指挥下，卫队一营首先行动，迅速解除了驻华清池外禹王庙的宪兵武装。此时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和卫队二营两个连赶到，一同冲入华清池二道门，遭到蒋的侍卫亲兵的抵抗，发生了猛烈的战斗。

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瓚和第一连连长王世民等翻过荷花池、绕过贵妃池，首先冲上五间厅平台，进入蒋的卧室，发现蒋介石的衣帽、斗篷、假牙尚在，被褥犹温，人却不在。他们断定：是方才逃走了。





灞桥在望(1936)。



灞桥桥头之牌楼。



古灞桥。





蒋介石卧室——华清池五间厅之第三厅。



蒋介石从此窗户逃走。

搜山

1936年12月12日晨4时，蒋介石被枪声惊醒，从床上爬起，由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扶持越墙而逃。逃向哪里？卫队一营手枪排士兵石志中发现后墙里面有一只鞋子，断定是越过此墙，逃到后山去了。此时，刘多荃、唐君尧等也都赶到。通过电话向张、杨报告。张、杨得知蒋已逃跑，甚为着急，下令搜山。并向幕僚们表示：“若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戴他为领袖。”

刘多荃、唐君尧立即指挥部队搜山。王玉瓚带领卫队一营从左侧上了骊山，孙铭九带领卫队二营从右侧上了骊山。骊山上尽是搜山的士兵，枪声四起，蒋介石的侍卫竺培基、施文彪中弹死亡。这时天色已经微明，卫队一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翟德俊等三人，忽然发现骊山半山腰的一块大石后面有人在探头探脑，当即大喊：“什么

人，还不出来，要开枪哪！”蒋介石终于从叫做虎斑石的夹缝中走出，被士兵们架下山来。蒋惊魂未定，但他意外地发现，搜山的竟不是红军，而是东北军，连问“张副司令在哪里？在哪里？”

1936年12月12日晨，蒋介石下了骊山，骊山战斗结束。张学良闻讯。急派谭海去临潼接蒋。9时许，四辆汽车从骊山下的公路出发，迅速开往西安。第一辆、第四辆为载重汽车，上面坐满了东北军官兵。第二辆、第三辆是小汽车，前者为白凤翔、刘桂五乘坐；后者为蒋介石和护送蒋的唐君尧、谭海、孙铭九乘坐。

与骊山战斗同时，兰州方面，东北军51军，解除了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此时在西安）所辖的中央军第七军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营的武装，控制了兰州全城和机场。

蒋介石翻越此墙，逃向骊山。



搜山。



虎斑石的夹缝。



护送蒋介石到西安时蒋所乘坐的小汽车。



护送蒋介石由临潼到西安的车队。



右上:

王玉瓚(1896—1984), 辽宁省黑山县人。东北讲武堂第九期学员。1936年春, 任“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上校营长。1936年6月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干部连受训。同年蒋介石两次来陕, 该营均负警卫“行辕”之责。12月11日晚, 随张学良由临潼回到西安张公馆, 接受“兵谏”任务。是骊山战斗打响第一枪者, 受嘉奖提为15旅43团团长。



▲ 王玉瓚(1976)

右中:

孙铭九(1900—)辽宁人, 原为张学良随从校中校参谋, 1936年任“西北剿总”卫队二营营长, 负责张及总部直属机构的警卫。1936年6月, 参加张、杨举办的王曲军官训练团, 接受联共抗日思想。1936年9月初, 参加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同年9月末负责领导东北军学兵队。

▼ 孙铭九(1938)

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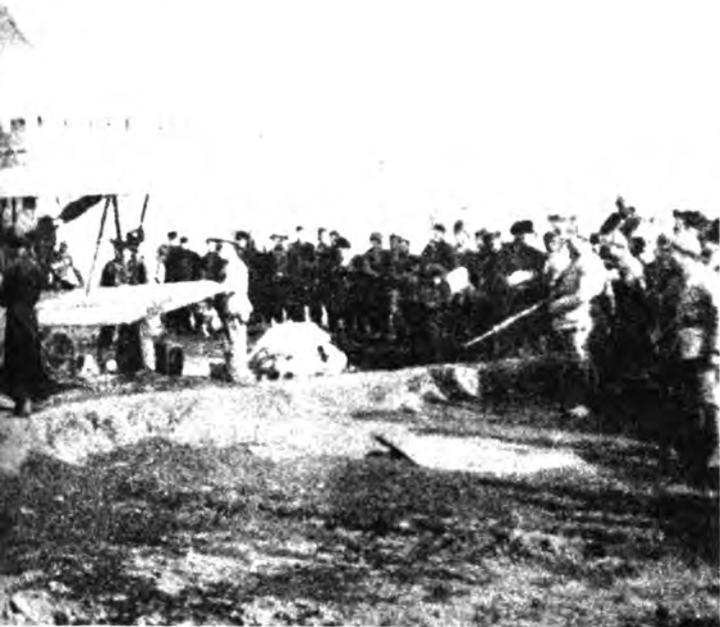
谭海(1895—?)字思波, 辽宁省人, 东北讲武堂二期学生。1936年任东北军105师副师长, 张学良的侍从副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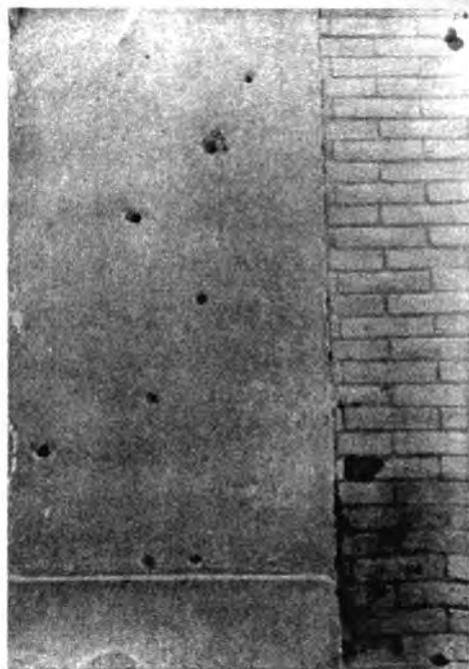
专程到临接蒋的谭海(1936)。

临潼公路上的“北平号”教练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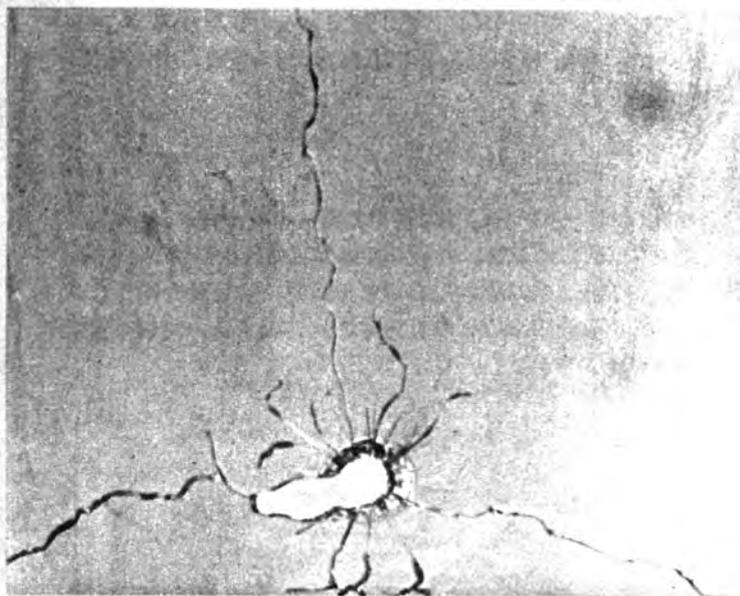
1936年12月12日上午, 国民党洛阳航空分校校长王勋获得蒋在临潼被扣“惊讯”, 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小型教练机飞陕, 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的公路上, 妄图救蒋。蔡和所驾飞机, 当即被17路军装甲团扣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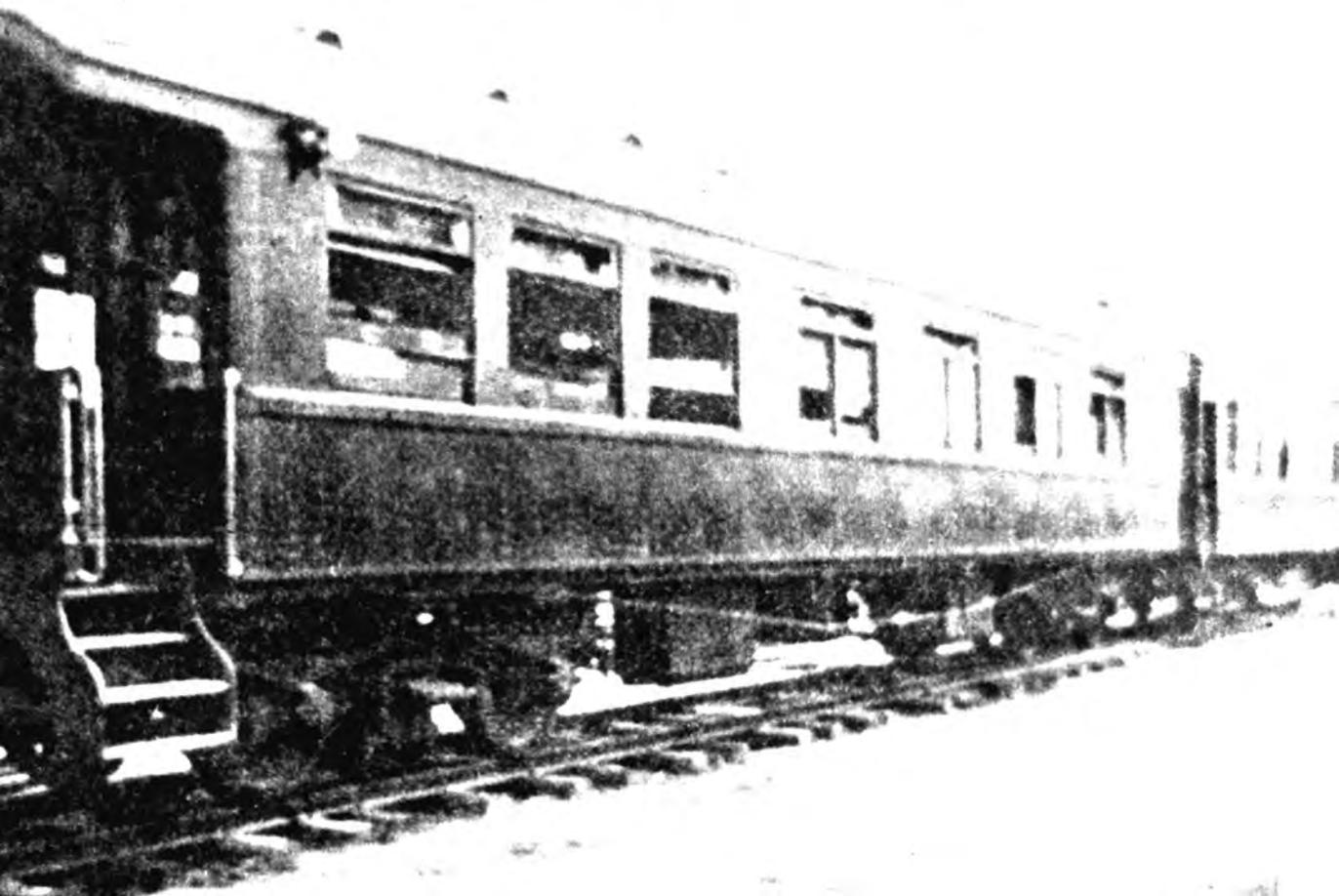
华清池壁上，累累弹痕。



骊山战斗中，射击在蒋介石寝室五间厅窗户玻璃上的弹痕。



西安事变前夕，停放在陇海路临潼车站随时备用的蒋介石专用列车。



驪山虎斑石



1946年，胡宗南在驪山虎斑石下修建的“蒙
諫亭”，后改名“复兴亭”。今为“兵諫亭”。



西安战斗

西安事变中的西安战斗，由17路军担任。以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为总指挥。西安城防司令、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指挥所部解除宪兵一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常驻省政府的宪兵连和飞机场驻军武装，并占领飞机场，扣留作战飞机。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所部担任扣留城内亲蒋大员。炮兵团负责陇海铁路西安车站方面的警戒。警备第三旅袭占咸阳，解除国民党军万耀煌部两个团的武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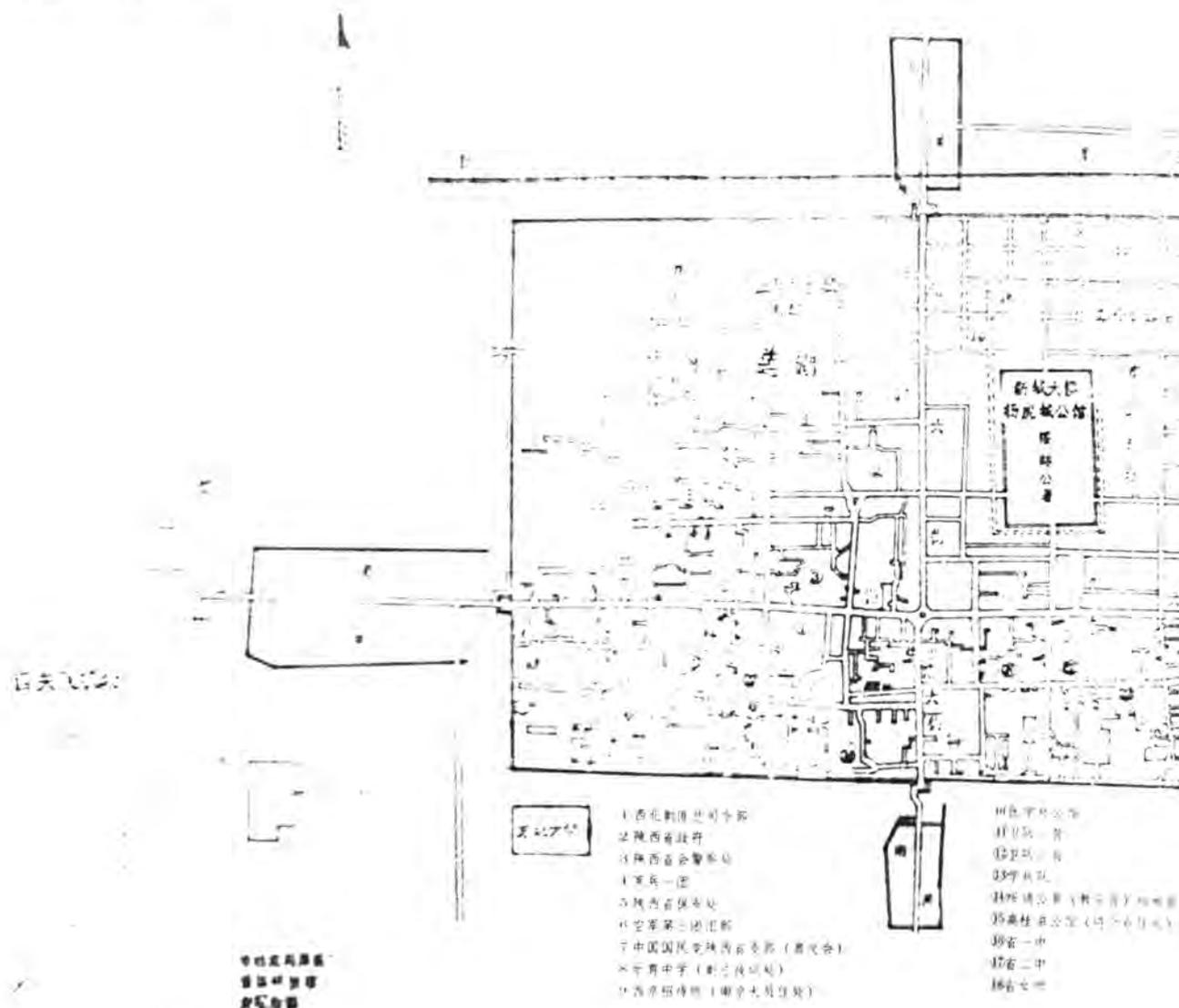
当时蒋系在西安的党、政、军、警、宪、特单位，约120个，其中有武装力量的42个。计有杨镇亚的宪兵二团、张坤生的保安团、马志超的警察总队、公秉藩的

交警纵队、江雄凤的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常驻省府的宪兵连、西关机场驻军，各特务机关以及蒋军各军、师在西安的留守处、办事处等零散武装，合计近万人。

西安战斗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部署完毕，4时发动，8时战斗基本结束。所有西安蒋系党、政、军、警、宪、特单位的武装，全部解除，占领了西安机场，扣留了50多架飞机和住西京招待所的一批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等，同时还扣留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等人。

与西安战斗同时，杨虎城密电驻大荔的17路军第42师师长冯钦哉立即兼程渡过渭河，占领潼关。但冯有意拖延行动，并向国民党军洛阳前线指挥樊崧甫告了密，致使国民党军第28师董钊部抢先占领潼关。

西安城内战斗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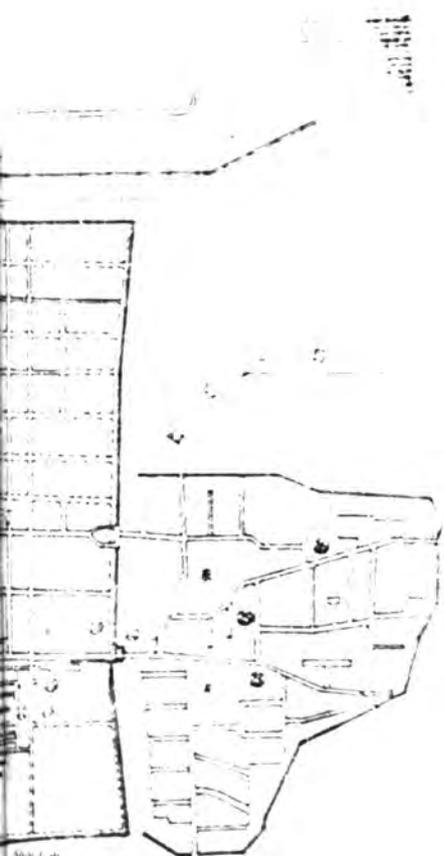


赵寿山(1936)。

赵寿山(1893—1965)，陕西户县人。陕西陆军测量学校毕业。17路军17师51旅旅长。西安事变中，担任西安战斗的总指挥，事变后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长。



李兴中，河北蠡县人。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西安事变中，经杨虎城指定协助赵寿山负责西安方面军事行动的指挥。



1 陕西女中
 2 西安明德
 3 陕西女中
 4 国民中学
 5 国民中学
 6 东望小学
 7 西望小学
 8 明德女中
 9 陕西日报
 10 西北文化出版社



孔从洲(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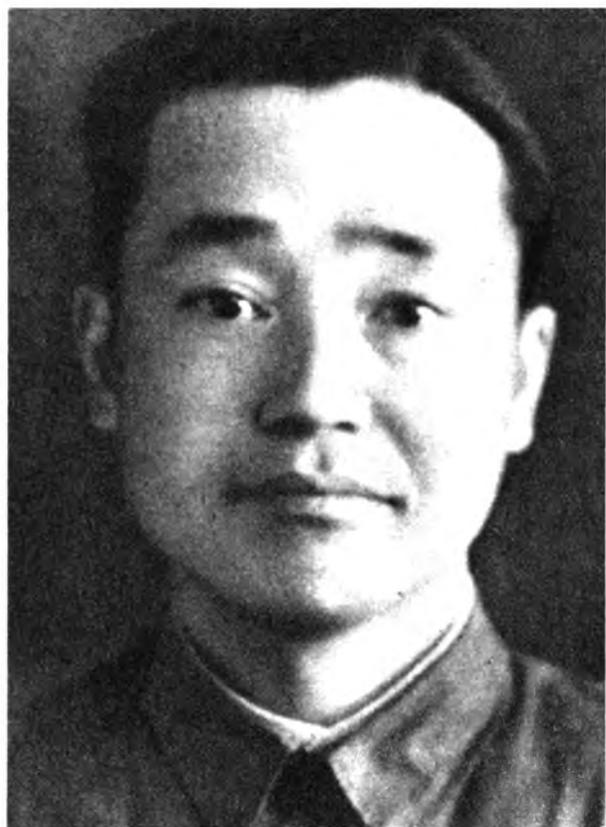
孔从洲(1909—)，西安东郊人，17路军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西安事变中，参与西安军事行动计划的商定，分工负责，解除国民党在西安的党、政、军、警、宪、特等大小武装、占领西安机场，扣留蒋军作战飞机任务。



王菊人(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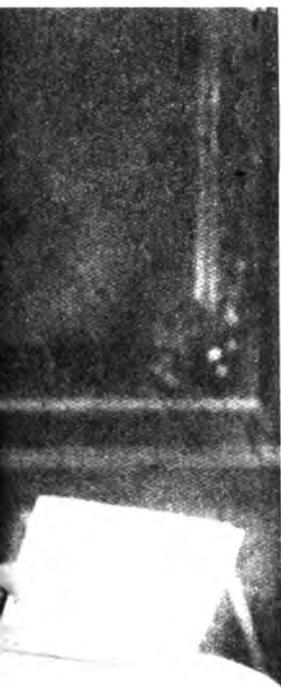
许权中(1937)。



宋文梅(1938)。

▼ 王菊人(1906—1975)，陕西蒲城人，1929—1936年，一直任杨虎城的机要秘书。西安事变中，是杨虎城身边的参谋者之一。

宋文梅(1910—1955)陕西富平人，1927年参加共产党，1930年入黄埔军校炮科，1933年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6年任17路军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西安战斗中，负责扣留住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军政大员。负责对蒋的监护。1946年6月在南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在苏州监狱两年七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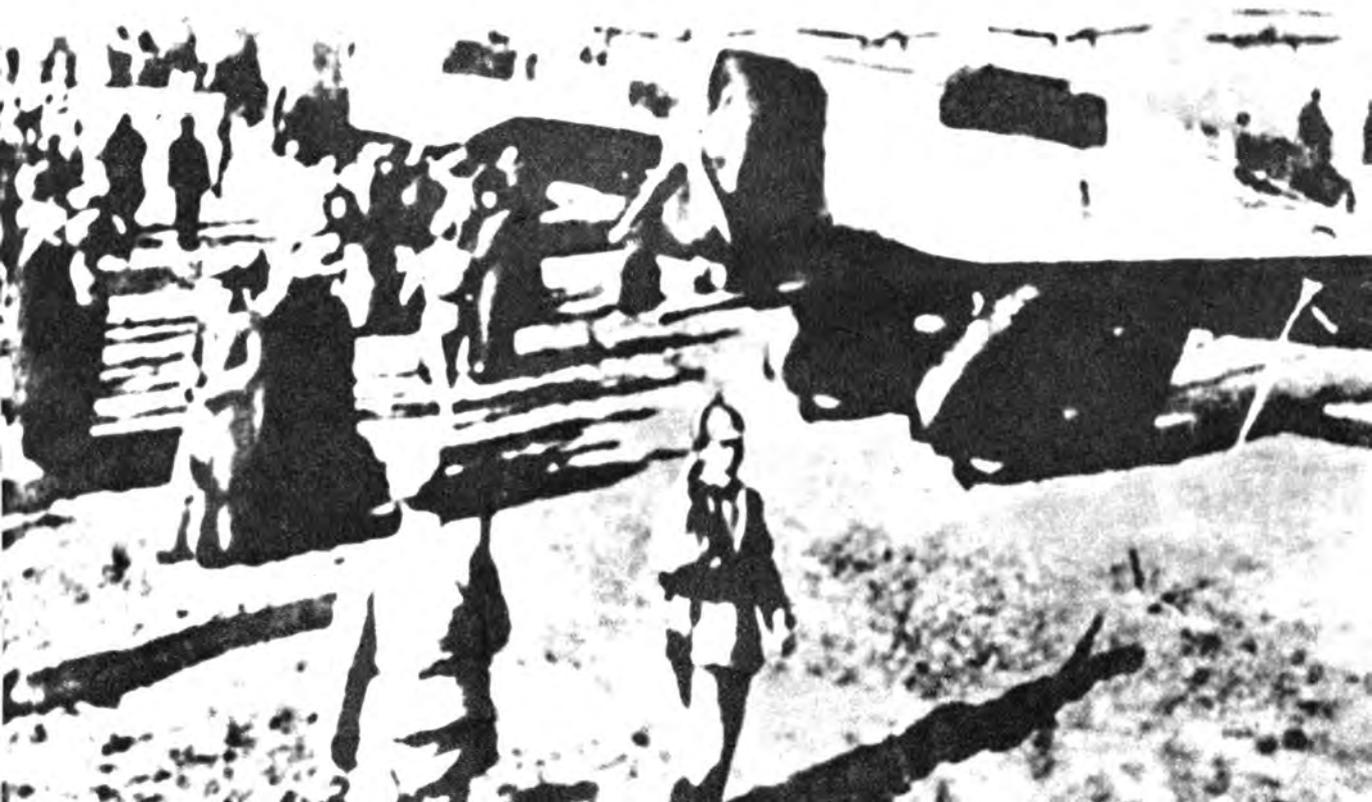
许权中(1894—1943)，陕西临潼人，共产党员。1928年参加陕西渭华暴动。1933年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18师师长。1936年任17路军独立旅旅长、警备二旅副旅长等职。西安事变中参与西安战斗的指挥。1943年在陕西眉县遭国民党胡宗南系特务暗杀。



李致远(1936)。

1936年任杨虎城机要秘书，西安事变中，对机要电讯工作有贡献。

西安战斗中，在西安西关机场扣留的蒋军新式马丁式作战飞机。



被扣留的南京军政大员

1936年11月，蒋介石准备在陕西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陆续云集西安。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日，这批人员全部被扣。



南京军政大员在西安的住地——西京招待所(1936)。

在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之一部。右起：1.蒋作宾（南京政府内政部长）、2.陈诚（南京政府军政部次长）、3.陈调元（军事参议院院长）、4.陈继承（豫陕边区绥靖主任）、5.朱绍良（兰州绥靖主任）、7.蒋鼎文（福州绥靖主任）、9.卫立煌（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10.万耀煌（二十五军军长）、12.龚道明。



蒋介石被送到西安城内之后

1936年12月12日9时，蒋介石到西安，下榻在新城大楼东厢房。10时，张学良见蒋，将《八项主张》的宣言给他，两人随之发生争辩，张说：“你不听我的劝告，可将这件事交人民公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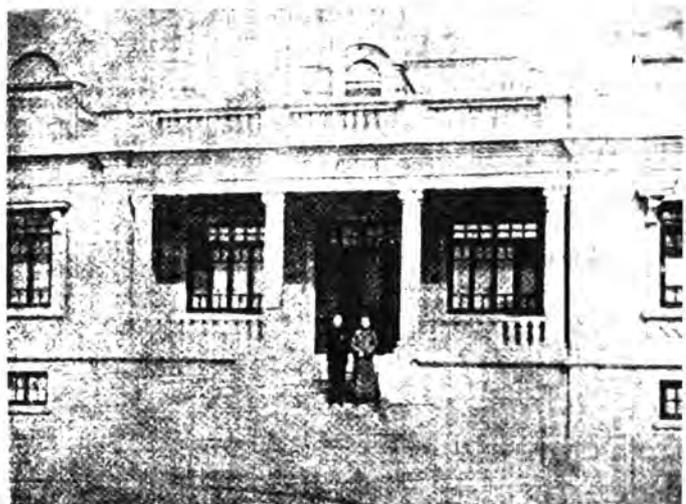
同日中午，蒋写便条：“请邵主席来谈”。邵、蒋谈过。

12月13日，蒋要见杨虎城。杨戎装相见，蒋连问：“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这样干是听什么人的话？”杨答：“知道”。并说：“这是全国人民的公意，希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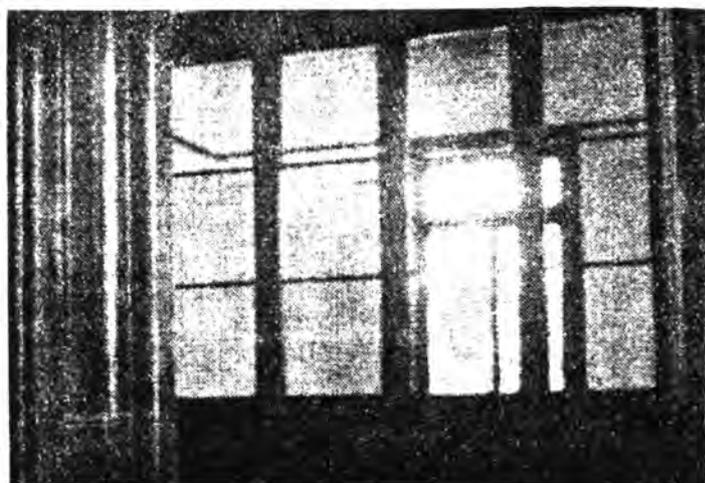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日下午，张学良、杨虎城认为蒋不适宜在新城大楼居住，另选择玄风桥的高桂滋公馆作为新的住处。同日夜11时，张、杨指派刘多荃、孙铭九、王菊人、宋文梅到新城大楼接蒋，蒋误会了，拒绝搬迁，经再三解释，仍然无效。14日，经张、杨及端纳再次劝说，蒋始同意搬至高宅。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在西安的第二个住室——玄风桥高桂滋公馆（右室）。（1937年2月23日，上海《大公报》报道。）

蒋介石到西安后的住室——新城大楼东厢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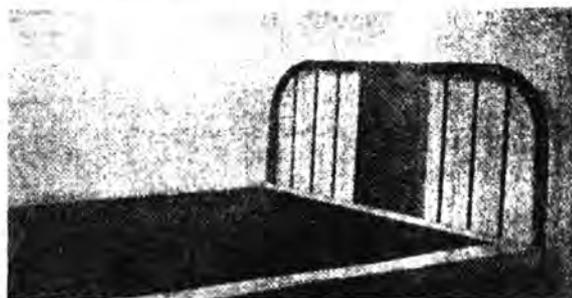


蒋介石住室。（1937年2月23日，上海《大公报》报道。）



蒋介石住室之床。

（1937年2月23日，上海《大公报》报道。）



张学良、杨虎城发表对时局宣言

《八项救国主张》

1936年12月12日上午，骊山、西安两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张学良、杨虎城领衔立即向全国及南京政府发出通电，略谓：介公对外妥协，对内专制，“弃绝民众，谋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全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八项救国主张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它集中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和救亡呼声。

張副司令楊主任暨西北各將領對於蔣委員長實行

兵諫

爲停止內戰已將委員長妥爲保護促其省悟

已通告全國並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國會議

已請南京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

四 此後國是完全決諸民意容納各黨各派人才共負

救國責任

號外 第一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局发布的第一号《号外》。

◎張副司令楊主任暨西北各將領救國主張

一 改組現在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人才共同

負責救國

(一) 停止一切內戰

(二) 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三) 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四) 開放民衆愛國運動

(五)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六) 確實履行 孫總理遺囑

(七)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西安事变当日所发布的第二号《号外》，即张、杨《八项救国主张》。



1936年12月13日、1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致电中共中央

1936年12月11日午夜，张学良在新城大楼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即请刘鼎立即将兵谏行动电告中共中央。此电经刘鼎发出。内容略谓：“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北进。”



刘鼎

国外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各国因对华利害的不同而反映各异。苏、日两个强邻互相指责对方鼓动西安事变。英、法、美，特别是美国、英国，希望保持蒋的统治地位，以免引起内战给日本扩大侵华以可乘之机。认为：“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12月15日，美驻华大使詹森飞抵南京，立即和英驻华大使洽商。美、英政府准备通过其驻华大使进行调解，法、意大使也参加了。

西安事变后，苏联《消息报》、《真理报》连日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反对西安事变。12月14日苏报声明：“苏联恪遵不干涉他国政府的政策”，并说，“张学良的

部队是真正抗日的”。但又妄称：西安事变是“日本操纵策划的”。张学良本人“则是在日本代理人汪精卫的影响之下行动的”。张杨八项主张是“烟幕”，其目的是“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等等。证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偏见和对中国国内情况的无知。

日本帝国主义，对西安事变表面持“静观”态度，以免刺激中国人民之抗日情绪，实则极力破坏中国人民抗日团结，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引诱南京政府“共同防共”。日本陆军省在《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提出：“要适当地利用该兵变，以求对华政策之推进。”南京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通知南京政府：“日本已经考虑了对中国的军事征服的政策，因为那么做，只能把中国驱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本正在拟定一个新的对华友好与经济合作的政策”，亦即鼓励南京政府对日妥协与反共内战的政策。

美国大使——詹森。



12月16日，何应钦宣布对西安采取“讨伐”行动后，日本政府极力表示支持，企图利用“讨伐”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12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称：只要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以援助”。与此同时，日本不断威胁南京政府：如果南京政府与西安妥协，达成“联共反日”协议，日本政府将不能继续保持其“仁慈的静观”。

1936年12月23日，《西京民报》的报道。

南京的震惊、混乱、分歧与明争暗斗

主战派与主和派

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当日下午消息传到南京，引起了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动，南京立刻陷入震惊与混乱之中。

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立刻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派以何应钦等为代表，他们不顾蒋介石的安危，唯“讨伐”是务，主张以武力解决。赞成这一主张者，为蒋军一般高级将领和黄埔系、复兴社分子中不少的人。复兴社头子贺衷寒代表黄埔系与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拥护何为领袖，服从何之命令。何应钦估计：蒋在西安凶多吉少，被杀掉的可能性极大。

12月12日上午，南京政府中掌握军事实权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自己的寓所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开座谈会。当日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联席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两次会议中，何应钦等人均力主“讨伐”。因此，紧急会议决定：军队的指挥调动由何应钦负责，并电召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

另一派，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亲属集团，反对何应钦武力解决，尤其是宋美龄，力主同张、杨谈判，和平解决以营救蒋介石。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时，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都在上海，13日，赶回南京。当宋美龄得知何应钦等要对西安“讨伐”和12日晚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所作的决议后，极为不满。在南京积极奔走，陈说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的重要。她特别提醒大家：主张“讨伐”的是“别有用心”。

孔祥熙(1880—1967)，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西安事变爆发的当日晚，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联席紧急会议，通过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行行政院长，以代替兼行政院长的蒋介石。

孔祥熙(1936)。



1936年12月13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12月14日上午，孔祥熙以代行政院长名义召开最高会议，此会议是孔应宋美龄的要求而召开的。会中不少人主张和平救蒋的时候，戴季陶退出休息室，想了一会，又走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说：“我是信佛的，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由西康经昌都，二由青海经玉树，三由印度越大吉岭。这条不通走那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意谓也不一定采取武装解决的办法。又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大哭，如丧考妣，退出会场。

南京国民党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明争暗斗，各行其事。此外，一些人，模棱两可，或随大流，或言不由衷。南京总的局势中一个危险的特点是：国民党右派迎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引诱与日本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共同防共”。造成国内大乱。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一片混乱。



冯玉祥在南京被监视

1936年12月12日正午，冯玉祥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对人说：“汉卿这小子真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随即派人北上，见韩复榘、宋哲元，要他们沉着观察，采取一致行动。当日下午，何应钦竟剥夺了作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的权利，甩开军事委员会，在其家设办公处，召开谈话会。会上戴季陶提出对西安的军事行动归何应钦管，冯即发言反对。

根据蒋的亲信和家属们都主张和平协商救蒋的要求，冯玉祥于12月13日，致电西安张学良：“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于世兄有所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表示有离开南京之意。这封(元)电，为何应钦所扣。同日，冯接张学良、杨虎城来电：“务祈迅即命驾来陕，共策大计”。何应钦抓住这封电报，诬冯与张、杨“事先勾结”。吴稚晖当冯面说：“我们要防共产党，还要防准共产党”。从此，冯被特务监视。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后，冯对人说：“何应钦当了讨逆军总司令，不能在南京待了”。但冯迄未能离开南京。

冯玉祥(1936)。



沸腾了的西安

初闻“兵谏”欢欣鼓舞

蒋介石对外丧权辱国，对内专制独裁，只打内战，不抗日，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早已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1936年12月12日上午10时，“兵谏”消息传遍古城，西安各报的《号外》遍撒街头。各界群众汹涌上街，或激昂慷慨，街谈巷议；或结成队伍，示威游行，高喊抗日救亡口号。有的为宣传抗日的学生送茶送水，到处是充满爱国激情与团结救亡的景象。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西安古城的整个政治、社会情况为之一变。

事变的当日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总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4团体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由上海来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张语还代表和从国外回来的会欧华侨救国联合会江隆基代表。会议发表通电。随后，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又联名发表《致全国各将领及武装同志电》。支持张杨“兵谏”和所提《八项救国主张》。



西安钟楼墙上的标语牌。

西安钟楼周围挤满了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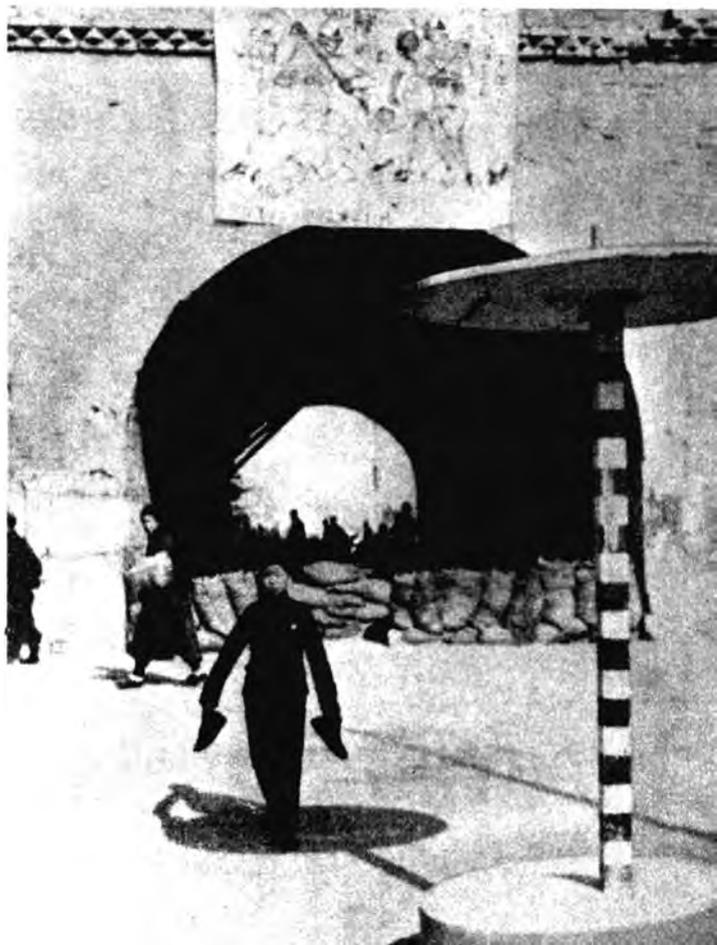


西安钟楼四周的标语和图画。



西安钟楼上的抗日口号。

西安钟楼墙壁上的漫画。





西安绥靖公署教导团宣传队出发了！

西安绥靖公署教导团宣传队在西安郊区。

西安事变后，西安二中学生救国会宣传队在西安郊区。



西安绥靖公署教导团
宣传队化妆宣传。



活跃在西安街头的化
装宣传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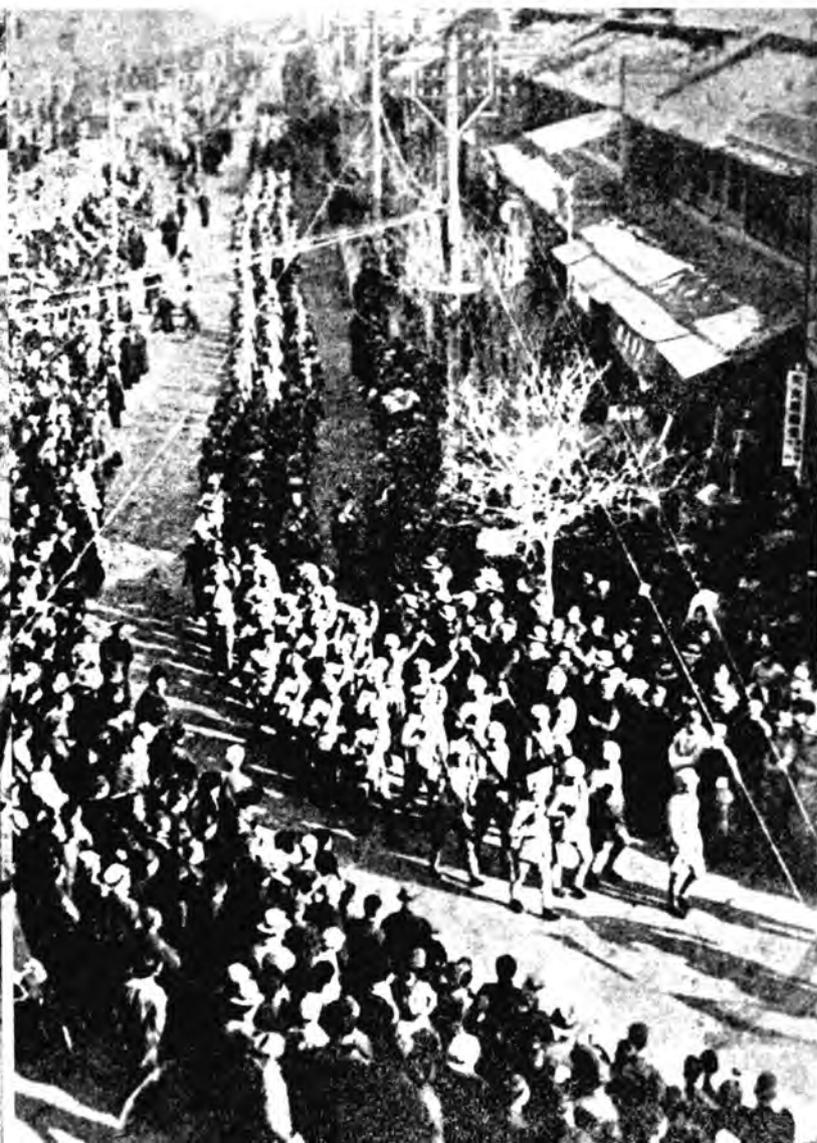
西安事变爆发后，全
省各地响应。汉中各界
冒雪集会。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游行

西安各界群众上街游行。



《松花江上》，系1936年秋，张寒晖在陕西省立西安二中执教时创作，是西安事变前后，最为流行的歌曲。歌曲旋律悲愤交加，如泣如诉地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同胞们的苦难，激励着人们的爱国热情。它对唤醒流落关内的东北军民，推动西安以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鼓舞作用。

日期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职业	住址	备注
1.2.1	张寒晖	女	25	吉林	教师	西安	
1.2.2	李	男	30	陕西	学生	西安	
1.2.3	王	男	28	山西	工人	西安	
1.2.4	赵	男	35	河北	商人	西安	
1.2.5	孙	男	22	山东	学生	西安	
1.2.6	周	男	40	河南	农民	西安	
1.2.7	吴	男	38	安徽	医生	西安	
1.2.8	郑	男	27	浙江	学生	西安	
1.2.9	冯	男	32	江西	工人	西安	
1.2.10	陈	男	29	福建	商人	西安	
1.2.11	李	男	33	广东	学生	西安	
1.2.12	王	男	26	广西	工人	西安	
1.2.13	张	男	31	四川	商人	西安	
1.2.14	赵	男	24	湖南	学生	西安	
1.2.15	孙	男	36	湖北	工人	西安	
1.2.16	周	男	28	江西	商人	西安	
1.2.17	吴	男	34	浙江	学生	西安	
1.2.18	郑	男	27	安徽	工人	西安	
1.2.19	冯	男	39	福建	商人	西安	
1.2.20	陈	男	25	广东	学生	西安	
1.2.21	李	男	37	广西	工人	西安	
1.2.22	王	男	29	四川	商人	西安	
1.2.23	张	男	32	湖南	学生	西安	
1.2.24	赵	男	26	湖北	工人	西安	
1.2.25	孙	男	38	江西	商人	西安	
1.2.26	周	男	28	浙江	学生	西安	
1.2.27	吴	男	35	安徽	工人	西安	
1.2.28	郑	男	27	福建	商人	西安	
1.2.29	冯	男	31	广东	学生	西安	
1.2.30	陈	男	24	广西	工人	西安	

《松花江上》手稿。作者：张寒晖。

歌声满长安

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睦邻”和“读书救国”国策下，西安，变成了无声的城市。人们不能倾诉自己“亡国奴”生活的苦难，不能言抗日，更不能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凡批评国民党政策者，即为“危害民国”，要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治罪。旅店饭馆里，都贴了“勿谈国是”、“勿谈军事”的条子。从1935年开始，随着全国和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人们逐渐敢于说话和议论了。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热泪盈眶地第一次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而且放声歌唱了。东北军、17路军士兵也放声歌唱了。抗日救亡歌曲，不翼而飞，长安城中，歌声处处。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怒吼了！

下面，是西安事变前两年(1935、1936)在西安群众中，广泛流传的若干抗日救国歌曲。



张寒晖(1936)。

张寒晖(1902—1946)，河北省定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的音乐、戏剧工作。“9.18”事变后，来西安，任“陕西省民众教育馆”总务主任，因创作进步话剧、歌曲，受反动势力排挤，回家乡定县。1936年二次来陕，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前后，多次率领剧团，赴关中、汉中各地巡回演出。1941年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1946年3月11日，逝于延安，终年44岁。

♩ = 2/4

义勇军进行曲

(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

田汉词 聂耳曲

1 1 0 3 5 5 | 0 3 2 1 0 2 3 | 2 1 | 5 5 0 5 5 5 | 1 0 2 | 1 - | 1 1 - | 5 0 7 |

1 1 0 3 1 2 3 | 5 2 3 1 3 | 3 - 3 2 | 2 - - 1 6 5 2 - 3 |

人 们 在 战 火 中 生 活 在 战 火 中 生 活

3 3 0 3 3 2 3 | 1 3 0 | 3 - 5 1 3 | 3 3 5 2 2 1 0 2 |

们 在 战 火 中 生 活 在 战 火 中 生 活

1 - 1 3 - 2 | 3 - | 1 - 3 5 3 6 | 3 3 1 5 3 3 2 | 1 0

们 在 战 火 中 生 活 在 战 火 中 生 活

3 1 0 1 - 5 1 | 5 3 3 | 3 0 3 0 3 1 | 3 1 1 0 |

们 在 战 火 中 生 活 在 战 火 中 生 活

《义勇军进行曲》，是1933年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的紧急关头，它象号角一样，召唤和鼓舞人民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去抗击侵略者。

♩ = 2/4

打回老家去

(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

张寒晖曲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打回老家去。

♩ = 2/4

新编“九一八”小调

(歌剧“放下你的鞭子”插曲)

张寒晖曲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九 月 十 八 日 来 了 日 本 兵 先 占

九 月 十 八 日 来 了 日 本 兵 先 占

九 月 十 八 日 来 了 日 本 兵 先 占

《新编“9.18”小调》首页

12月16日西安市民大会

1936年12月16日，为响应张、杨《八项救国主张》，西安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在革命公园联合举行市民大会。大会主持人宋绮云，特邀张学良、杨虎城等将军出席。张、杨和各界代表分别在大会上讲话，受到群众热烈欢呼。

西安市民大会会场之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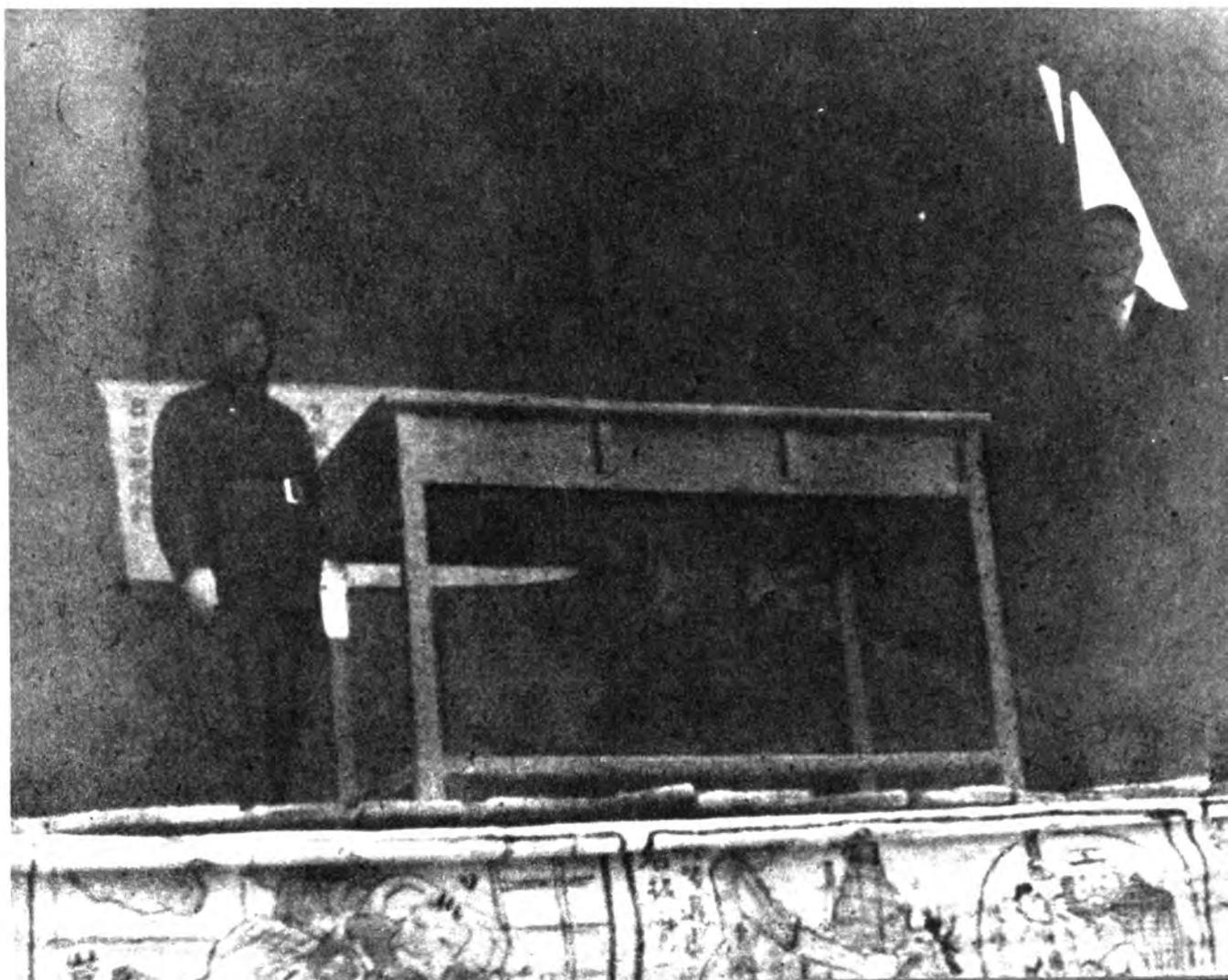
西安市民大会盛况。





西安市民大会会场门外情况。

西安市民大会主席台前之抗日漫画。





张学良将军在西安市民大会上演说。大会主持者宋绮云(左一)。

1936年12月17日，西安《解放日报》刊载的张学良演说词。

張主任委員演說詞
 各位先生：我今日能站在此處，向各位演說，實是感到非常榮幸。我今日演說之目的，在於向各位報告我個人對於目前局勢之見解，並向各位提出我個人之請求。我今日演說之目的，在於向各位報告我個人對於目前局勢之見解，並向各位提出我個人之請求。



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市民大会上演说。左一为宋绮云。

1936年12月17日，西安《解放日报》刊载的杨虎城演说词。

楊主任委員演說詞
 各位先生：我今日能站在此處，向各位演說，實是感到非常榮幸。我今日演說之目的，在於向各位報告我個人對於目前局勢之見解，並向各位提出我個人之請求。我今日演說之目的，在於向各位報告我個人對於目前局勢之見解，並向各位提出我個人之請求。



西安市民大会后，
游行的学生队伍。



西安市民大会后准
备出发之游行队伍。

“兵谏”后的重大措施

创办西安《解放日报》

“兵谏”后，张学良、杨虎城在军事、政治方面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主要有：创办《解放日报》、撤销“西北剿总”、改组陕西省政府，设立幕僚机构；设计委员会和参谋团、释放政治犯、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等。

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当局接收了国民党（CC系统）在西北地区的机关报《西京日报》，创办西安《解放日报》，由从德滋、魏文伯等主编。宣传张、杨《八项主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该报在各界人民群众中，颇有影响。

魏文伯。



西安《解放日报》第一号报头。

日四十月二十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解放日报

電報掛號〇〇七九 社址西安五味什字

解放日報社啓事

由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起所有西京日報社一切社務及債權等均由本社完全接收特此通告

西京日報社啓事

本社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起停刊所有本社一切社務及債權等均完全負責交由解放日報社接收特此通告

全國一致主張抗日

張代總司令

乍寸恩书哉是川舌

號	二	第
份	一	每
四	一	第
例	刊	日
價	外	國
每	全	年
份	四	元
每	十	元
份	五	元
每	五	元
份	五	元

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

1936年12月14日，西安事变当局决定取消蒋介石的“西北剿总”，所有“剿共”工作全部停止。另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公推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任军事委员会正、副委员长，董英斌为参谋长。并通电全国。

1936年12月15日，
《西京民报》的报道。

“西北剿总”大门(1936)。

“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

设在“西北剿总”旧址。

外牆閱弟兄

剿匪總部正式取消

改設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
公推張學良楊虎城分任正副委員長

宋美齡 蔣中正 張學良 楊虎城 董英斌

西京民報

The Sinking Mass

號七七一第

刊化新中四 日 七 號

號七二四 日 七 號

號八一九 日 七 號



改组陕西省政府

西安事变后，原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民政厅厅长彭绍贤等均被免职。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任命原西安绥靖公署总参议王一山暂代陕西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免去原财政厅厅长朱镜宙职务，由续式甫接充；免去原省会警察局长马志超职务由赵寿山接充；免去原教育厅长周学昌职务，由李寿亭接充；免去原省政府秘书长耿寿伯职务，由杜斌丞接充。原建设厅厅长雷葆华留任。



杜斌丞(1934)。

杜斌丞(1888—1947)，陕西米脂县人，爱国民主人士。“五四”运动前后，任陕西榆林中学校长，1922年与杨虎城结识。后在杨部任职。主张联共、反蒋、抗日。西安事变后，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杨虎城就西安事变经过向陕西省政府职员讲话（左下为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

解放政治犯

“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系張楊《八項救國主張》之

1936年12月13日，張楊手諭釋放陝西各地被國民黨關押的政治犯。15日，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為此又專門發出通令。

西安地區管押的政治犯以“西北剿總”、“接署軍法處”和“陝西省第一監獄”為最多。此次被釋放者有：趙伯平（趙肅哉）、趙寶森（趙寒、包森）、蒙甘新（蒙日章）、許天杰、劉竺生、惠金王、徐玉山（潘樹藩）、杜跟乘、趙應魁（“貨郎子”）、屈世英、韓赫俠、武興、韓學理、聶建國等。此外，呂劍人、胡治安（胡達明）、張仰光、王富華等，于西安事變前夕保釋。共180多人。省內各地的政治犯亦相繼獲釋。

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報》的報道。

張楊手諭

釋放政治犯

本省各地政治犯

已奉令次第開釋

愛國救國罪人得恢復神聖自由

張代總司令楊主任以政治犯非禍國殃民之罪犯，乃係有積極救國主張之人，因政治認識不同，致遭纏縛，故於通電時，即提出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之主張，茲悉張代總司令楊主任，為實現上述主張，已於昨日（十二）諭令即將總部管押之政治犯一律開釋，至其他各地軍事政治機關所押之政治犯，亦將次第行見，萬千因愛國救國而遭幽禁之人，得獲神聖自由，共走向民族解放陣線。

1936年12月14日，西安《解放日報》的報道。

版一第

三期星

報日放解

日六十

西京日韓社啓事

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委會

通令釋放政治犯

除賣國漢奸外其餘政治犯一律開釋
俾集中一切人才策策軍力共赴國難

限各機關奉令十日內須辦完竣

所有政治人犯，多為愛國志士，惟因主張之不同，或言行之過激，致陷囹圄，絕非一般作奸犯科之罪犯可比，坐令長此羈押，揆諸情法，良深痛惜，所以釋放政治犯，俾集中各黨各派人才，共赴國難，殆為全人民一致之主張，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成立伊始，即俯順輿情，特於昨日通令釋放一切政治人犯，茲探錄原令文如左：

查年來愛國志士青年，因激于救亡熱忱，思想言行歧異之故，致身遭纏縛，坐陷囹圄者，不可勝數，畧跡原情，殊深痛惜。現值外侮日亟，國亡無日，自當容納各黨各派，集中一切人才，策策軍力，共赴國難。茲特規定釋放政治人犯辦法如下：一、凡政治人犯，一律釋放，但有賣國行為之漢奸，不在此限。二、政治犯兼犯有他罪名者，其他罪名，仍依法辦理。三、凡應予釋放之政治犯，未經發覺，或曾被通緝，未經緝獲者，一律免予追緝，已發覺者，不論已否起訴，與已否判決，經訊明後，概予開釋。四、凡經開釋之政治犯，應由原偵查或審判機關辦理，但有不得已情形時，即由現在之羈押機關或監所辦理。五、關於開釋政治犯，如有疑義，應呈由本會核示。六、各機關部隊法院感化院收容所，統限於令到十日內，辦理完竣，并列表具報本會備查。合亟令仰該日遵照辦理，轉飭所屬，一體遵照，並仰將奉文日期具報備查，為要。此令。

成立红军驻西安联络处

1936年12月13日，中国抗日红军驻西安联络处于西安七贤庄一号成立。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后，联络处改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西安事变期间和抗战初期，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等均曾在这里处理重要工作和接待各界人士。



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

红军驻西安联络处——
西安七贤庄1号。

成立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



西安东大街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大门（1936）。

西安事变前，这儿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及“肃反”会（CC特务机关）所在地。事变后，所有党、特人员都跑光了，群众自动卸掉了国民党的牌子。“西救”机关移驻这里，民运指导委员会成立后，也驻这里。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是继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在上海成立之后于西安成立，以杨明轩等为领导。宣传《全救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对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西安事变后，“西救”的组织及其抗日救亡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

1936年12月14日“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成立。这期间，各界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计有：陕西绥绥抗敌战地服务团、陕西回民抗日救国会、西安妇女救国后援会、西安新闻界救国会、印刷工人救国会、装卸工人救国会、人力车工人救国会、小业救国会、公务员救国会等30多个群众团体。20多个县成立了救国会。长安县杜曲、临潼县新丰等地还成立了群众武装组织“西北人民抗日先锋队”、“抗日义勇军”。

“讨伐”与反“讨伐”的斗争

南京主战派的所谓“讨伐”

1936年12月17日，南京《中央日报》关于“讨逆”的报道。



12月16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讨伐”西安，并推定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何随即宣布：徐庭瑤为前敌总指挥，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并命令前方各军立即发动进攻。同时派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

为反击何应钦的“讨伐”，东北军、17路军和中国抗日红军确定联合作战。东北军57军(缪激流)、105师(刘多荃)调至渭南、华县一带。51军(于学忠)和67军(王以哲)警戒兰州、平凉至咸阳一带。17路军驻守华田和蒲城。红军南下到西安周围和高县一带，各军严阵以待。

12月17日何应钦下令进攻西安。把守潼关的17路军42师冯钦哉部叛杨投何，何应钦的东路集团军的28师(董剑)、36师(宋希濂)、57师(袁肇昌)、教导队(桂永清)得以闯入潼关，但都行动迟缓。西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留南京协助孔祥熙策划和平解决，迄未到任，胡宗南军、观望不前。唯有教导队长桂永清自告奋勇于17日率教导总队第一、二团和特种部队由华县向赤水西岸的东北军开火，遭到东北军105师(刘多荃)第二旅(唐君尧)、112师(霍守义)迎头痛击，几乎全歼，大败而逃。同日，蒋介石下令停战。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何应钦(1936)。

上海《大美晚报》关于“讨伐”的报道。

何应钦(1889—)，南京政府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南京“讨逆军”总司令。亲日派。



徐庭瑤(1936)。
南京“讨逆军”前敌总指挥。



刘峙(1936)。
南京“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



顾祝同(1936)。
南京“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

大動搖の南京政

學良氏を罷免、逮捕令

軍事は馮氏、孔氏行政院主宰

何應欽氏を總司令に任命 張學良軍の討伐を決行

蔣氏の安危如何に拘らず?
國民政府緊急會議で決定

一方

張氏

蔣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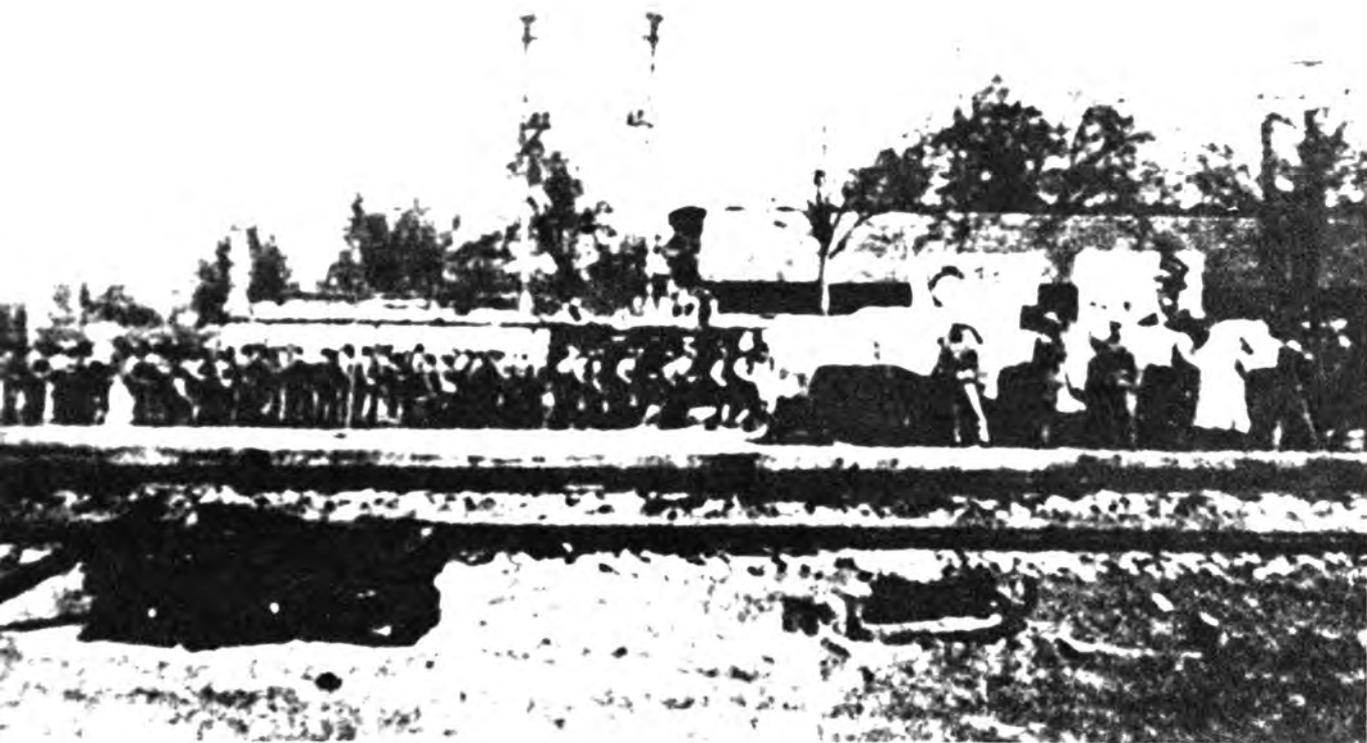
學

日本《朝日新聞》
对南京政府“讨伐”
派挑动新的内战之
幸灾乐祸的报道。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

潼关火车站(1936)。
刘峙的“讨伐军”东路集团军西进潼关。





渭南民房被炸起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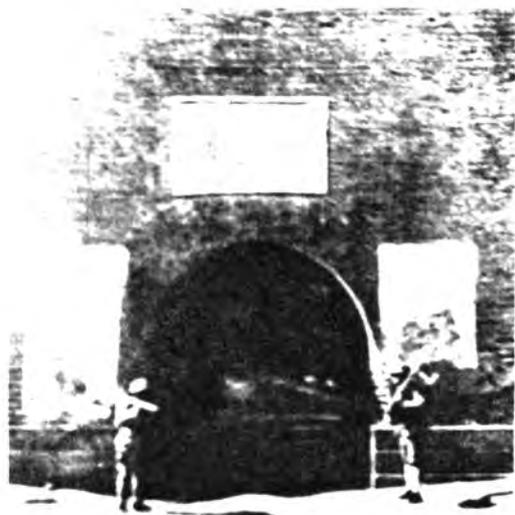


轰炸渭南南京飞机。

西安事变中，17路军城防部队严密监视南京飞机的袭扰。



被“讨伐”军侵占的潼关。



潼关城楼(1936)。



建設新陝西



国民党在潼关的反动宣传(1936)。

“西救”通电全国 劝告何应钦勉全晚节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各院部會暨各級地方官廳
 司各省市縣各級黨部各機關團體各界各團體各學校
 各埠本會致何部長致之先生一電、文曰、(魯專)機自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東北四省以來、侵略之深、有加無已
 、對我冀東、贛我察北、近日更趨於國際化、我
 國民為侵略犧牲者、較東告罄、死國生機不絕如縷、

乃手握軍政大權、蔣介石氏、執意媚
 外、引盜入室、壓抑愛國民氣、牽制
 抗敵實力、徒固一己之權威、竟置國
 家危亡於不顧、全國民衆、莫不痛恨
 此間張揚國勢、激發民情、不得已而有雙十
 二對蔣氏兵燹之舉、並同時提出救國主張八項、一再保壽
 氏之覺悟、一再以民意為依歸、誠以目前國難、只
 有積極抗日、方足以爭取生路、亦惟
 有一致對外、始可以促成統一、全國
 民衆、無不同聲要求、乃日來道路傳聞、謂
 先生有變動于戈饋造內戰之意、並謂日派遺以人民血汗購
 備禦侮抗敵之飛機、投彈轟炸三原渭南之無辜民衆、殘酷
 恐怖、意圖何居、以此間指斥何梅協定、因而遷怒於民
 衆、抑欲出賣民族、繼承蔣氏權威、不惜執行日人之使命、
 俾遂一時領袖之私慾、孰恐先生在自鳴得意時、而棄棄國
 書民國漢奸使者、已立先生後矣、世界民族思想
 、彌蔓全國、已非昔比、執真抗日、
 孰受擁護、孰作漢奸、孰遭唾棄、未可
 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而後世貶責、
 尤為可懼、蔣氏近尙弄賢、謂有吾在決不使南京與
 西安發生內戰、會論情氏亦謂、天發毀機、人民危矣、謂
 家元氣裂、何能共御仇寇、而為民謀一種生機于預
 存虛偽之場、足見迷途知返、不遠而復、天良未泯、古
 今人何遠不相及、尙望先生亦能放棄野心、
 幡然悔悟、調西來內戰之旅、充北上
 援綏之師、將來抗日功成、民族解放
 、或可以晚節而蓋前愆、非然者、執
 迷不悟、自率國人、不特預內戰全責
 、且民意所在、順逆昭然、一意孤行
 、必至身敗名裂而後已、後悔何及、
 臨崖勒馬、惟君自決、不盡欲言、西力
 各界救國聯合會印(二十日)等語、特電奉送、
 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印、

1936年12月22日，西安《解放日報》刊登之“西救”通电。

于右任奉命“宣慰”

1936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根据张继的提议，通过以下右任为“赴陕宣慰使”，“宣慰西北军民”。企图利用于右任与杨虎城的公谊私交关系分化张、杨。

以下右任为首的“赴陕宣慰团”（又名“西北宣慰团”）随即组成，参加者有张钫（前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曹世英（前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马青苑（前杨虎城部陝西警备师师长）、毕梅轩（前陝西警备师团

长）和于陆（前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等。

12月17日于等离南京，19日晨到潼关，电杨虎城派车接他，杨、张商定不予接待。

于右任得悉宋子文于12月20日到西安受到张、杨接待，即打电话问杨：为何“迎宋而拒于？”杨答：“宋来西安，是以私人资格探视蒋的，没有担负任何使命；你是奉命来宣慰的。我们劝你回南京，不要来西安。”“如果你这次来陕，是想去三原扫墓，探亲，或者赞成我们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共同抗日，我们是竭诚欢迎的。”与此同时，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得悉于右任要来西安“宣慰”，激愤异常，当即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



于右任(1936)

▼ 1936年12月22日，西安《解放日报》刊登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于右任电。

潼关东城楼(1936)



为抗击南京“讨伐”，红军南下关中

为与东北军、17路军联合作战，抗击国民党南京政府对西安的“讨伐”，中国抗日红军南下关中，挺进淳化、同官、白水、泾阳、三原、富平、咸阳、蓝田等地。来到关中各地的红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态度和

蔼、公买公卖，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等情况，一下子揭穿了长期以来国民党关于红军的歪曲宣传，各地群众纷纷前来“看红军”。



1937年1月，中国抗日红军之一部，挺进三原受到17路军赵寿山及地方人士的热烈欢迎。前排左起：任弼时、彭德怀、赵寿山、姚警生。后排左起：杨尚昆、陆定一、杨发震、马文彦、冯一航、常议三。



1936年12月，中国抗日红军第二方面军挺进同官县(今铜川)陈炉镇。前排左起：甘泗淇、关向应、朱瑞、贺龙、王震。后排左起：彭绍辉(2)、廖汉生(6)、李井泉(12)。

1937年1月，中国抗日红军15军团司令员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率部挺进咸阳县。西安《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杨虎城的代表米暂沉及记者，乘车前往咸阳慰问。

前排左二起：杨宾清、米暂沉、徐海东、宋绮云。

1936年12月31日，中国抗日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挺进白水县，受到东北军及地方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蒋介石的停战手令

1936年12月16日，端纳第三次飞到西安，向蒋介石转达宋美龄的意见：为了蒋的安全，要求蒋先对南京方面下下令，停止战争。蒋采纳了宋的建议，12月17日，在西安给何应钦（字敬之）写了停战信。当日交蒋鼎文带回南京。

蒋介石给何应钦的信

敬之先生：聞昨日本
軍在渭南轟炸
生即令停止以
情現察中於本
期六日以前未
故星期六以前
不予衝突并即
止轟炸為要順
此
中
二十
二十

1936年12月19日，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报道蒋介石有停战手令的消息。21日，刊登了手令全文。



西安事变前，来陕之蒋鼎文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来

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

张杨周三方会谈

西安事变后的全国政治形势极其错综复杂。日本引诱南京政府“共同防共”；南京政府亲日派策划出兵讨伐西安；另一方面，全国各方人民，出于义愤，纷纷要求杀蒋。在东北军、17路军内部，意见也不完全一致。因此，事变如何解决，对蒋如何处置，才有利于国家、民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事变当局认为必须与中共方面共同研究解决。

应张学良、杨虎城之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936年12月14日由陕甘宁苏区的保安(今志丹县)出发，16日到肤施。17日下午，刘鼎奉张学良之命，用飞机将中共中央代表团由肤施(延安)接到西安。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成员秦邦宪(博古)分管党和群众工作，叶剑英分管军事工作。李克农为秘书长。秦、叶、李三人后到。代表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住张学良公馆东楼。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

周恩来等到西安后，18日即开始了“三位一体”会谈，张学良叙述了蒋介石顽固地要打内战，不拘留他，无法使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拘留他，好逼他抗日。又说，蒋最初拒绝谈任何问题，现在允许谈抗日。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18日下午，周恩来拜会了杨虎城。

在三方会谈中，周恩来充分肯定张、杨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三方面，在政策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周又谈了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他估计了事变的两种前途，认为应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方针就是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他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还指出：“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极其重要。鉴于军情紧张，三方会谈中，还谈了军事部署问题。周恩来保证：如南京方面挑动内战，在任何情况下，中共都信守三方协议，联合抗击南京政府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成员还分头同在西安和附近地区的共产党员、党外人士谈话或座谈，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完全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捐弃前嫌，坚定地対事变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关键性因素。

中共中央代表团主要成员在西安。
右起：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



周恩来(左)在西安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936年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致电南京、西安当局，提议召开和平会议。

對西安事變

蘇維埃中央政府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議召開和平會議。本黨政府提議召開和平會議，切實解決南京當局一戰文日。

南京孔、蔣、汪、陳、白、李、張、胡、陳、立、夫、等先生，及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西安劉、馮、韓、楊、胡、王、劉、方、任、高、如、等先生，暨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諸先生，均鑒。

自西安提出抗日綱領以後，全國震動，南京的一黨內而擁護外，一政黨不能不慎重，西安諸公愛國熱心，真諸首列，其主張是立憲抗日，而南京諸公，則欲以日份子外，亦非毫無目擊，其發軔內戰，當非心願，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取其亡，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本黨本政府諸向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 雙方軍隊暫以目前為界，南京軍隊勿向陝西進發，西安抗日軍亦暫止陝甘境內，絕不和平會議解決。

(二) 由南京立即召開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代表參加。本黨本政府亦準備派參加代表。

(三) 在和平會議前，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先提抗日救亡提案，并對討論蔣介石先生處置問題，但基本綱領，應是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四) 會議地址暫定在南京。

上述建議實為解決目前緊急關頭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諸公，宜立即決定國策，以免值此國家混亂，中日寇寇乘而入也。并望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立即督促當局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定國策，共赴國難。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时所乘坐的飞机。



宋美齡致蔣介石信

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在西安被留，南京的宋美齡五內如焚。14日派端納飛抵西安，了解西安事變真相和張、楊意圖。端納帶來兩信：一信給張學良；一信給蔣介石。端納說：宋正在努力營救蔣，還準備親自到西安。

宋在給蔣的信中，表達了對蔣介石安全的急切關心。另外，該信署名的後邊，附有“戲中有戲”一句，暗示南京“討伐”派的別有用心。這句話後來被人剪掉了，剪掉的痕跡是顯然的。

12月15日，端納飛返洛陽，在電話上向南京的宋美齡報告之後，16日，又來西安。

張學良閱讀端納帶來宋美齡的信。



宋美齡給蔣介石的信

夫君受鑒昨日聞西安之變焦急萬分竊
思吾
先生以身許國大公無私凡所作爲無不
是爲自己個人權利着想即此一點才表足
以安慰且此日亦保吾
兄平日主張唯
兄以整個國家爲前提故年來竭力並相
軍備團結國力以求實效此日主張此公忠爲
賢之心必爲全國人民所讚解自下吾
兄所處境之真相若我輩即
亦知以應其忌嫉日夕祈禱
上帝賜福焉
兄平日脫離惡境則
兄亦祈求
主軍賜予安慰爲國
珍重爲禱臨書神往不盡敬言專此奉
達此也
宋美齡

宋美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谈判

三位一体同宋氏兄妹谈判

1936年12月20日，宋子文经张学良、杨虎城同意由南京飞抵西安，南京各报奉命发布消息，宋以私人资格去西安。

宋子文到西安后，了解了张、杨的意图，并同张学良一起去见蒋介石，知蒋很安全。但怕给何应钦以口实，不敢单独同周恩来会见。经别人送来了口信，表示同情西安的文举，说他早就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

周恩来也给宋子文转去了口信，说明中共并未参与事变，和对事变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望宋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蒋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全力以赴，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对周的态度之和平，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方针十分赞赏。

宋子文来西安收获不小。21日，同端纳返南京后，到处说蒋在西安平安，并赞美周恩来如何如何，说，南京有谁敢承担这样的风险到西安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

12月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一行飞抵西安。当日商量谈判程序。宋子文同意西安方面的意见，以八项政治主张为谈判基础。

12月23日，西安谈判开始，会址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楼会议室。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17路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谈判中，周恩来首先提出张、杨、周三方已经商妥的六项主张，并申述了理由。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民主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五、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宋子文表示同意和承认这六条，但要转告蒋介石。谈判期间，周恩来和宋美龄作了两次长谈。

12月24日，“三位一体”与宋氏兄妹谈判之后，当日晚，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见，宋氏兄妹陪同。蒋勉力坐起与周恩来晤，叹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周说：“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

挥抗日。”周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回答说：“以后不剿共了。”又说：“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周恩来向蒋特别说明这次事变性质及中共救国主张，指出：“当前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蒋连连点头。最后，蒋介石表示：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并说，他回南京以后，周恩来可以继续和他谈判。

西安谈判地址——张学良公馆西楼二楼会议室





1936年12月21日，上海《大美晚报》的报道。



1936年12月22日，
飞抵西安的宋美齡。

1936年12月20日，飞抵西安的宋子文。



端纳，蒋介石的顾问，英国籍澳大利亚人，记者出身，长期留居美国。“9.18”事变后，任张学良顾问，1933年张学良被迫出国后，任蒋介石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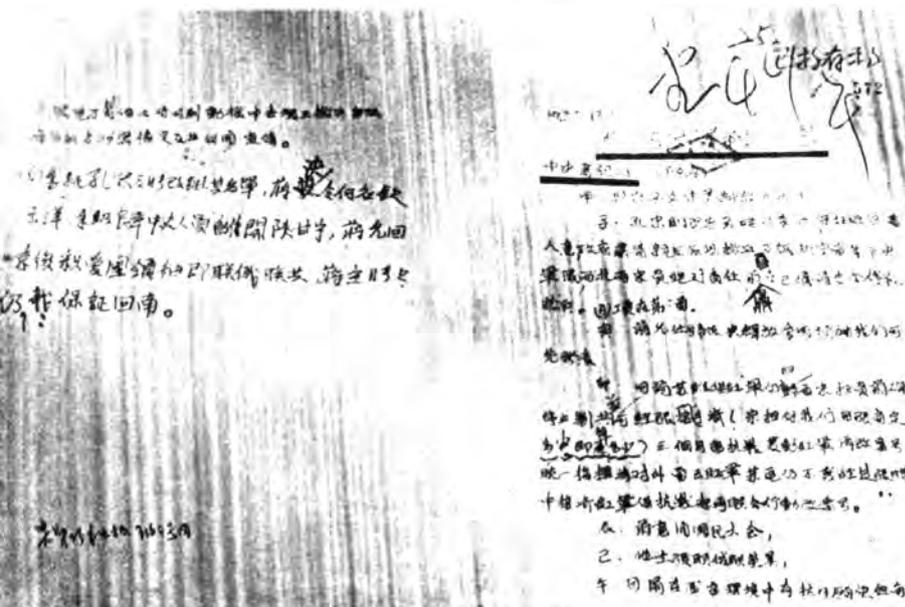
西安谈判的结果



1936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在西安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与宋子文谈判情况》的电报。

时间	电报目录	署名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请二十七军在原地休兵并保留驻地之通牒	周恩来 作 5
十二日	关于十二月事变动乱的报告	毛泽东 周恩来
十二日	关于十二月事变于十二月望宋子文等的报告	周恩来 作 5
十三日	请十五军首先赴洛与蒋主席在原地休息	周恩来 作 5
十四日	与杨尚文谈要前线各军主力立即南下	周恩来
十四日	五军分路要已撤散分攻	周恩来
十五日	毛、朱、周等致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周恩来 作 5
十五日	致沈队长好不能部队	周恩来 作 5
十五日	给沈队长等条件	周恩来 作 5
十五日	于子文致于子文并宋子文电	周恩来 作 5
十六日	请二十七军迅速南下撤防复原	周恩来 作 5
十六日	请子文向三中全会转送我们的条件	周恩来
十七日	请子文转告与各方领袖人物之谈话情形	周恩来
十八日	请沈队长于子文转告	周恩来
十八日	于子文致沈队长及民田田到洛问题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周恩来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毛泽东、朱德与周恩来、博古之间所发的部分电报目录。



1936年12月24日，谈判完毕，结果如下：
 一、电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停战撤兵。
 三、蒋回南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
 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
 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
 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
 八、联俄并与美、英、法联络。
 九、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
 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

同日，上述谈判内容，经蒋介石同意意义概括为以下六条：
 一、明令中央军入关各部队自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
 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
 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五、释放上海被捕各爱国领袖，即下令办理。
 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学良、杨虎城负其全责。

同日，蒋介石告诉张学良：“我同意你们的六条”，在改组政府方面要孔、宋商定名单，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令何应钦出洋。

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的结果》的电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

1936年12月23—24日，张、杨、周一方同蒋介石一方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多次谈判。谈判中蒋氏接受张、杨、周和西北抗日人民要求，允诺《六项条件》，并表示“言必信，行必果”、“以领袖人格担保”其实现。因而取得了西安方面的谅解。

12月25日，张学良以信义为重，相信蒋氏的口头保证，决定送蒋回南京。当日下午四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和送行者到西安机场。蒋在机场又一次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六项条件》复述了一遍，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介石还说：“今天以前发生的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的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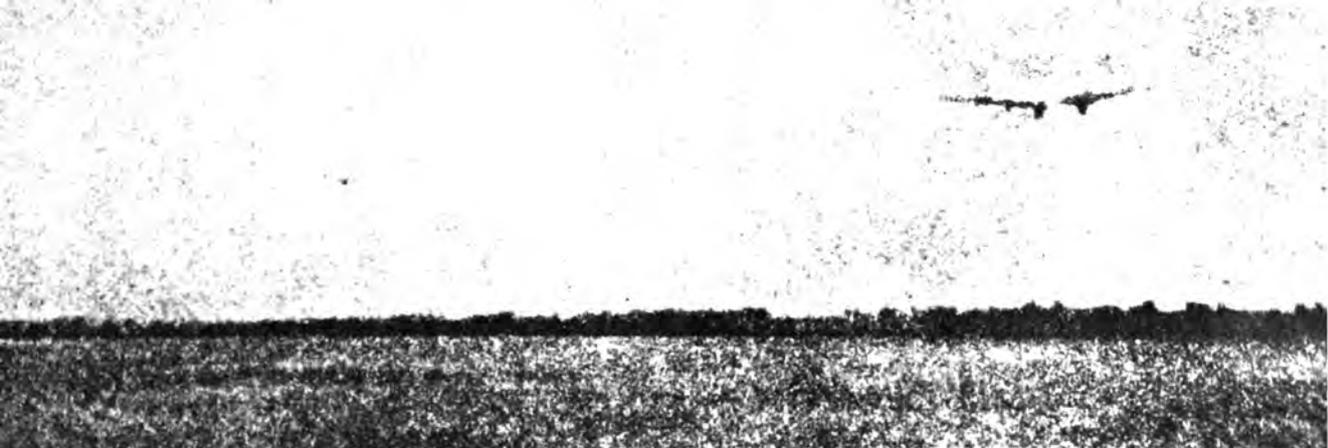
当日下午5时45分，蒋、张、宋等由西安飞抵洛阳，当晚宿洛阳航空分校。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时，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前，在西安机场。右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傅学文、邵力子。



起飞之前。





起飞之后



在洛阳机场。手拿
礼帽者为宋子文。



蔣委員長昨安返洛陽
借宋子文宋美齡等乘機同抵洛
定今晨由洛起飛返京主持大計
前綫各軍已奉令休戰停止前進
隴海路局限午夜恢復西段破城路軌
專車兩列今載陳誠等被困各將領東下

本報特刊
新書

蔣委員長昨安返洛陽

借宋子文宋美齡等乘機同抵洛
定今晨由洛起飛返京主持大計
前綫各軍已奉令休戰停止前進
隴海路局限午夜恢復西段破城路軌
專車兩列今載陳誠等被困各將領東下

大豐老牌

回力老牌

1936年12月26日，上海《大美晚報》关于蒋介石到达洛阳的报道。

张学良离陕手谕

1936年12月24日晚，张学良向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说明他要亲自送蒋回南京，王以哲等劝他不必相送。当日晚，高崇民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保留地放蒋的危险性。一批东北军、17路军高级将领和幕僚们也联名写信，提出放蒋的条件：必须是在商定的问题上签字和中央军必须立即撤出潼关。张学良仍然决意要送，也没同周恩来商量，即陪蒋介石走了。但他也预感到此去有发生意外的可能，为使东北军在情况万一变化时，能够临危不乱和团结处变，张学良一再向他们交代：“关于东北军之事要听命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要听命杨虎城。有问题多和周恩来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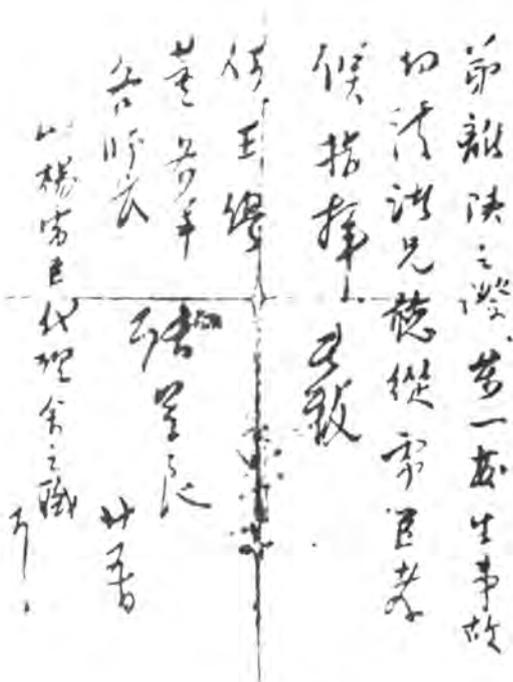


能够临危不乱和团结处变，张学良一再向他们交代：“关于东北军之事要听命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要听命杨虎城。有问题多和周恩来商量。”

25日下午，张学良在西安机场，又亲自交给杨虎城一份手谕。对杨说：“从今日起，你代理我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你和于学忠指挥。”

手谕上的何、王、缪、董系指：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四位军长，虎臣指杨虎城，孝候是于学忠。

于学忠。



张学良离陕手谕。

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

与陈布雷

对张杨的训词

蒋介石

1936年12月25日下午5时45分，蒋介石由西安飞抵洛阳，即令陈布雷以最快的速度写用了一篇文章——《对张杨的训词》。文章表明对张杨训话的地点是在西安。并于12月27日于南京公诸报端。训词的内容，完全是陈布雷奉命编造的。这篇文章，实为蒋氏回到南京之后对时局的声明。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设大之关键，与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亦并无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亦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诚之感召，尚不均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人更可知矣。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各种救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余万言。尔等均已寓目。在此十余万言中，尔等必已详细阅过，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为己私？是否有一丝毫一毫不诚不实在自欺欺人之事？余自兴学带兵以来，

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首页。

毛泽东评《对张杨的训词》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于陕北保安发表对蒋介石12月26日宣言（即《对张杨的训词》）的谈话（即《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谈话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接受的《六项条件》，指出蒋氏“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之领导者张、杨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折不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中国人民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1936年12月30日红中社电讯：共产党机关报《斗争》29日登载毛泽东28日之谈话。



毛澤東對蔣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談話

毛澤東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保安發表對蔣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談話。談話指出：所謂《對張楊的訓詞》，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獻。談話公布了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接受的《六項條件》，指出蔣氏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之領導者張、楊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今后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折不扣地實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卷蔣氏以去。

12



1936年12月29日，杨虎城给陕西各县县长的信，说明西安事变经过，并披露了西安方面所提出的八项主张以及蒋介石临行前当面对他承诺的《六项条件》。

顧祝同任西安行營主任

蔣介石回南京之後，對陝甘人士大加“整理”，1937年1月5日，國民黨南京政府行政院議定，派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楊虎城、于學忠撤職留任。孫蔚如為陝西省政府主席。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1937年1月9日，顧祝同在洛陽成立西安行營，2月9日到西安，2月11日就職。



顧祝同(1937)

政院議定陝甘善後

派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

楊虎城于學忠均撤職留任

孫蔚如主陝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

行政院(五)日舉行開會，討論陝甘善後事宜，議決如下：
 (一)派顧祝同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
 (二)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甘肅省政府主席王樹常，均撤職留任。
 (三)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四)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五)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六)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七)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八)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九)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十)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十一)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十二)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十三)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十四)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十五)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十六)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十七)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十八)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十九)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二十)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二十一)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二十二)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二十三)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二十四)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二十五)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二十六)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二十七)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二十八)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二十九)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三十)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三十一)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三十二)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三十三)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三十四)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三十五)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三十六)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三十七)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三十八)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三十九)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四十)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四十一)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四十二)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四十三)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四十四)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四十五)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四十六)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四十七)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四十八)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四十九)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五十)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五十一)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五十二)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五十三)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五十四)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五十五)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五十六)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五十七)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五十八)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五十九)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六十)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六十一)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六十二)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六十三)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六十四)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六十五)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六十六)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六十七)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六十八)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六十九)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七十)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七十一)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七十二)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七十三)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七十四)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七十五)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七十六)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七十七)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七十八)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七十九)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八十)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八十一)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八十二)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八十三)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八十四)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八十五)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八十六)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八十七)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八十八)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八十九)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九十)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九十一)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九十二)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九十三)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九十四)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九十五)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九十六)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九十七)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九十八)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九十九)甘肅綏靖主任王樹常，任留任留任。
 (一百)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任留任留任。

劉建緒在衢州召開

四省邊區綏靖會議

討論清剿殘匪方案
到六十縣縣長各師旅長等

張外長 在綏垣傷人
將繼續出
出發日期未
將何部
定遠來京
蘇鐵過京返
平財政局

1937年1月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日報》的报道。

汪精卫之梦破灭

1936年夏，蒋介石迫使他的政敌汪精卫出国。同年12月西安事变当日，国民党中央急电汪精卫返国。12月14日，汪复电，“遵即力疾启程”。18日，汪在法国会见国民党驻外使节郭泰祺、顾维钧，互谈国内情形甚久，以为东山再起之机已到。汪在离欧前表示：“本人决心反共到底，与南京抗日派决不妥协”云云。其投降卖国面目暴露无遗。12月22日，汪在马赛乘法国公司邮航阿拉米斯号首途。1937年1月14日由港抵沪。18日到南京。没有想到，此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方面已送蒋回到南京，“讨伐派”欲置蒋于死地的阴谋未遂。汪精卫之梦破灭。

在国民党内部，由反共走向里通外国，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的，大有人在。汪精卫之流，即其代表。汪精卫多年来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最高统治权而水火不容。但此公的不幸，是打出了一个卖国主义的旗帜，以坚决反共与对日妥协投降为号召，直至堕落成民族败类，公开叛国，当了头号汉奸，为国人不齿。

在国民党内部，由反共走向里通外国，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的，大有人在。汪精卫之流，即其代表。汪精卫多年来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最高统治权而水火不容。但此公的不幸，是打出了一个卖国主义的旗帜，以坚决反共与对日妥协投降为号召，直至堕落成民族败类，公开叛国，当了头号汉奸，为国人不齿。



1937年1月14日，汪精卫由港抵沪。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及在南京的中央委员在中央礼堂“欢慰”汪精卫，汪在席中起立致词。



1937年1月18日下午汪精卫乘欧亚机由沪飞南京。国民党南京政府主席林森冒雨迎接。

左起：汪精卫、林森。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

1937年3月11日，毛泽东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延安谈到西安事变。毛泽东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日本侵华以来共产党的一贯政治主张。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他指出：“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民党内的部分亲日派分子极力挑拨内战。如果不是共产党和各方面致力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兵连祸结，必然会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毛泽东在谈话中还驳了“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的说法，指出：“这些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说法，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原载《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一书。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1937)

1937年4月30日，杨虎城在西安新城大楼举行宴会。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排左起：慕哲夫(1)、张韬安(2)、贾文郁(3)、郭仰汾(6)、杨虎城(7)、顾祝同(8)、周恩来(9)、李百川(15)。二排左起：李百明(7)、叶剑英(2)。三排左起：王宗山(1)、王俊(2)、夏述(3)、李士墀(4)、徐海仙(5)、薛道五(7)、武士敏(12)、韩光琦(14)、窦荫三(15)、傅剑日(16)。



西安事变前后的中共陕西地方党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于1935年10月在西安成立，受中共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负责人陈赓)领导，支部书记谢华(又名谢兹山兼管组织工作)，支委徐彬如(又名徐文雅)、李木庵、宋黎、童陆生(17路军宪兵营副营长、后任17路军上校参议)、宋绮云(《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王根僧(17路军少将参谋处处长)、金闽生(17路军宪兵营营长)。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以17路军宪兵营为活动主要基地，以《西北文化日报》社为宣传机关，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以蒋自明经营的莲湖食堂为联络站，负责交通联络、情报传递以及物资供应等工作。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除领导陕南抗日第一军(负责人杨江、何振亚、杜瑜华)以外，根据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的指示，还领导了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及其所组织的部队(负责人郭化子)。

1936年春，中央派张文彬负责同西北特别支部联系。1936年12月25日，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并于中共陕西省委。



谢华。

徐彬如。



李木庵。



童陆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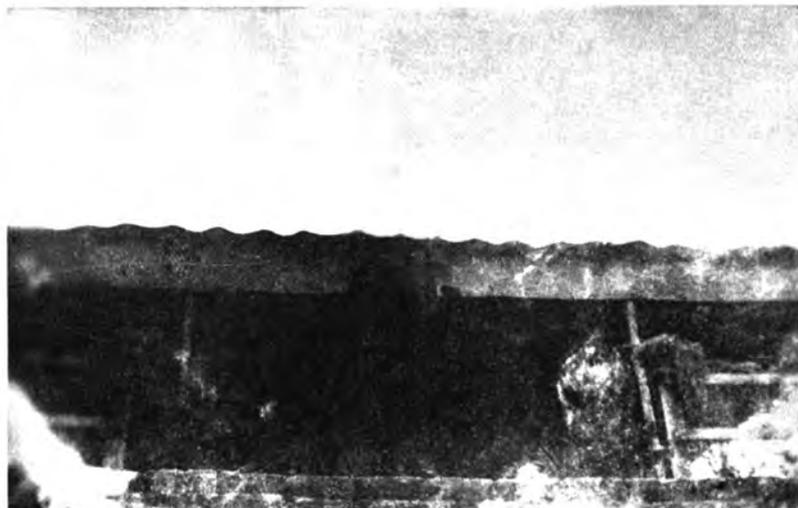
中共西北特支秘密资料室
(西安九府街止园后院)。



蒋自明。



西安莲湖食堂遗址。



郭化子。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员经常集聚的地方——西安许士庙街26号。



中共陕西省委



关锋(贾拓夫、1936)。

1935年冬，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确定：成立中共陕、甘、宁、青省委。省委书记李富春，组织部长洋清(欧阳钦)，宣传部长李一氓，秘书长蔡畅(女)。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政府工作负责人马锡五。陕、甘、宁、青省委机关驻郿县地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西安。18日，中央确定在原陕、甘、宁、青省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在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领导下，配合代表团工作。省委书记关锋(贾拓夫)，组织部长张德生，宣传部长李一氓，李调走后，潘自力为宣传部长，军事部长洋清，后为宣传部长，秘书长彭加伦，副秘书长崔廷儒，彭调走后，崔为秘书长，崔调走后，张中为秘书长。中共陕西省委秘密机关，最初在西安二府街二府园李焕卿家。

1937年2月8日，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来陕后，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迁至距西安城北60公里的泾阳县云阳镇，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留守处”，并有武装掩护。

1937年底，汪锋从山西抗日前线回陕，省委又增加汪锋为军委书记兼统战部长，方晟(赵伯平)为民运委员会主任兼党员训练班主任，惠子俊为职工运动负责人，张秀岩为妇女运动负责人，董学源为学生运动负责人。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和平、民主、抗日而奋斗。在中共中央代表团的领导下，中共陕西省委做了大量的工作。



洋清(欧阳钦、1937)。



李一氓。



张德生(1937)。



在云阳的中共陕西省委秘密机关。



1936年，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的秘密机关——二府街二府园3号。



潘自力(1952)。



方 晨(赵伯平、1952)。



崔廷儒(1937)。

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

到达南京



蒋介石(右)、宋美龄
(中)同孔祥熙会面。

在南京明故宫机场。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由洛阳飞抵南京。

前左起：蒋介石、宋美龄、林森、孔祥熙。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南京后，同曾在西安被扣留的南京军政大员会面。前排右五为蒋介石。



张学良被审被赦又被管束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即失去自由。1936年12月29日，南京政府为审判张学良，以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组成高等军事法庭。

12月31日，南京政府军委会，通知张学良“开会”。张进入会场，始知不是开会，而是审判，并被宣布逮捕。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直言不讳，他以悲愤的心情，控诉了“9.18”事变中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并宣读了《铣电》，接着讲了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说明自己无罪。

《铣电》是怎么回事？“9.18”事变前后，蒋介石致张学良的密电，不止一次，其中首先是“9.18”之前两日即9月16日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忿，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18”事变后，蒋又致张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要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

张学良在法庭上质问李烈钧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有何不对？”李烈钧问：“你胁迫统帅，受何人指使？”张答：“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岂是任何人可以指使的么？”

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被判判处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5年。当日下午2时，蒋介石提出“特赦”，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法庭会审后，张学良即被软禁于南京陵园孔祥熙别墅。嗣后被辗转囚禁在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及贵州修文、桐梓、贵阳等地。1946年11月被特务押解台湾，囚禁至今。

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審 判處張學良徒刑十年 并褫奪公權五年即呈國府核定

蔣委員長核准

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判決書

被告張學良

主文：張學良，因九一八事變，對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

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判決書

被告張學良

主文：張學良，因九一八事變，對

1937年1月1日，南京《中央日報》之報道。

國府明令特赦張學良 仍交軍委會嚴加管束

國府明令

張學良，特予赦免。

國府會議

蔣委員長主持

所得稅推行順利

湘省各界電京表示擁護

組織就緒

保甲訓練部

張外長

昨午歡宴僚屬

王樹常蒞京

王樹常蒞京

1937年1月5日，南京《中央日報》之報道。

蔣委員長 請予特赦

蔣委員長令戴罪立功

李烈鈞來京

政訓處職員

張外長

王樹常蒞京

蔣委員長令戴罪立功

李烈鈞來京

政訓處職員

張外長

王樹常蒞京

1937年1月1日，南京《中央日報》之報道。

张学良在溪口致书杨虎城、于学忠

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在南京被审后，根据戴笠的紧急命令，四个便衣特务乘一架军用专机将张学良押解在蒋介石的故里浙江奉化溪口镇囚禁。在溪口期间，张曾三次致书杨虎城，又致书于学忠。

弟今半同端事，未决只目
前救国危局，勿为孔国计，商
定惟法二则，先速下最
大决心，使秀方及弟易收束
决甘之向，阅於改组政府及
对日问题，可在之中全会提
出，公同讨论，向于两案，弟
等速即商讨，示最后果断，
如有意见，补充先盼，常城或
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
诸公二策之一，各各问题，那
是更盼，盼即表，亦受命，
委，盼告弟，十七日，限，盼，
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法，详
计，二，凡有利於国者，弟
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
勿才为我个人谋计，西
部，雪天，各任，期，盼，
音，才，弟，良，书，十，日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于雪窦山致书杨虎城等17人。信中人物：虎城（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孝候（于学忠）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鼎方（王以哲）东北军87军军长；仲贤（吴家象）张学良的秘书长；乃庵（卢广绩）西北总部四处处长；秀方（马占山）；蔚如（孙蔚如）17路军17师师长；宪章（董英斌）原57军代军长；世甫（李兴中）17路军参谋长；开源（缪激流）新任57军军长；柱国（何柱国）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志一（鲍文樾）；公侠（沈克）东北军106师师长；芳波（刘多荃）东北军105师师长；伯纯（申伯纯）17路军军政治部主任；炳南（王炳南）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菊人（王菊人）杨虎城的机要秘书。

1937年1月13日夜，张学良于溪口雪窦山致杨虎城等17人信的补遗。

何柱国（1897—1985）。东北军骑兵军长，西安事变中任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

1937年2月中旬，经顾祝同派遣，何柱国由西安赴溪口见蒋介石，谈东北军整编，经蒋同意，到雪窦山看望张学良，谈了西安情况。



再致书，委，盼，告，即，力
兄，礼，送，为，盼。
弟，良，书，十，日



张学良和赵一荻在溪口雪窦山。



张学良在溪口雪窦山。

CHINA TRAVEL SERVICE
GUEST HOUSE
HSUEHTOU

六
 雪窦山仁兄大鑒。柱國克去。思
 不若心支持危局。前之十。此
 威。况。幸。風波已過。運。仍
 盼。兄。萬。國。勞。力。不。一。愧。會
 事。之。想。凡。利。于。國。者。至。望
 尚。有。何。惜。乎。弟。讀書。思
 通。講。事。是。為。精。而。念。而
 於。天。不。據。依。一。而。欠。恐。志。

1937年2月17日，张学良于奉化溪口雪窦山再次致书杨虎城。这封信是张学良托何柱国带交杨虎城的。

1937年2月1日，张学良在溪口雪窦山致于学忠的信。此信是托何柱国代交的。

此信为兄。中。若。已。命。方。先。大
 家。必。决。对。兄。如。对。弟。一。致。中
 同。青。老。皆。思。知。先。弟。在。任
 事。者。同。志。心。一。德。保。护。弟
 军。光。荣。以。所。保。护。弟。在。任
 事。者。同。志。心。一。德。保。护。弟
 者。也。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若。所。考。论。此。一。三。武。裝。事
 等。必。决。持。守。向。的。及。及。一
 且。武。裝。保。护。方。東。北。正。若
 之。前。更。要。思。大。家。共。濟。和
 衷。仍。在。旅。東。保。護。大。局
 務。須。領。袖。之。宗。旨。以。期。至
 抗。口。對。抗。日。軍。之。侵。略。

常城兄大鉴 志一多即端奉
 本手书 弟及弟侯前此
 遵令就战为决向放一快光用
 甚为欣快惟向于弟个人出道
 题在决向未解决前是不便
 说延断不可以为决决而前向
 题之焦点目下最重要者能奉
 以瑞弟弟去之甲项新法立即
 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达及
 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
 兄以大心大勇之精神形为倡
 导毅然希外弟在在甚好请
 勿以个人为念也勉首宣文不
 能合盼如者才在在复在在
 弟文向 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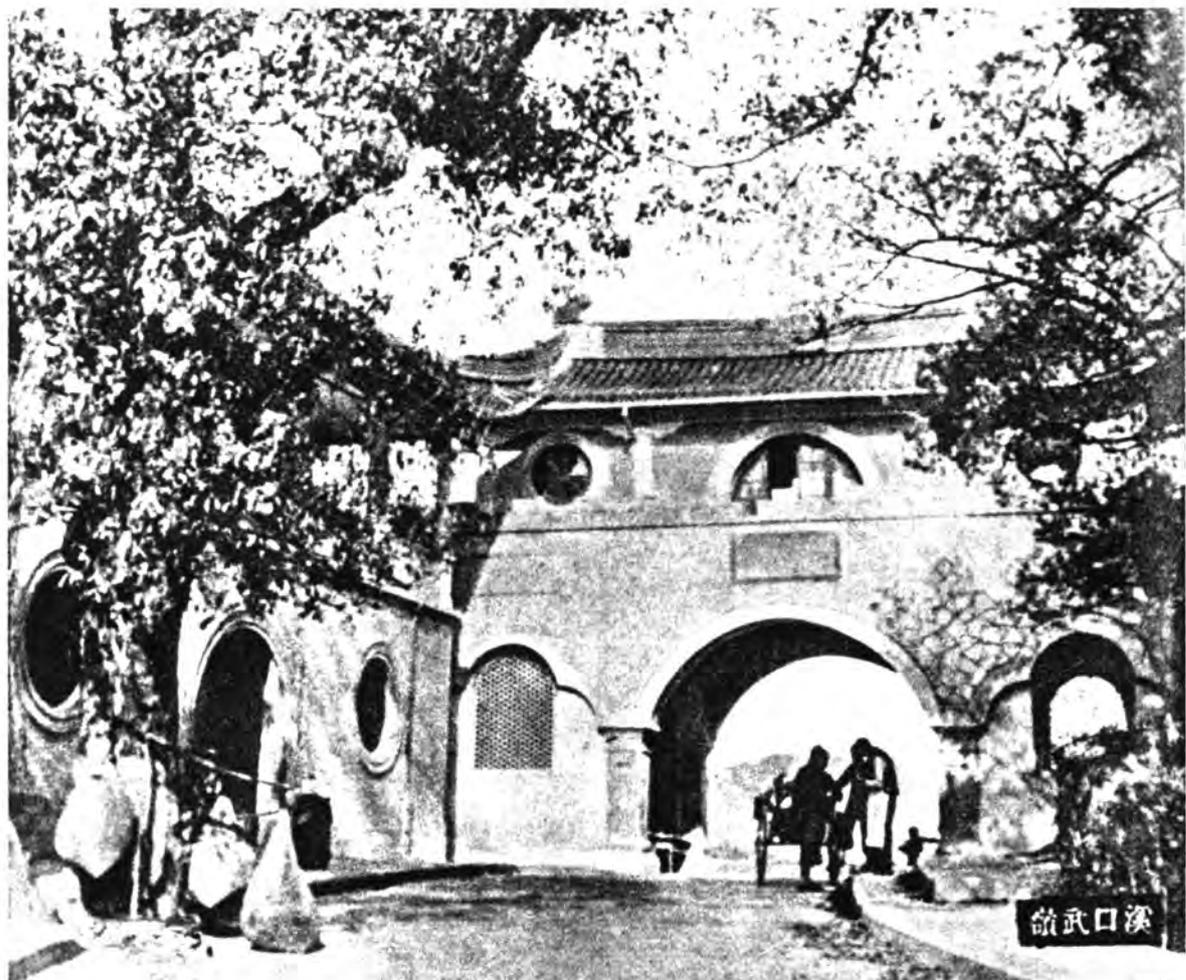
1937年2月19日，张学良于溪口雪窦山第三次致杨虎城的信。1937年1月16日，杨虎城派鲍文樾（东北军代表）、李志刚（杨虎城驻南京代表）飞南京。17日，鲍、李转奉化见蒋，经允许于雪窦山见到张学良，转交了杨给张的信。19日张给杨虎城写了复信。

1937年2月，杨虎城接张学良信后在西安新城广场对军官讲话，说明当前形势。台上为杨虎城。



溪口“度假”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由西安回南京，29日“辞职”，南京政府“慰留”，给假一月。同月，蒋回浙江奉化溪口武岭故里“度假”。“度假”期间为其母扫墓，为其亡兄开吊。



溪口武岭(1936)。



1937年1月，蒋介石在奉化为其母扫墓。



“度假”中的蒋介石夫妇。
后排左起：宋美龄、蒋介石、宋子良。



蒋介石在亡
兄介卿墓前致
祭。

蒋介石在溪口为亡兄蒋锡候开吊。1936年12月28日，蒋介石同父异母兄蒋锡候死亡，蒋对冯玉祥说，他的哥哥是西安事变“气死”的，因而1937年1月在溪口坟庄大开吊。开吊之日，国民党要人们多前往吊孝，计有，汪精卫、宋子文、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祖、莫德惠、何柱国、祝绍周、董显光、邵力子、端纳等。张学良在特务队长刘乙光等四人的监视下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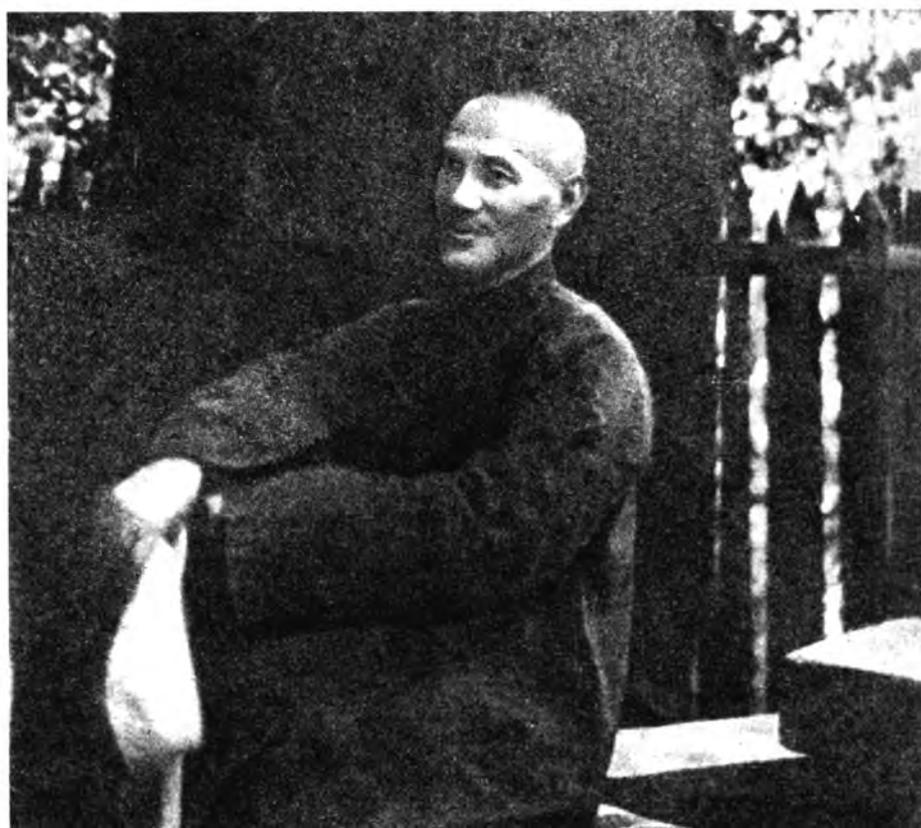


由奉化到杭州庐山

蒋介石在溪口休养整月，1937年2月2日由溪口到杭州、庐山，再事“休息”，于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返南京。



在杭州三潭印月。



在庐山。

抗议南京扣押张学良和挑动新的内战

杨虎城元旦阅兵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蒋背信弃义，扣张不放，消息传来，西安军民群情愤激。1937年元旦，杨虎城在西安西关操场举行盛大阅兵，抗议南京扣押张学良和挑动新的内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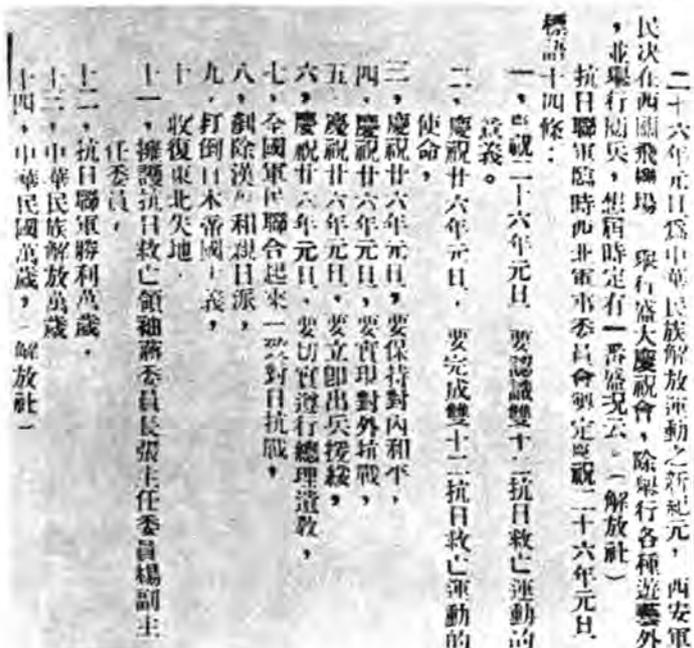
西安《西北文化日报》关于杨虎城元旦阅兵的报道。



告官兵书
前部分。



庆祝1937年元旦的十四条标语。





杨虎城发表演说。号召“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血路”。

元旦阅兵中的东北军 17路军阵容。



受检阅的17路
军步兵部队。



受检阅的17路
军炮兵部队。





东北军步兵通过阅兵台。

受检阅的17路军炮兵部队，右前领队者为孔从洲旅长。



西安十万军民武装游行示威

为反对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后，又挑动新的内战，1937年1月9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在革命公园举行全市农、工、商、学、兵武装游行示威大会。反对内战，要求抗日。会后，武装游行示威。



西安各界武装游行示威大会会场。

1937年1月9日西安各界武装游行示威大会之一角。



1937年1月9日，西安各界武装游行示威的农民队伍。





西安各界武装游行示威的妇女队伍。走在队伍前面的是杨虎城夫人、陕西省妇女会负责人谢葆真。

西安各界武装游行示威大会的标语、口号。

- 一、為和平而抗戰！
 - 二、歡迎南京軍民同仇敵愾！
 - 三、用武力保衛領土！
 - 四、用武力保衛西北抗日根據地！
 - 五、西北一切抗日力量團結起來！
 - 六、擴大抗日戰爭！
 - 七、西北民族武裝起來！
 - 八、西北民族總動員！
 - 九、反對汪奸挑動內戰！
 - 十、掃除奸細日份了！
 - 十一、全國軍民一致聯合起來對日抗戰！
 - 十二、擁護蔣十二抗日救亡運動！
 - 十三、擁護張楊兩主任委員！
 - 十四、省垣張楊兩主任委員八項主張！
 - 十五、擁護楊主任委員對德抗日！
 - 十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 十七、收復東北大地！
 - 十八、擁護抗日聯軍即北土援綏！
 - 十九、抗日聯軍勝利萬歲！
 - 二十、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 抗日軍委會
西北軍事委員會
宣傳委員會製

西安各界武装游行示威的群众队伍。



西安各界武装游行示威的群众队伍。



西安各界纪念“1.28”五周年

1937年1月28日，为淞沪抗战五周年，西安各界15万人于西安革命公园举行“1.28”淞沪抗战五周年纪念大会。

大会会场。



大会特写。



王以哲遇害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将军送蒋回南京被蒋扣留之后，东北军内部在如何营救张的问题上发生了“战”与“和”的激烈争论，以至互相杀害。元老派将领从大局出发，力排众议，愿与红军采取同一立场，主张和平解决。部分少壮派则不顾大局，反对和谈，要与南京拼死一战。这批人以“救张”为名，大哭大闹，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经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多方说服，他们仍不接受。

1937年1月31日，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在王家召开三方最高会议，决定坚持三位一体的团结，采取政治的和平的方针营救张学良。此时应德田、孙铭九等人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和平方针，是想“投靠南京政府”，是“叛徒”。2月2日晨，应德田、孙铭九指派卫队二营连长于文俊带一排人突然闯进王以哲家，将王杀害。宋学礼、蒋斌、徐方三位军官，同时遇害。前往谋杀何柱国的卫队二营连长王协一，因杨虎城将军的申斥而未敢动手。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力挽狂澜，亲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王家吊唁。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王的家属对王以哲将军作了崇高的评价：“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惊惜”。



王以哲将军被枪杀于西安南院门大车家巷7号之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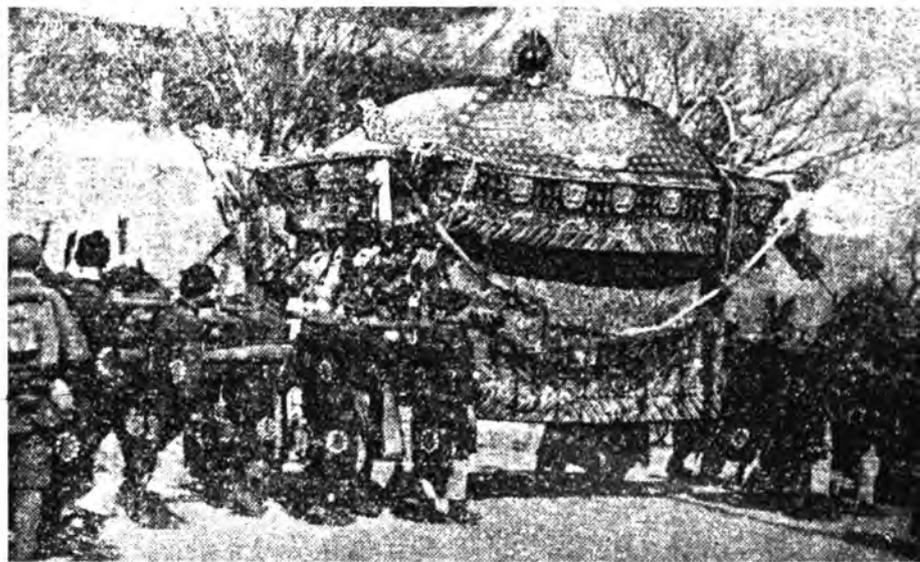
王以哲(1896—1936)，字鼎芳，黑龙江省宾县(原属吉林省)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在张学良麾下，历任东北军军士教导队排、连、营、团、旅、师长等职。1933年初长城抗战有功，升为67军军长。

王在1926年即和共产党有交往，曾多次掩护张克侠和共产党员张存实等人的革命活动。1936年2月参加洛川会谈，4月参加肤施会谈。同年任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

西安事变中，王和东北军、17路军高级将领执行“兵谏”命令，拥护张、杨八项救国主张。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 王以哲灵柩运抵北平(1937)。



▶ 王以哲灵柩在北平法源寺停放。

高福源葬地——西安东城墙根堆砖处。高福源，西安事变后提升为105师第一旅旅长，在洛川会谈以前，曾自告奋勇，为东北军联共充任了第一个使者，对东北军与红军的合作有突出的功绩。高并未参与“2.2”事件，但与老派将领刘多荃有隙，被报复遇难。

高福源遇害后，遗体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由其家属草草掩埋于西安东城墙外的荒草乱树间。1981年2月，经人民政府多方访问勘探试掘，在靠近东门的城墙外挖出一具尸骨，从头骨上的弹孔与军大衣衣扣等方面，确证是高福源的遗骨。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讨论对共对日政策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彻底破产，南京政府虽不断向西安施加军事压力，但也怕东北军、17路军和中国抗日红军联合作战，不敢轻启战端。面对西安事变后，全国人民更加高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和国民党内部的分歧，迫使国民党决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对共对日政策。该会于1937年2月15日在南京举行。会前，中共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建议；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四人向会议提出提案；杨虎城、于学忠也提出提案。国民党右派汪精卫则提出“剿共”政治决议案。会议经过斗争，于21日通过决议和宣言。

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有许多非常含混的语句，没有坚定明确的方针，没有批评自己过去的政策错误。但它在对内政策上表示要给人民一定的民主，承认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在对共政策上，表示国共两党可以进行谈判，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不再挑起新的内战；在对日政策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比过去的提法进了一步。因此，国民党三中全会仍然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开始转变。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式。



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团结御侮。得到国民党左派和各界人士以及爱国群众的热烈赞许。

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中國 國民黨三中全会電

高紅等方化
李維村制
二月二十七日

中國國民黨三中全会諸位先生鑒：

西安向數，和平解決，舉國慶幸。從此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方針，得以實現。實為國家民族之福。喜此日應揭中國民族存亡之鉅一數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会，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

一、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四、迅速完成抗日抗敵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

也貴黨三中全会果能毅然決然，定此國策，則大光為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始貴黨三中全会以如下的保證：

一、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区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之指揮。

三、在特区政府區域內，實現普遍的徹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收地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國難日亟，時不我待，本黨為國志誠可感，風念諸先生熱心為國定能允許本黨之請求，使全民族救亡之統一戰線從此實現。我輩同為黃帝子孫，同為中華民族兒女，同難同憂，惟有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後解放之偉大事業。謹此電達，佇候明教。

中華民族革命敬禮！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二月十日

杨虎城于学忠要求实行《八项和平主张》

1937年2月15日，杨虎城、于学忠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八项和平主张”案。



于学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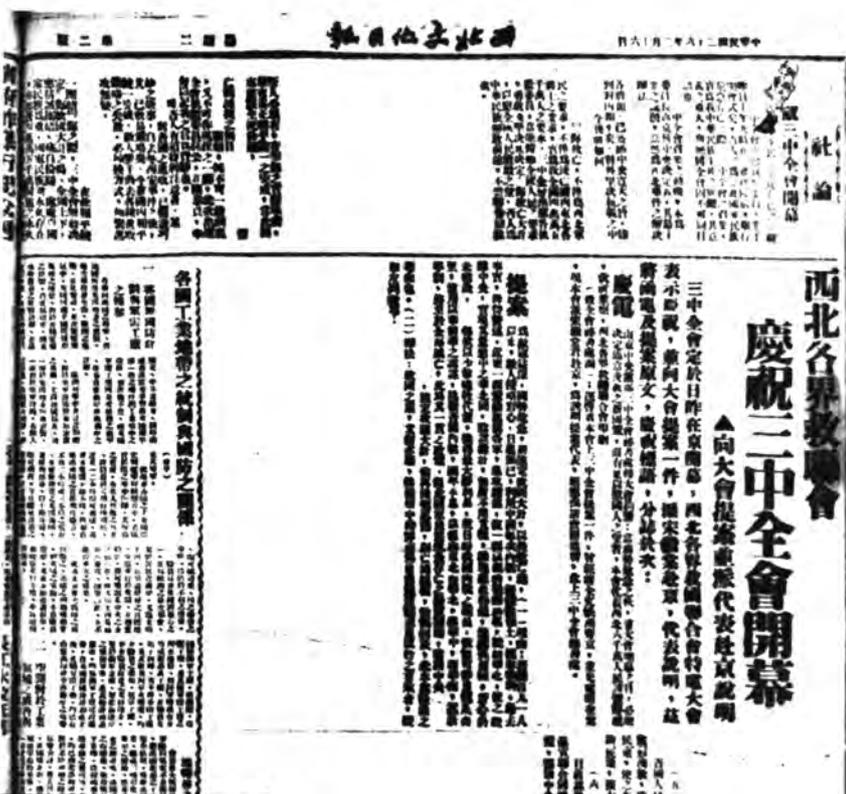


杨虎城。

杨虎城、于学忠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提案原文。



“西救”庆祝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



被陝西國民黨新聞檢查機關開了“天窗”的1937年2月16日西安《西北文化日報》。



东北救亡总会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献旗，要求收复东北失地。

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和所谓《根绝赤祸案》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西安事变当局以及全国人民联共抗日的主张、要求，收起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调子。但仍然为其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辩护。全会对内提出“和平统一”，即将武装“剿共”政策改变为“和平统一”政策，并通过了所谓《根绝赤祸案》。对外提出维护“领土主权”，但又认为“自当循国际和平之路线”，“力谋友谊之增进”，“凡政治的协调，经济的合作，必本两利之原则，以求互相关系之日趋密切”等等。拒绝提出明确而坚决的抗日主张。

1937年2月22日，上海《大公报》之报道。

（第一版） 大公报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三中全会今晨閉幕

大會昨通過根絕赤禍案

邵力子長宣傳陳公博長民訓

【本報訊】三中全会，於二十一日下午三時，在中央黨部禮堂閉幕。邵力子委員長，於閉幕式上，發表閉幕詞，略謂：此次大會，在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全體同志，均能盡忠職守，共濟艱難，對於各項提案，均能一致通過，實為我黨歷史上，所罕見之盛會。今後，當繼續努力，以完成建國之大業。陳公博部長，於閉幕式上，發表訓詞，略謂：此次大會，對於我黨之發展，具有極其重要之貢獻。全體同志，當繼續努力，以完成建國之大業。

根絕赤禍案

【本報訊】三中全会，於二十一日下午三時，在中央黨部禮堂閉幕。邵力子委員長，於閉幕式上，發表閉幕詞，略謂：此次大會，在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全體同志，均能盡忠職守，共濟艱難，對於各項提案，均能一致通過，實為我黨歷史上，所罕見之盛會。今後，當繼續努力，以完成建國之大業。陳公博部長，於閉幕式上，發表訓詞，略謂：此次大會，對於我黨之發展，具有極其重要之貢獻。全體同志，當繼續努力，以完成建國之大業。

（第一版） 大公报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三中全会閉幕

發表宣言闡明三大要點

對內和平統一對外維護主權 努力經濟建設消滅階級鬥爭

【本報訊】三中全会，於二十三日，在中央黨部禮堂閉幕。邵力子委員長，於閉幕式上，發表閉幕詞，略謂：此次大會，在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全體同志，均能盡忠職守，共濟艱難，對於各項提案，均能一致通過，實為我黨歷史上，所罕見之盛會。今後，當繼續努力，以完成建國之大業。陳公博部長，於閉幕式上，發表訓詞，略謂：此次大會，對於我黨之發展，具有極其重要之貢獻。全體同志，當繼續努力，以完成建國之大業。

大會宣言

【本報訊】三中全会，於二十三日，在中央黨部禮堂閉幕。邵力子委員長，於閉幕式上，發表閉幕詞，略謂：此次大會，在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全體同志，均能盡忠職守，共濟艱難，對於各項提案，均能一致通過，實為我黨歷史上，所罕見之盛會。今後，當繼續努力，以完成建國之大業。陳公博部長，於閉幕式上，發表訓詞，略謂：此次大會，對於我黨之發展，具有極其重要之貢獻。全體同志，當繼續努力，以完成建國之大業。

蔣委員長重囑

今後將改善管理 對各黨各派見政治犯當予

【本報訊】三中全会，於二十三日，在中央黨部禮堂閉幕。邵力子委員長，於閉幕式上，發表閉幕詞，略謂：此次大會，在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全體同志，均能盡忠職守，共濟艱難，對於各項提案，均能一致通過，實為我黨歷史上，所罕見之盛會。今後，當繼續努力，以完成建國之大業。陳公博部長，於閉幕式上，發表訓詞，略謂：此次大會，對於我黨之發展，具有極其重要之貢獻。全體同志，當繼續努力，以完成建國之大業。

1937年2月23日上海《大公报》之报道。

西安事变后陕西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到农村去

西安事变后，陕西各地都兴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其中突出的是西安地区。在中共陕西省委、中共西安学委与西安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西安所有中等以上学校都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农村工作团、回乡工作团、演出团队，共123个团队，深入各县农村。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建立抗日救亡群众组织。

1937年下半年，抗战开始，山西吃紧，陕西告急。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保卫陕西”口号，进一步号召陕西各县旅省学生回乡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春，西安师范、西安高中、西安女师三校联合组成“学生剧团”奔赴陕西合阳，韩城、澄城等地宣传抗日救亡。



1937年1月，乾县旅省学生回乡工作团部分团员在乾县中山公园。



1937年12月21日，西安高中
农村工作团第47团全体团员。

西安高中学生农村工作团，出发之前



1937年1月2日，西安学生农村工作团
第四、第十一团的西安师范、西安女师学
生在长安县农村。



1936年春，西安二中学生
业余剧团演出《五奎桥》。





1937年7月，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旅行剧团全体团员赴三原宣传时，在省立三原三中。

张周勤和西安二中学生在三原宣传时，赵寿山拍赠的一张照片。

张周勤(别名胡轩)，长安斗门人，共产党员，1937年春，在西安二中上学，193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三原县联络站站长，后到延安，在西北局工作，1947年10月7日和杜斌丞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西安。

趙壽山贈



張周勤先生存念

戶县旅省学生返乡抗日宣传工作团。



在分会门口。

1937年8月16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陕西分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西安夏家什字88号。“7.7”事变后，部分委员在研究抗日救亡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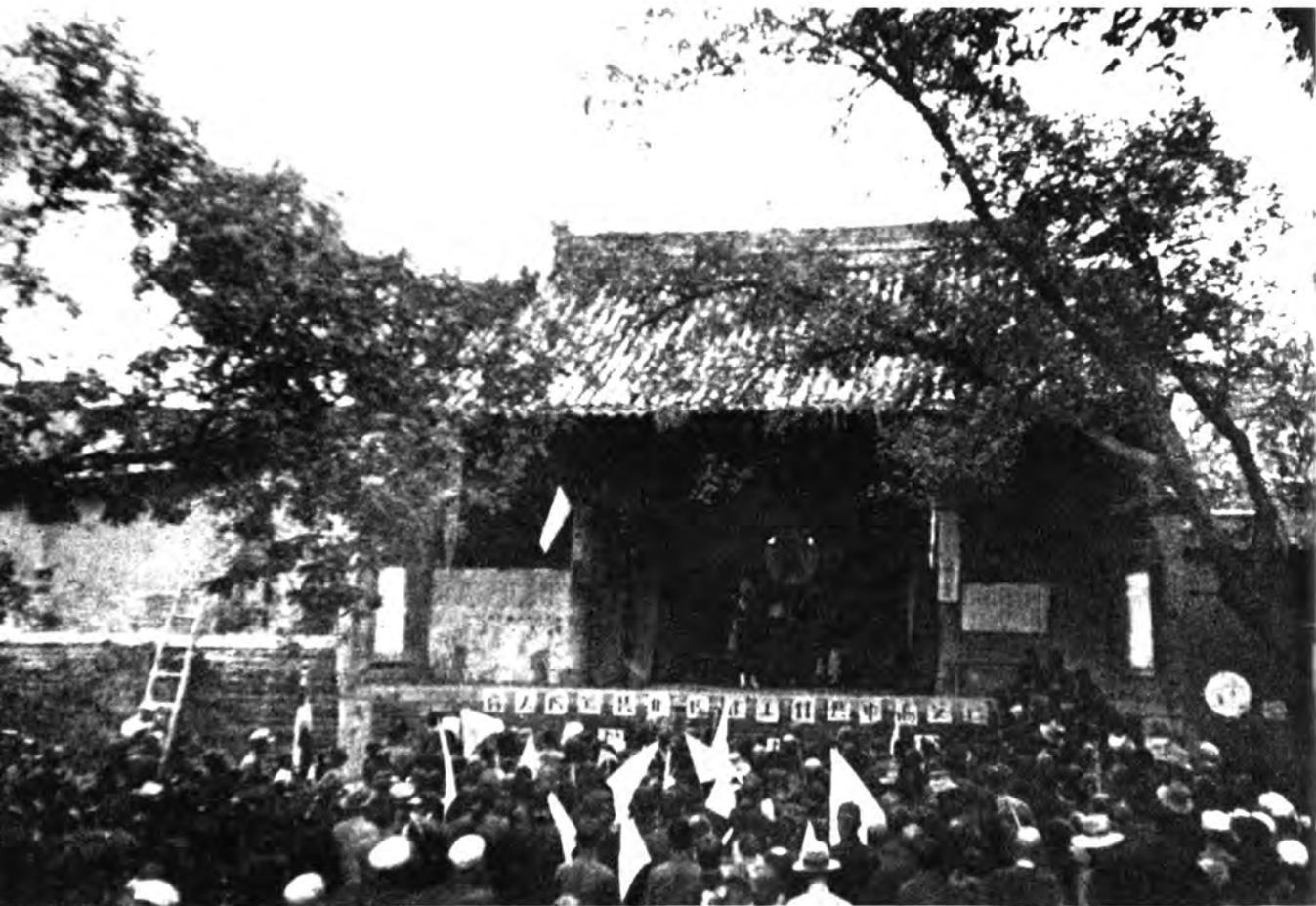


张寒暉率领“斧头剧团”赴陕南巡回演出救亡戏剧，图为回西安后的全团人员。

前排左起：第四人为张寒暉。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成立“12.12”剧团，张寒暉任该剧团团团长，图为张寒暉（着军装者）与陕西省民教馆部分同仁。



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旅行剧团，在泾阳县云阳镇城隍庙戏楼给红军前线总部和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排练中。



张寒晖(右一)在独幕剧《醉了》中饰张七。



东北军的“12.12”剧团从西安出发赴咸阳慰问红军演出的卡车。



张寒晖(左二)在话剧《一片爱国心》中饰日本妇人。

看戏。



看戏。





西安事变后，西安学生联合会派出一批骨干分子东渡黄河，在晋南永济县同“牺盟会”联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演劇隊章。西安事变，张寒晖又组成“斧头剧团”。“斧头剧团”不合法，受到陕西国民党多方限制，后以抗敌后援会演剧队名义对外交涉演出，展开救亡运动。

西安二中学生在耀县农村宣传抗日救亡。



张寒晖与平津流亡学生演出队。
后排左二为张寒晖。



1937年，长安斗门洋西群众在听西安师范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的演说。



儿童歌咏队。





1937年冬，西安学生剧团赴沿河慰劳河防部队。



户县旅省学生返乡抗日宣传工作组，携带的宣传品。



1937年春，西安师范、西安女师两校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在长安农村演出抗战剧《张家店》。



1937年4月，
西安二中学生在
西安郊区农村宣
传抗日救亡。

朝邑旅省学生回乡工作团。



演戏。





1937年春，西安师范农村工作团在山西永济县赵村演出。



1937年，西安师范、西安女师两校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在临潼演出救亡剧《放下你的鞭子》。



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旅行剧团赴三原演出。该团以西安二中中学生为主，并吸收各校学生组成。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西安学生农村工作团，在三原崔家堡小学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奔赴陕西

西安事变后，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抗日的号召，男男女女，提提携携，奔赴陕西、奔赴延安、奔赴安吴。他（她）们如饥如渴地寻求真理，要求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适应这一形势，中共中央青委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于1937年先后在陕西三原斗口农场、泾阳安吴堡创办“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朱德为名誉主任。冯文彬、胡乔木任训练班正副主任，该班除讲授有关社会科学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知识外，着重军事、军队政治工作和民众运动的实际训练。为抗日前线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军事、政治干部。



冯文彬和安吴青训班部分工作人员在一起。
右前：冯文彬。左前：刘瑞龙。



安吴堡
青训班之
内景。



安吴堡青训班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第六分团在安吴堡城外。

胡乔木和安吴青训班部分工作人员在一起。
右三：胡乔木。



安吴堡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在野外开学习讨论会。

安吳青訓班

親愛的朱德同志，我們的名譽主任：
青訓班全體工作人員和同學聽到你升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消息，都異常的興奮歡欣。青訓班最近除送了六個戰地工作團到前方工作外，在生產工作上已經完成八百畝地的開荒和播種，在教育工作上則決定今後青訓班主要任務是訓練青年工作幹部，期限延長，質量提高，以供給前後方青年工作的需要。今天我們舉行盛大的集會來紀念五四中國青年節和青教的成立二週年，在大會上全體一致宣誓要遵從你的指示：『學會打仗，學好本領上前綫打日本』。用加緊的學習和工作來配合前方的打仗，繼續輸送更多的青年幹部到前方去幫助前方打勝仗。我們以為這是慶祝你就任督職的最好辦法。希望你常常來信指導我們。祝你健康！

安吳青訓班慶祝中國青年節及
西青教二週年大會

寫給朱德同志的信



1938年5月，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從華北抗日前線回延安，途經西安，應安吳青訓班之邀向該班全體師生作報告。

安吳青訓班寫給朱德同志的信。

安吳青訓班
學員之一部分。



安吳堡中國青年幹部訓練班學員在野外學習。



安吳青訓班
孩子劇團。



西安“民先队”

西安事变前后，有一个先进的青年组织，成为西安各抗日救亡组织的骨干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的突击力量，这就是“民先”。它的全名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民先”最初由1935年北平“12.9”、“12.16”两次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于南下宣传途中组成，1936年2月1日于北平举行队员代表大会，制定《工作纲要》、并发表《宣言》。《宣言》宣布：“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总队部设北平，是全国各地“民先”的领导中心。

“民先”在西安的建立，始于1936年下半年，西安事变后，“民先”的活动公开化，组织有很大发展。“民先”西安队部设在二中、西北队部和全国总队部机关，均设在西安师范学校内。

1938年2月“民先”总队部由北平迁来西安。总队长李昌，组织部长陆平，宣传部长丁浩川，秘书长夏英喆(女)。西北队部负责人李连璧，西安队部负责人为于志远等。基层为各校民先队部。

“民先”各级队部，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在全国青年运动中，在西安事变中，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部分领导人在西安。前排左起：徐流、苏展、史洛(傅锡荣)。后排左起：李正风(李恩清)、丁秀(丁发善)、李昌、丁浩川。



西北民先队负责人。前排左二起：李连璧、傅希荣、陈平(李秉克)、阎彩霞、杨××、翟莲玉；二排左二为杨拯民；后排左起：朱平(1)于志远(4)。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立宣言

一九三六、二、一六。

換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中華民族的危機，已到了最後關頭了！

「九一八」事變，在「不抵抗主義」下輕輕地踏過了東北四省，「一二八」的停戰協定，使然增加了敵人侵略的氣焰，塘沽協定，何種協定完全肯定了日本吞併東北的基礎，冀東獨立與冀察政委會成立，更說明中國的領土主權已完全破碎淪喪了！最近在接受廣田三原則及蔣二十一條的欺騙下，又來召開中日會議，這正表現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把整個中國殖民地化，同時他顯示出我們政府的屈辱退縮。其他，如目前上總原奔走天津，公開宣佈增加華北駐軍，這些事實，都在告訴我們華北問題又展開了新的階段，也就說說華北國，不久要出現了！

應當這種空前的危機，現在國防第一線的平津學生，發動「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

英勇的示威鬥爭，不到一個星期，便掀起了全國各地抗日的怒潮，在這種次血的經驗與教訓裏，我們一致認為抗日救亡這偉大的任務，絕不是單獨的學生所能勝任，因此平津學聯會，發動徒步南下擴大宣傳團，使民眾知道，當前的中華民族危機的嚴重和救亡的緊迫。這樣才能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大眾，充分地覺悟到只有自動武裝起來，共同抗日，才是活路。果然，我們的偉大行動是勝利了；徒步七百馬，歷時三星期，博下民衆同情，散下了抗日的種子。

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救星，引起了愛國漢奸們的紅眼，他們用陰險的方法來破壞我們偉大的救亡運動，然而我們明白，救亡工作是繁雜的，我們也只有反漢奸，反日本帝國主義的前提下，作長期抗戰，才能爭取到中華民族的解放，所以我們的第一團和第二團在保定決定結束時，大家便議決了要永遠擴大這個組織，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經過全體南下宣傳團同學們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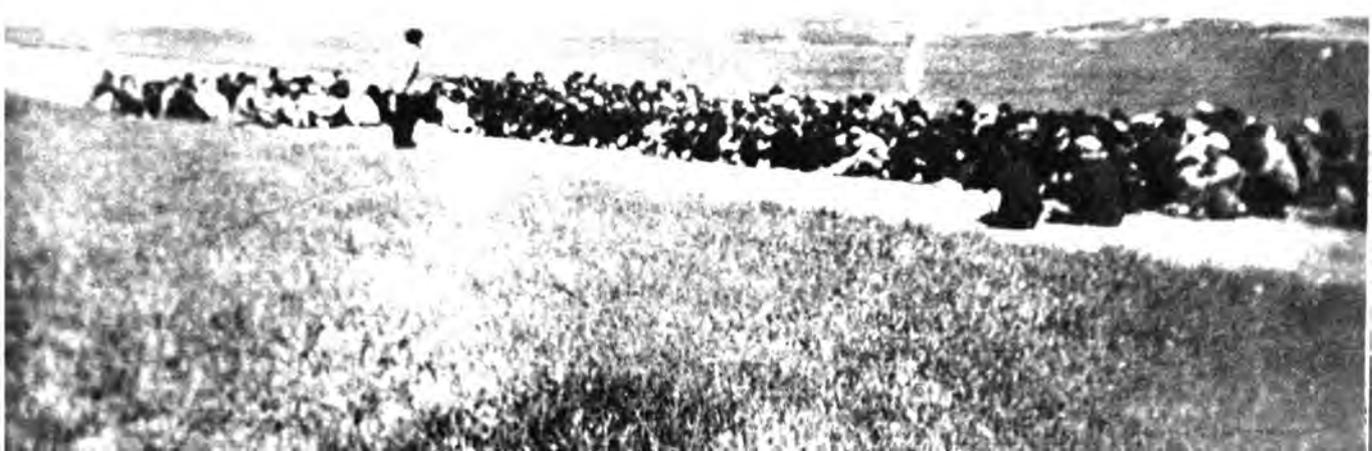
各地抗日的怒潮，在這種次血的經驗與教訓裏，我們一致認為抗日救亡這偉大的任務，絕不是單獨的學生所能勝任，因此平津學聯會，發動徒步南下擴大宣傳團，使民眾知道，當前的中華民族危機的嚴重和救亡的緊迫。這樣才能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大眾，充分地覺悟到只有自動武裝起來，共同抗日，才是活路。果然，我們的偉大行動是勝利了；徒步七百馬，歷時三星期，博下民衆同情，散下了抗日的種子。

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救星，引起了愛國漢奸們的紅眼，他們用陰險的方法來破壞我們偉大的救亡運動，然而我們明白，救亡工作是繁雜的，我們也只有反漢奸，反日本帝國主義的前提下，作長期抗戰，才能爭取到中華民族的解放，所以我們的第一團和第二團在保定決定結束時，大家便議決了要永遠擴大這個組織，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經過全體南下宣傳團同學們同

（一）組織漢奸及其走狗的陰謀，並打擊其種種陰謀的破壞手段；（二）聯合一切抗日反帝的力量不分黨派地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一致團結起來，以下便是我們具體的鬥爭綱領：

- （一）動員全國武力，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者出境；
- （二）成立各地民族武裝自衛組織；
- （三）成立各界抗日救國會；
- （四）討除漢奸賣國賊；
- （五）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華財產，及漢奸賣國賊的產業，充作抗日軍費；
- （六）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對待我之民族共同抗日；
- （七）聯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壓迫民族共同解放！

1936年12月25日，西安“民先隊”在東郊集合。



民先队员于晓山在西安民教馆教难民识字。



于晓山在教难民唱歌。



西安事变后，西安“民先”队员在凤翔。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赴西路宣传抗日救亡。西安的部分学生队员在武功“西北农学院”教学大楼前。白袖章为“民先队”标帜。



户县旅省学生返乡抗日宣传工作团，在县北真守村组织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冬，西安民先队冬令营在露天上课。



西安事变前后的抗日救亡期刊

从1927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人民革命力量，除了军事“围剿”之外，还实行了一条文化“围剿”的政策。

在西安事变之前的所谓“安内”时期，一切关于抗日救亡的革命的言论与出版，都是不自由的。那时候，国民党中央有“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各地的检查机关。还秘密颁发了《新闻检查条例》、《审查手册》之类的法规。专制独裁，钳制舆论，扼杀文化，不知查禁了多少书籍报刊？不知报纸上开了多少“天窗”？西安事变后，各种抗日救国刊物，如雨后春笋，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西安事变期间和抗战初期在西安发售的全国著名抗日救亡刊物之一。



延安出版的刊物——《解放》。



西安事变到抗战初期，西安出版的各种抗日救亡刊物。

“西救”、“东救”及其领导人

1935年“12.9”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之后，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首先是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形成高潮。1936年3月，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成立，以杨明轩等为领导。与此同时，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成立，以东北旅陕人士刘澜波、宋黎、高崇民、车向忱等为领导。“西救”、“东救”在西安事变前后发表抗日救亡言论，组织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发动群众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了很多群众工作。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杨明轩。

杨明轩(1891—1967)，字荃骏，陕西户县人。1936年5月，西北抗日救国会改组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杨明轩为领导人之一。1937年春赴欧考察教育并代表中国学生出席世界学联年会，同年，“7.7”抗日战争爆发，11月同杨虎城一行同船归国，在西安一直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东北民众救亡会负责人之一——高崇民。

高崇民(1890—1971)，辽宁省开源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9.18”事变后，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参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复东会”。反对不抵抗主义，主张联合抗日。1936年5月，同东北旅陕人士刘澜波、宋黎、车向忱等组成“东北民众救亡会”。

东北民众救亡会负责人之一——车向忱。

车向忱(1898—1971)，辽宁沈阳人，东北民众救亡会领导人之一。1936年春来西安，即着手筹建东北竞存小学和中学，先后任两校校长，使学校教育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同年9月，又参与组建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



西安学运骨干分子

1935年“12.9”运动之后，西安广大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影响之下，以反对内战与抗日救亡为中心的爱国运动，逐步发展起来。形成西安学生运动史上继“9.18”之后的新的高潮。在运动中，锻炼出了大批的骨干分子，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有的是“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会员，有的是其他各种爱国组织的成员。这里所反映的，是很不完全的一部分。



中共陕西西安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学源(1936)。



西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李连璧(1950)。



西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蒲望文(1938)。



西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刘日修(1936)。



前排左起：董学源、肖蓼、姜辅文、刘日修。
后排左起：王喜得、王宏谋、蒲望文、张茂栋、杜永诚。



全西安的学生，联合起来！
1936年11月15日成立的著名抗日救亡团体——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



西安东北大学大门(今西北大学北门)。该校在西安城外西南角，原为陕西省立第一职业学校旧址。



西安师范。该校在西安书院门街。原为明清关中书院旧址。



西安二中。该校在西安北大街(今为居民住宅区)。

原西安高中内仅存的“鲁迅纪念室”。西安高中在西安东厅门街。



西安女师内仅存的礼堂。该校在后宰门街(今为西安市89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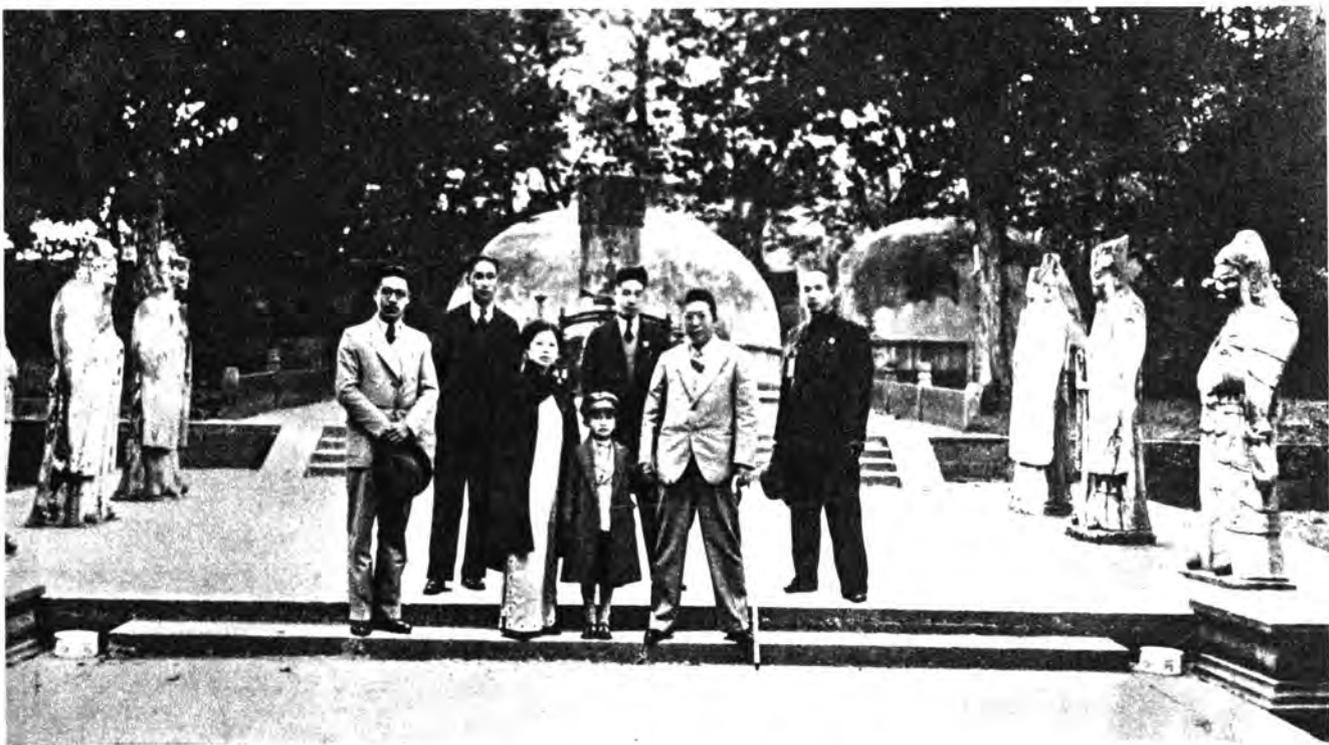
东北竞存中学。
该校在西安湘子庙街湘子庙内
(今为西安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第三管理站)。



杨虎城被迫离军出国

陕西、西安各界为杨虎城送行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表示宽容，要杨出国。1937年3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授意，要杨主动去见他，以便“恢复感情”。3月28日，杨飞杭州见蒋，在坐的有宋子文、宋美龄、邓宝珊、胡宗南、李志刚。蒋一面表示“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一面大骂张学良，让杨虎城听。第二天，蒋单独约杨再谈，要杨“出国考察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17路军总指挥职务。30日，蒋复电照准。5月27日，杨虎城离陕飞沪。在沪期间，“奉谕”去庐山见蒋，辞别。6月16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杨虎城为欧美军事考察专员。6月29日，杨虎城离沪出国。



杨虎城在杭州期间，游览岳坟。前排左起：于明江，谢葆真，杨拯中、杨虎城。后排左起：申明甫、周梵伯、李子健。





1937年4月23日，西安绥靖公署暨所属部队各级官佐在新城欢送杨虎城将军出国。前排左起：周楚伯、慕哲夫、耿景惠、王振华、李兴中、赵寿山、杨虎城、王一山、韩光琦、张韬安、王俊、孔从周、杨复震、樊雨衣。二排左起：窦荫三、王惟之、韩世本(寅生)、呼延立人。三排左起：傅剑目(2)、薛道五(3)、温良儒(天纬、5)、金陶生(9)、阎撰要(10)、胡润民(12)、韩子英(13)、李百朋(17)、贾文郁(19)、李墀(丹符、21)、孟庆鹏(22)。

1937年4月15日《西北文化日报》社全体同仁，欢送社长宋绮云东渡。

前排左起：宋绮云(4)、宋夫人徐林侠(5)。



1937年4月，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宴会西安各界绅耆。



1937年4月30日，杨虎城出国前，在新城欢宴西安各机关人士。前排左起：周楚伯(1)、慕哲夫(2)、李国桢(6)、呼延立人(7)、龚贤明(8)、党松龄(9)、杨虎城(12)、彭昭贤(13)、张自强(18)、薛兰生(22)、赵鹏九(23)、傅剑目(25)。二排左起：申明甫(1)、贾文郁(2)、韩光琦(3)、李百川(5)、三排左起：王子安(3)、孙仲猷(8)、白仲英(9)、李象九(14)、王宗山(20)、史仲鱼(21)、江隆基(22)。四排左起：李伯恂(1)、李子健(3)、蒋听松(4)、袁吉安(8)、张仲翔(9)、温良儒(16)。



▶ 1937年4月，西安绅商公送杨虎城出洋游历。前排左起：傅剑目(1)、韩光琦(2)、冉寅谷(3)、郭自兴(4)、匡厚生(5)、武念堂(10)、宋联奎(11)、杨虎城(12)、王怡然(13)、吴敬之(16)、罗端先(20)、张德枢(21)、李芝亭(22)、慕哲夫(23)。二排左起：李百川(1)、成柏仁(3)、景岩微(4)、张丹屏(5)、王子端(7)、仲兴裁(8)、康寄遥(13)、李元鼎(14)、景梅九(16)、李秋轩(17)、邓宝珊(18)。三排左起：申明甫(1)、寇遐(3)、张寒杉(4)、韩望尘(10)、曹俊夫(12)、张丹柏(15)、张永敷(16)、韩绶青(17)。

▶ 1937年5月19日，西京党政商学各界公饯杨虎城。一排右起：李仪祉(4)、周伯敏(5)、孙蔚如(6)、邓宝珊(7)、杨虎城(8)、顾祝同(9)、王怡然(10)、彭昭贤(11)、韩光琦(14)。二排左起：陆君谷(1)、汪晴江(2)、张德枢(3)、王普涵(8)、李维城(9)、冉寅谷(10)、罗雨亭(12)、杜斌丞(13)、张玉山(14)、石凤翔(16)。三排左起：党松年(1)、龚贤明(3)、吴云芳(砚青4)、韩望尘(9)、薛道五(10)、杨叔吉(11)。四排左起：维自修(2)、石雨琴(3)、段惠成(4)、沈反白(7)、张韬安(15)、顾希平(16)。五排左起：刘高达(3)、樊铭初(4)、袁吉安(6)、李芝亭(5)、韩仲鲁(11)、张亦农(12)、韩绶清(17)、郭仰汾(18)。六排左起：王尧青(1)、李丹符(6)、江隆基(8)、杨北海(9)、李寿亭(10)、刘文伯(11)、王宗山(12)、李百朋(13)、韩兆鸷(14)、李伯恂(16)。

1937年5月，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赠给杨虎城将军的锦旗。



楊將軍出國紀念
為民族解放
奮鬥到底！
西安學生救國聯合會贈旗





1937年4月27日，陕西地方一些知名人士，在西安南郊宋家花园宴送杨虎城出国考察。左起：杨虎城、王卓亭、冯光裕、王子端、武述善、宋联奎、吴敬之、韩望尘、寇遐、成柏仁、李元鼎。



1937年5月2日，西安新闻界欢送杨虎城出国考察。



1937年5月27日，杨虎城离陕赴沪，准备出国。清晨无数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界、东北军和17路军部队，各界爱国人士和市民，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西安西关机场。人们都想再看一下杨虎城。“欢送杨将军”、“抗日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送行群众高呼：“一路平安”、“珍重、再见！”杨将军不断挥手搭谢，高呼：“同胞们、朋友们，再见！”

1937年5月27日，杨虎城离陕出国，在西安机场与民众团体及各方人士，依依话别。老人为：陕西地方人士吴敬之



邓宝珊、杜斌丞、黄云兴在西安机场欢送杨虎城。



杨虎城(左)和邓宝珊在机场。





1937年5月27日，上午10时50分，杨虎城一行，乘欧亚航空公司客机由西安飞上海。周恩来和邓宝珊陪送



1937年5月27日，杨虎城离陕赴沪，数万群众在西安西关机场欢迎，杨向各界群众挥帽致意。



1937年5月27日下午4时，杨虎城由西安飞抵上海龙华机场，受到陕西旅沪各方面人士代表的热烈欢迎。

庐山辞蒋

1937年5月，杨虎城在沪期间，“奉谕”于5月29日，到庐山谒蒋辞别。



杨虎城和邓宝珊在庐山。



杨虎城庐山见蒋后，从南京飞返上海，在龙华机场。左起：杨虎城、杨拯中、谢葆真。



杨虎城在南京谒中山陵。

上海友人与陕西旅沪人士为杨虎城送行



1937年5月，杨虎城出国前在上海会见友人。

左起：杨虎城(4)、邓宝珊(5)、马文彦(6)。

1937年6月26日，陕西旅沪学会欢送杨虎城出国考察。



1937年6月13日，陕西旅沪学生同乡会，旅沪校友会欢送杨虎城出国。



于右任、邓宝珊送杨虎城出国考察。
前排左起：杨虎城、刘守中、杨拯中(杨的孩子)、于右任。

后排左起：杨虎城、谢葆真(杨夫人)、
邓惠霖(邓宝珊之女)、邓宝珊。



1937年6月28日，陕西旅沪同乡暨西北各界代表公饯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军事。前排坐着左起：窦荫三(3)、王子元(6)、庞志杰(7)、傅剑涛(8)、李百朋(11)。二排左起：(坐凳者)张永敷(1)、赵寿山(4)、杨拯民(5)、樊雨农(6)、李虎臣(7)、于右任夫人(8)、杨拯中(9)、谢葆真(10)、宋联奎(11)、杨虎城(12)、邓宝珊(13)、邓惠霖(14)、张慕陶(15)、王安娜(19)、李蕴清(22)。三排左起：(坐凳者)郑伯奇(15)、李仲三(18)、谢幼石(21)、王文彬(22)。四排左起：(站立者)王树滋(5)、杜斌丞(杨虎城身后站立者)、韩望尘(杜右2)、王捷三(杜右3)。



杨虎城离沪出国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将军乘美“胡佛总统”号邮船离沪出国。随员，除杨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外，有樊雨农(参谋)、王麟阁(译员)、亢心哉(秘书)，共六人。

杨出国后，先后在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捷克、奥地利、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参观、访问。

出国途中，7月1、2日，在日本的神户和横滨港停泊。7月8日，舟行太平洋上，获悉芦沟桥事变发生，杨虎城寝食不安，当即致电宋子文：“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7月15日，抵旧金山，当地中国领事馆，转来宋子文复电：“稍缓返国为宜。”7月16日，杨再电南京，请求“准予停止军事考察，返国杀敌”。7月22日，宋子文复电：“暂留美国或先赴欧”。7月23日，蒋介石复电：“继续考察”。

杨虎城在欧旅行考察已五个月，虽然观光不少，考察所得不少。但最关心的还是国内的抗战。1937年10月21日，由西班牙到巴黎。即决心“自行归国”。朋友们，随员们，都劝他在海外多留些时间，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就是为了抗日。现在抗战已起，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颜对待国人。至于回国之后，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不后悔。只要对得起国人，死不足惜。”

10月29日，杨虎城乘法轮“哲利波号”，离开马赛东驶回国。11月26日，杨虎城一行抵香港，上岸后，即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旋被骗至南昌囚禁。先后辗转被囚在长沙、益阳、贵州息烽、四川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达12年之久。1947年2月，杨夫人谢葆真在狱中被折磨而死。

1949年9月6日，重庆解放前夕，杨虎城被特务用匕首杀害于中美合作所松林坡。次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副官阎继明、张醒民，西安《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夫人徐林侠及两个幼子，同时被害。



1937年6月28日，杨虎城出国前夕，在上海国际饭店。

杨虎城同谢葆真在胡佛总统号轮船上
左起：谢葆真(3)、杨虎城(4)



杨虎城在国外



在檀香山码头。1937年7月9日上午10时许，杨虎城一行到达夏威夷群岛首府檀香山，下船时当地中国领事馆梅景周总领事、黄荫余领事和当地华侨前来欢迎，并给杨及其一行，戴上花环。欢迎者高呼：“欢迎杨将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位老年侨胞走近杨，激动地说：“杨将军，你走的路对啊！”当日下午，梅、黄两领事陪同，参观了宝石岭，大学、驻军区域。左起：杨虎城、杨拯中、谢葆真、王麟阁。

在奥克兰市市长罗夫陪同下参观奥克兰飞机场，受到该场场长罗斯基的欢迎和接待。左二起：罗斯基、王麟阁、罗夫、谢葆真、杨拯中、杨虎城。1937年7月14日下午3时，杨虎城一行抵达美国西岸的旧金山港，当地中国领事馆黄朝琴总领事、邝兆荣领事前来迎接。住奥克兰市的塔湖旅馆。杨在旧金山期间，曾多次接待当地几家报刊记者的访问；中美各方面人物的来访和欢宴、座谈、讲演。7月23日，在旧金山广播电台，发表了演说。

先后参观的有：旧金山军营和飞机场、旧金山要塞、炮兵部队、军医院、珍珠港海军基地及加利福尼亚大学、金门长桥、旧金山农村、华侨家庭等。





赴华盛顿之前，在旧金山奥克兰机场。

1937年7月28日，杨虎城结束旧金山的考察，在奥克兰机场乘机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之前，黄朝琴总领事和邝兆荣领事及华侨代表等到机场欢送。

杨虎城在华盛顿仅待一天，30日乘火车到达纽约，在纽约6天。杨在美国20天当中，美国各地的报刊对他的来到多有报道，华侨出版的报纸，刊载的消息和文章尤多，一致同意他的抗日主张。

前排右起：杨虎城、杨拯中、谢葆真、总领事黄朝琴夫人、齐仲瀚、亢心哉、黄朋琴。后排左二起：王麟阁。

1937年8月20日，在法国比央古参战华工招待会上演说。

杨虎城在巴黎，每到侨胞住区，都被邀请讲话。有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工说：“9.18”事变，南京政府不抵抗，日本占了东北，法国有些人瞧不起中国人，讥笑我们，我们见外国人抬不起头来”。又说：“杨将军回国后，一定要规劝各方别再打内战，枪口对外，打日本。”杨很感动，对同行者说：“不到海外，不知国弱的耻辱”，“不知侨胞的辛酸”，“不知侨胞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祖国的强大”。





1937年8月10日，英国《每日先驱报》报道杨虎城到英国伦敦的消息及照片。

1937年8月4日，下午3时，杨虎城登法轮“诺曼第号”由美国纽约赴英国伦敦。8月9日，法轮驶进英国萨木敦港。米哲沅、周梵伯(在英学习)两人到港迎接，在伦敦住“公园巷饭店”。10日，游览市区、大英博物馆、动物园和蜡人馆，并访晤了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11日上午10时乘火车离伦敦，在英国只待了一天。



1937年8月12日，法国《救国时报》报道杨虎城抵巴黎的消息及照片。

1937年8月11日下午5时，杨虎城到达巴黎北站。闻讯前往迎接的有：全欧抗日救国联合会、巴黎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会、旅法华工总会、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巴黎中国出版社、巴黎中国国联同志会、亚西华工同盟会、浙江旅法侨协商会、旅欧中国妇女救国会和国民党支部等团体的代表及驻法大使馆郭则范参赞等一百多人，并有妇女趋前献花。



杨虎城同比央古华
侨子女在一起。后排：
左立者为杨虎城。

1937年9月28日，巴黎《救国时报》报道。
 杨虎城在巴黎出席法国人民第一次和平大会并讲了话。

法國人民 第一次和平大會

在巴黎互助館舉行

楊虎城將軍代表我國出席

（本市通訊）第一次法國人民和平代表大會於九月廿五日至廿七日在巴黎舉行。法國參戰軍人協會，總工會，合作社聯合會，農民協會，人權自由和平大同盟，國聯之友社，教會保護和平協會，各婦女團體，激進黨，社會黨，共產黨，社會主義聯盟，少年共和社及世界和平大會的四十三個國家會員（分會），四十個國際團體會員，皆派有代表出席，代表世界和平大會我國分會者為楊虎城將軍，出席代表共達二千人。各國趕來參加者頗多世界知名的重要人物，可謂極一時之盛。

在捷克坦克制造厂。

1937年9月12日下午，杨虎城在捷克参观了坦克制造厂并看了轻三吨半，重七吨半的坦克表演。前排右起：杨虎城(1)。



杨虎城和旅德抗日联合会会员在一起。

前坐右二起：杨虎城、冯希勃、杨拯中。

二排站右起：杨汉兴、连瑞琦、秦丰川、金励兹、李作鹏、陈柱天、陈铁生。

后排站右起：刘文华(3)。

1937年8月28日，杨虎城由法赴德。在德十天时间，主要是同一些中国留学生接触。8月29日至31日一连三个晚上，举行了三次旅德抗日联合会会员座谈会。



杨虎城同西班牙人民战线将领在一起。

在西班牙新都——瓦伦西亚。

前排右起：杨虎城(4)、米亚哈司令(5)。

1937年10月14日，杨虎城飞抵西班牙新都，受到政府军领导人和国际纵队司令官的热烈欢迎。政府军对中国人民抗日非常关心。杨亲到政府军前线，并在战壕里向叛军方面开了几枪。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继续谈判

西安谈判 杭州谈判 庐山谈判



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在西安南郊。
左起：叶剑英、周恩来、张冲。

西安事变期间开始的国共谈判，于事变后在继续着。1937年2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同蒋介石、顾祝同等就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

2月中旬，周恩来、叶剑英等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先进行了初步谈判。谈判中，中共方面首先提出了《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的意见，并在此意见的基础上，达成了在西安设立中共办事处的协议。

在西安谈判中，周恩来还提出要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回陕的问题。

中共中央谈判代表在西安红军联络处(1937)。

左起：秦邦宪、叶剑英。



1937年春，中共中央谈判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红军西安联络处工作人员在一起。

三排左起：周恩来(1)、孔石泉(4)、叶剑英(5)。二排左起：张云逸(4)。



周恩来在西安红军联络处的住室。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谈判代表及工作人员在西安南郊大雁塔。

左起：叶剑英、任伯生、童小鹏、吴志坚和张文彬(后排站立者)。





1937年4月2日，周恩来飞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在杭州同蒋介石谈判情况。在机场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欢迎。

右起：肖劲光、林伯渠、彭德怀、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

1937年4月，劳山遇险后，抵达西安的周恩来。
左起：张云逸、周恩来、孔石泉。



中共中央代表在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后回到西安。

左起：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



1937年5—6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蒋介石在庐山谈判。前边是蒋介石，后第四人为周恩来。

西安事变后，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中共中央谈判代表周恩来往返于延安、西安之间，1937年4月，周恩来、张云逸等离开延安，准备经西安到杭州同国民党继续谈判，途经甘泉县北之劳山，遭遇国民党政治土匪袭击，周的副官陈有才等17人不幸牺牲。



陈有才(1937)。



1937年3月，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在杭州。

左起：周恩来、张冲。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到陕甘红军驻地考察

1937年5月，在国共谈判期间，国民党派出以涂思宗为团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到延安和陕西关中、甘肃东部等地的红军驻地考察，受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指战员的欢迎。中共中央派叶剑英、陈赓陪同考察。此次考察增进了国共双方的相互了解，对国共合作起了促进作用。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西安。
前排右二起：张冲(国民党谈判代表)、涂思宗(考察团团长)、肖致平、邵华(考察团成员)。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成员名单。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到达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线指挥部，受到红军将领欢迎。

前排右起：涂思宗、彭德怀。后排左起：叶剑英(1)、肖致平(3)、任弼时(5)。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到达红军第二方面军驻地。

后排右起：周士第(1)、贺龙(5)、涂思宗(6)、朱瑞(8)、肖致平(9)、叶剑英(10)。



红军部队在陕西富平驻地举行军民大会，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城内，受到中共中央代表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

前左一为林伯渠、左三为秦邦宪。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延安。

左起：叶剑英、邵华(考察团成员)、朱德、涂思宗(考察团团长)、毛泽东、肖致平(考察团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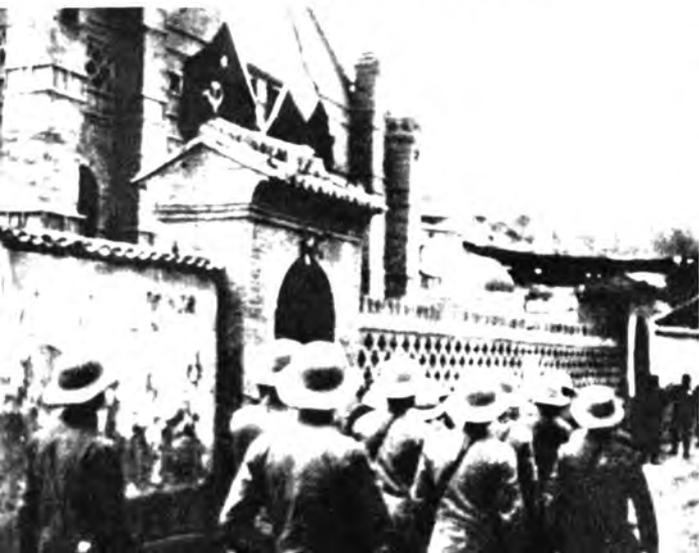
▲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延安。
前排右起：叶剑英(1)、涂思宗(4)、
肖致平(5)、朱德(6)、林伯渠(7)。



◀ 延安城头的标语：“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

▼ 红军第15军团部队俱乐部门口的对联：“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门前。



南京谈判

1937年8月间，国共两党在南京继续谈判。8月21日正式达成两党合作协议。



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在南京。

左起：张群、叶剑英、郭秀仪（黄琪翔夫人）、黄琪翔、周恩来、朱德。



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在南京住处门口。

左起：周恩来、叶剑英、张冲、邵华、朱德。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实行合作。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西安事变所提出的“联共抗日”主张终于实现。

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蒋 介 石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因为阻碍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益趋危殆。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意见，而共趋于一致。足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上之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吾人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因为阻碍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益趋危殆。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意见，而共趋于一致。足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上之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吾人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因为阻碍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益趋危殆。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意见，而共趋于一致。足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上之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吾人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因为阻碍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益趋危殆。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意见，而共趋于一致。足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上之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吾人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因为阻碍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益趋危殆。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意见，而共趋于一致。足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上之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宋庆龄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关于国共合作的
声明。

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于上海)

宋庆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确定了正式合作的方针，以代替西安事变前所获得的停战协定。这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人和劳动群众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群众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民族革命的使命，所以他所主张的国共合作一直不间断地继续到现在，中国目前已是一个自由、独立、统一的国家了。国难当头，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共赴国难。

国共统一运动
感言。

這幾天讀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宣言和中國國民黨領袖委員會長蔣中正的談話，使我異常興奮。異常地感動。回想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兄弟黨，在最近十年以來，互相對立，互相殺戮，這是自創國共合作的先總理孫中山先生生前所不及意想到的。到最後，這兩個兄弟黨居然歸於好從新攜手，為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而鬥爭。中共宣言和蔣委員長談話都都重指出兩黨精誠團結的必要。我聽到這消息，感動得幾乎要下淚。

孫中山先生生前主張着：只有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喚醒民衆，組織民衆，實現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才能救中國於危亡。但是要实现三民主義，只有對外聯合以平等對待我的民族，對內聯合革命的政黨，共同奮鬥，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孫中山先生這倒主張，一直到臨終的時候並沒有絲毫改變。孫中山先生主張國共合作，因為共產黨是代表工農大眾利益的黨，沒有廣大的工農大眾的擁護和積極參加，中國國民黨所担任的國民革命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孫中山先生雖然於一九二五年離開我們長逝了，但是他遺留給我們的中國國民黨，依然和中國共產黨合作，根據孫中山先生手定的三民主義政綱，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因此便有一九二六——二七年北伐的大勝利。假如孫中山先生國共合作的主張，以及聯俄，聯共，工農利益三大政策能够繼續引伸，則中國內封建勢力早已剷除淨盡，帝國主義也早被驅逐出去，而中國已成為獨立自由的中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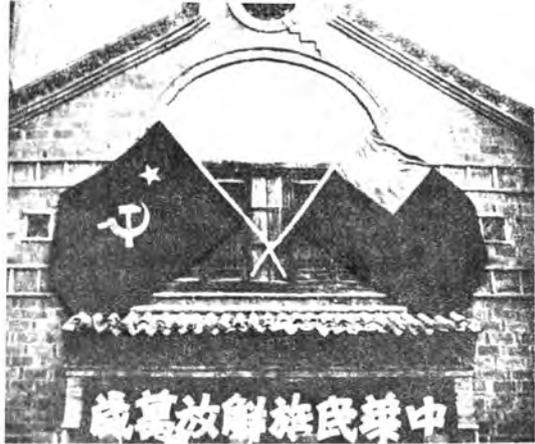
但是不幸得過十年以來，國民黨分裂，國民黨放棄三民主義，共產黨提出所謂國民政府的口號，以兩黨互相殺戮，互相殺戮，互相殺戮的方針，相持數年，其精力，以從事內爭，致令國民黨民衆的真正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毛頭而人，誠然如蔣委員長所稱：十年以來，一般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於民族危機亦無深刻的認識，致使革命建國的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礙，因力困之消耗，人民亦因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這不是一二人的責任，也不是任何黨派的責任，凡我國共兩黨同志，都應內心自責，懷對我先總理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這民族危機千鈞一髮的今天，一切過去的思想，往日的牙眼，自然都應該一筆勾銷，大家都一心一意，為爭取抗日抗戰的最後勝利而共同努力。但共過去因共分多這一段悲慘歷史，却仍然值得我們的記取。國民黨同志應該認識：若不要不顧先總理遺教，拋棄了工農大眾利益，將成為民族罪人，等於國民黨的自殺。共產黨同志也應該記住：只有在孫總理遺教領導之下，和中國國民黨精誠合作，把全民族打成一片，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使命。我相信兩黨同志，經過十年以來長期的慘痛教訓，再加上目前這無情的殘酷的進攻，一定能够本「兄弟閣外體其危」的古訓，誠信地友愛地團結成一體。惟有這樣，才能使中華民族走上獨立解放的勝利途徑。孫中山先生死而有知，也應該含笑九原了。

國共統一運動感言

宋慶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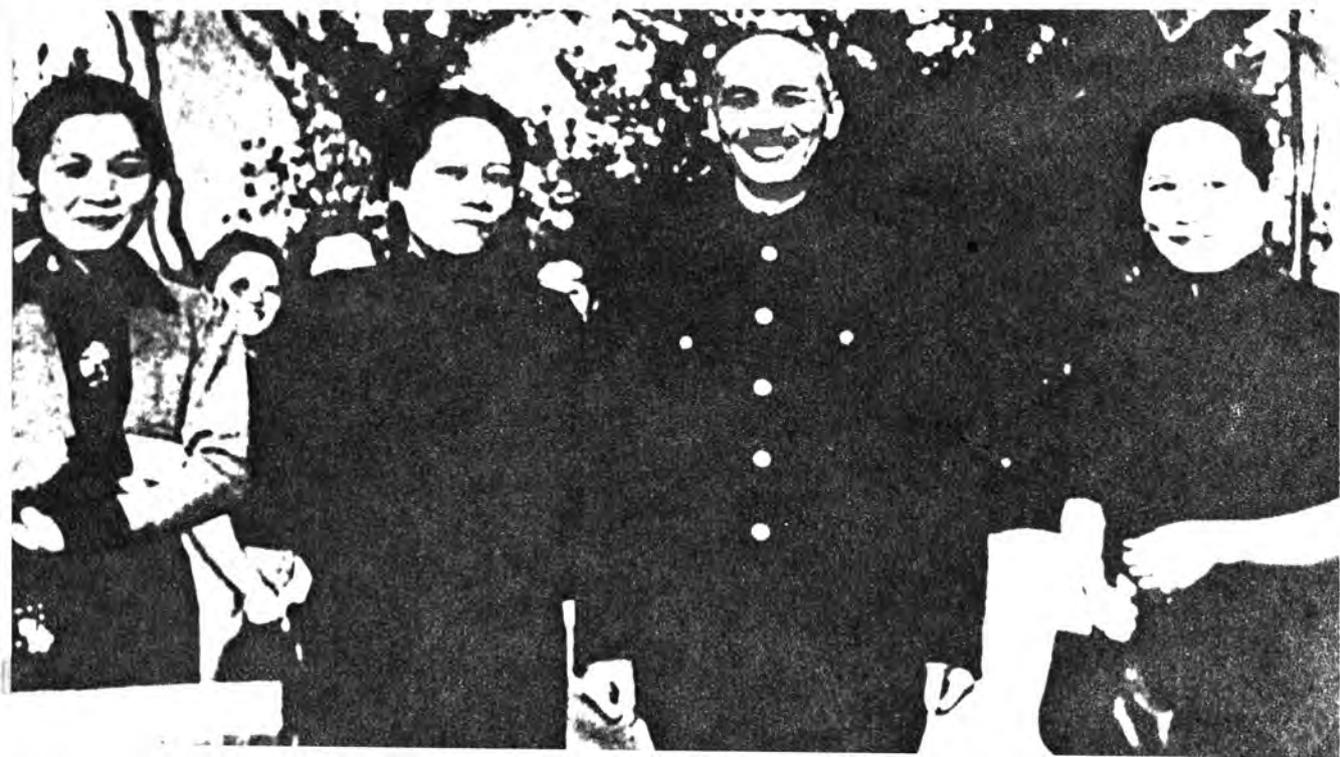


国共两党合作后，延安大礼堂的旗帜和标语。



国共两党合作后的宋氏三姐妹。
右起：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

蒋介石与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在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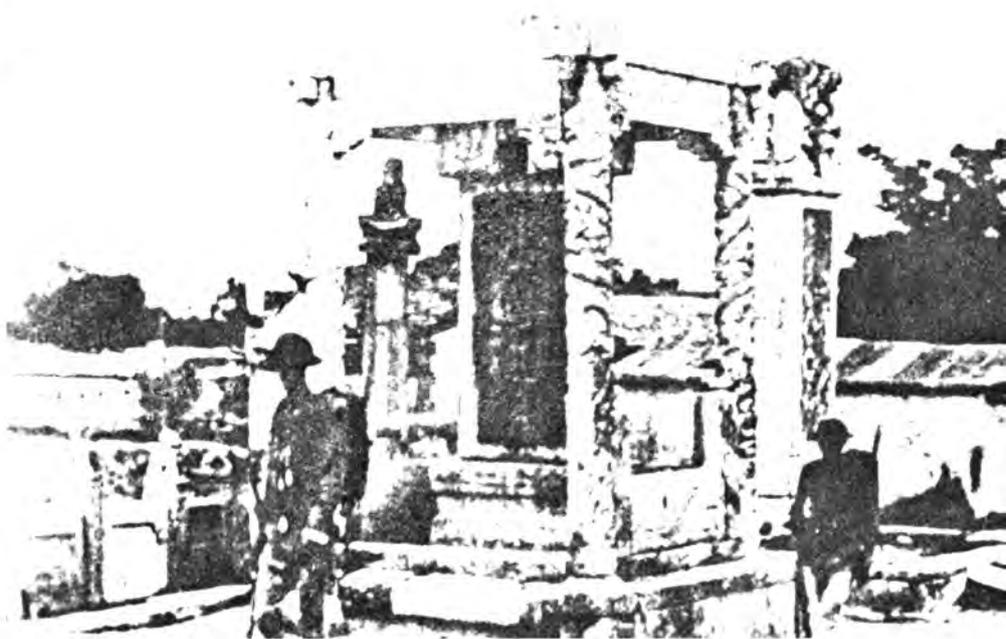


抗日战争开始

芦沟桥事变

继“9.18”事变与华北事变之后，1936年6月，日本侵略军又在北平芦沟桥附近连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7月7日，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驻军宛平城等地搜查，遭到中国军队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驻军29军吉星文团长率部奋起抵抗。从此，爆发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史称“芦沟桥事变”或“7.7”事变。

芦沟桥。座落在北平西南宛平县城南。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从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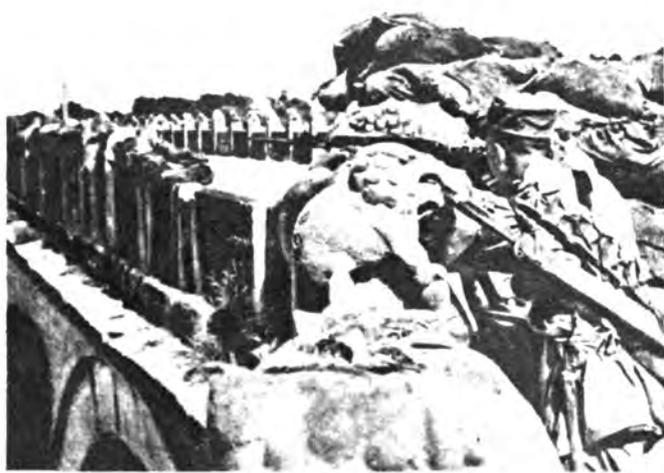
中国驻宛平县的29军同仇敌忾，紧急奔赴战场，抗击日军。

29军原是冯玉祥将军所领导的原西北军的一部分，该军具有强烈的抗日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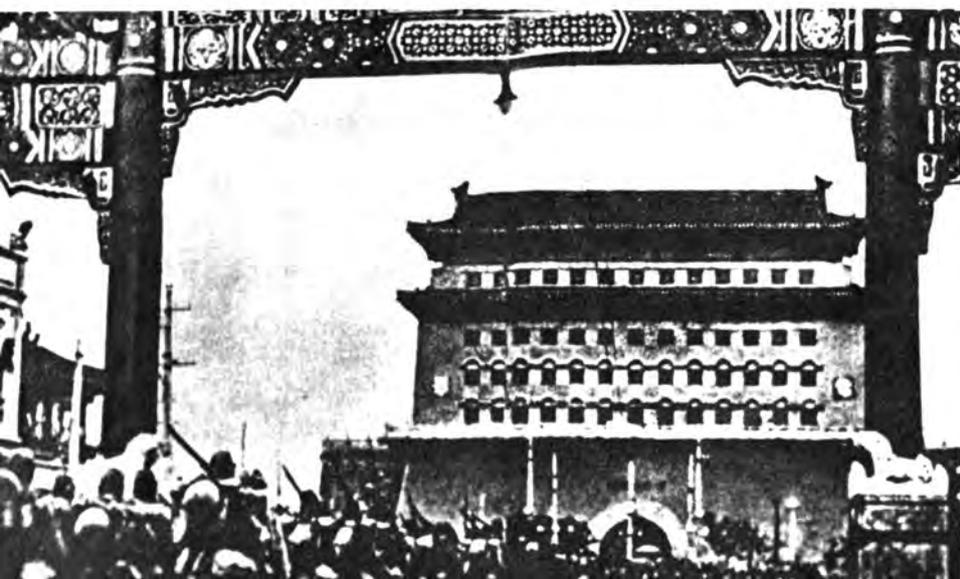
警惕地守卫着芦沟桥的29军士兵，右上角为吉星文团长。



宋哲元29军所部37师吉星文团的士兵在芦沟桥上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



日军占领下的芦沟桥。



北平前门大街之日军。

1937年7月29日，日军侵占我国古都北平。北平是抗日战争时期最早被日侵占的我国大城市。



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
1937年7月下旬，为抗击日军进攻
在北平郊区南苑激战中英勇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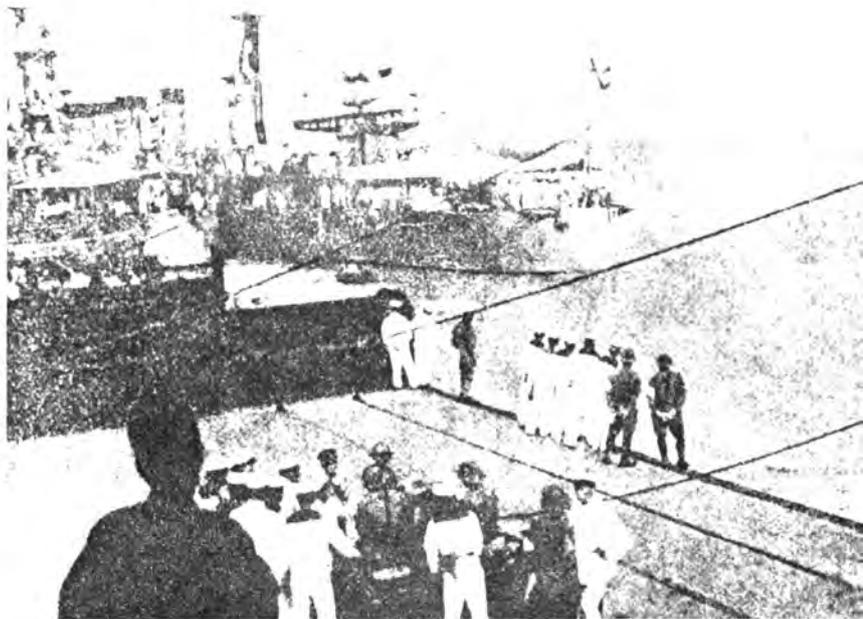
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
1937年7月底，为抗击日军进攻
在北平郊区南苑激战中英勇牺牲。

1937年7月30日，日军侵占天津。在天津街道横行的日本骑兵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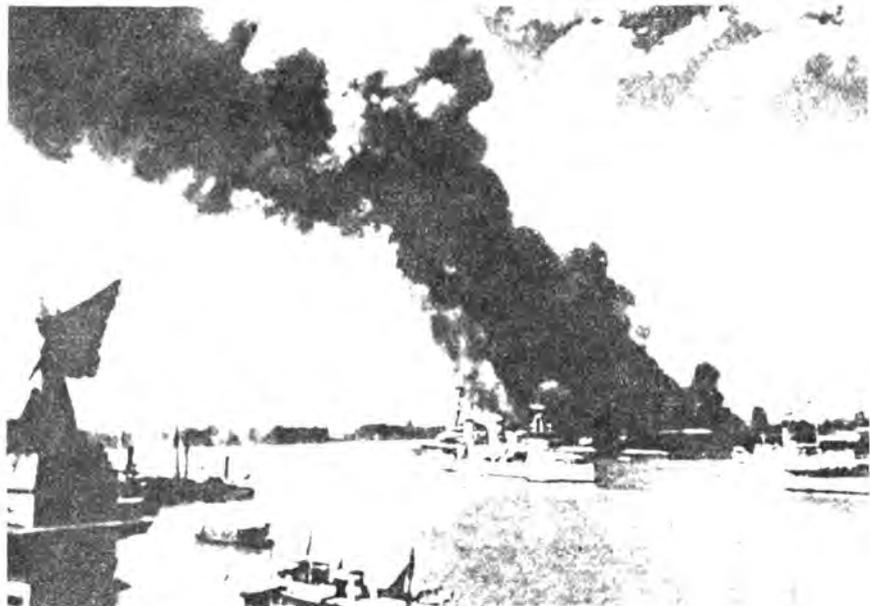


上海“8.13”事件

1937年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13日，日本又大举进犯上海。史称“8.13”事件。



“8.13”事件前，日本军舰纷纷抵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杨树浦附近登陆。



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空军飞机在黄浦江轰炸一艘日本军舰。



日军侵占上海闸北后，纵火焚烧民房。



1937年11月12日，上海
沦陷，日军进入市区。



“8.13”事件中被日军破坏之
新建的上海市市政府大厦。

蒋介石发表抗战谈话

芦沟桥事件发生10日之后，国民党由软弱的“自卫”、“应战”声明而逐步走向抗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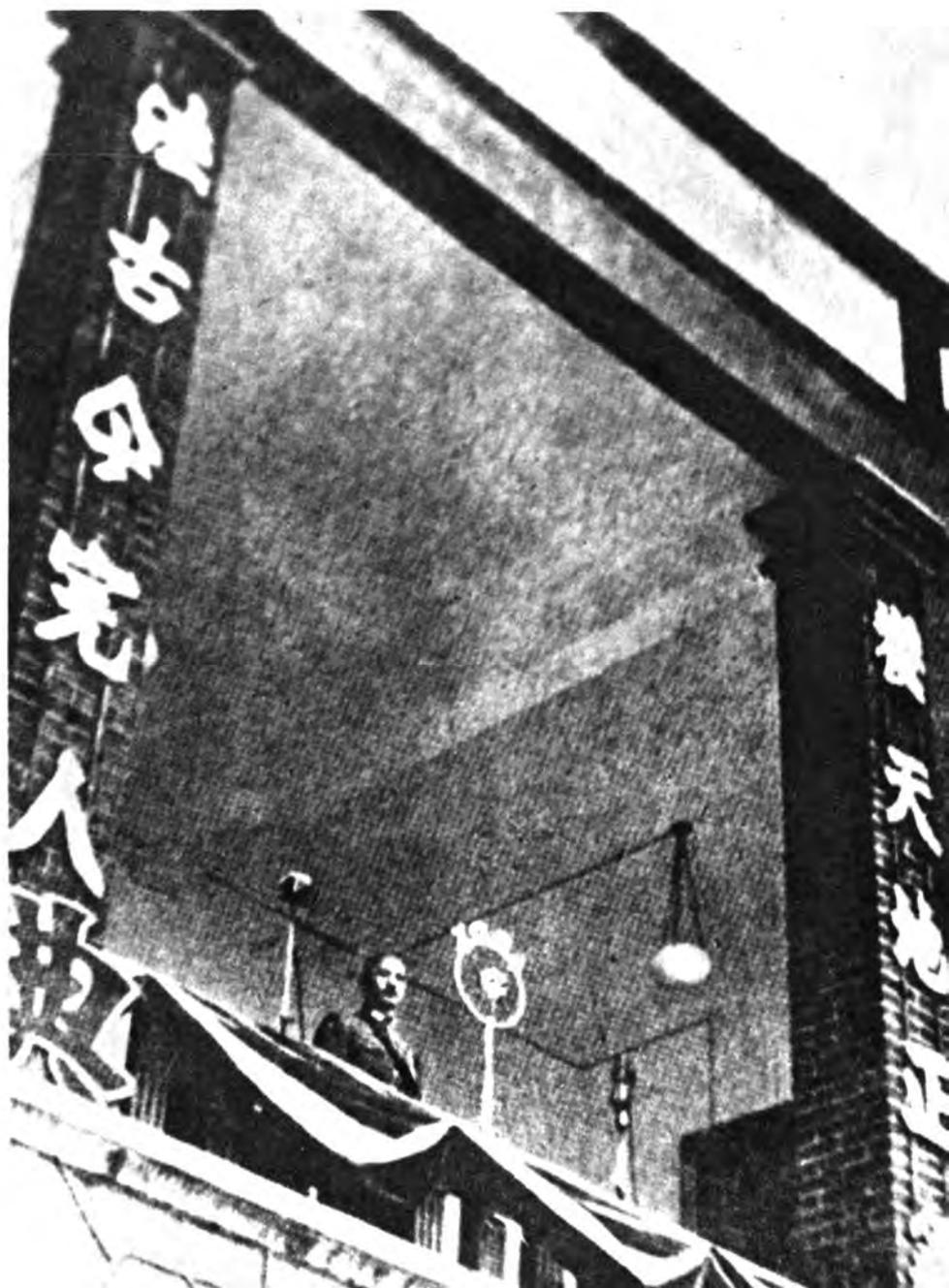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说：“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说：“临到最后关头，惟有坚决牺牲，吾人只准备应战，而并非求战。”

7月30日，国民政府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说“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上述谈话、声明，特别是蒋介石7月17日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这是中国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同胞的热烈欢迎与支持。



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之蒋介石。

中共中央举行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沟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凯丰、博古、关向应、张浩、聂荣臻、罗瑞卿、肖劲光、林伯渠、徐向前等22人。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决定：在敌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洛川会议地址。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

(一) 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是，在政治上却陷入了孤立。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的胜利，是建立在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的基础上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孤立，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二)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必须承担起领导民族解放战争的重任。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三) 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中共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爲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二、實行抗戰建國，實行民族自決。

三、全國人民總動員。

四、改革政治機構。

五、改善人民生活。

六、加強抗戰後援會。

七、改良人民教育。

八、抗日救國政府。

九、國共兩黨團結合作。

十、國共兩黨團結合作。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发表就抗日战争问题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谈话》
的首页。

共产党與抗日戰爭

貝問：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後，有些什麼具體的表示？

毛答：在這次戰爭爆發以前，中國共產黨曾經再三向全國警告過，對日戰爭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和平解決」的言論，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辭句，都不過是掩蓋其戰爭準備的煙幕彈。我們曾經反覆指出，必須加強統一戰線，實行革命政策，才能執行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必須實現民主權利，以動員全體民族加入抗日戰線。對於相信日本的「和平解決」以為戰爭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動員民族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們，我們曾經反覆指出了他們的錯誤。戰爭的爆發及其經過，表明我們這些意見的正確。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共產黨即向全國發出宣言，號召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強民族統一戰線。不久我們又發表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政府所應採取的政策。國共合作成立之時，又發表了一個重要的宣言。這些都證明我們對於加強統一戰線實行革命政策來進行戰爭的這種方針，是堅持不渝的。在這個時期中，我們抗日號集中在一點上，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戰爭」。

抗日戰爭的情況與教訓

貝問：戰爭的經過，戰爭到現在已經產生了一些什麼結果？

毛答：主要方面有三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攻城、略地、奸淫、搶劫、焚燒、與屠殺，把亡國危險最後加到中國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國大多數人從此得到了深刻的教訓，知道進一步團結與實現全民抗戰不能後發而後，同時也開始覺悟了世界各國和平國家，這樣日本侵略是必然的。這些就是已經產生的結果。

貝問：日本的目的何在？這些目的已經實現了多少？

毛答：日本的目的，第一是佔領華北與上海，第二步是向蘇聯進攻，這就是他的目的。說到日寇實現其計劃的行動，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政府對日寇的抗戰，其目的在於削弱日寇的實力，削弱日寇的經濟，削弱日寇的軍事力量，削弱日寇的行政系統，削弱日寇的抵抗，才能打擊其侵略。

貝問：據你的意見，中國的抗戰也有他的成績沒有？如果說到教訓，則教訓在何處？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挺进华北前线抗日

1937年8月25日，中国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9月12日，第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副总)指挥改为总(副总)司令。下辖三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治部主任关向应)；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张浩)。

1937年8月25日至9月间，八路军总部率领各师从陕北、渭北等地出发，经韩城、潼关等处，东渡黄河，在日本侵略军疯狂进攻下，挺进华北前线抗日。

中華革命軍委員會命令

一九三七
八月廿五號

南京已經開始對日抗戰，我國共兩黨合作抗戰成功，是使紅軍成為抗日民族戰爭的領導力量。這一抗戰成功，全賴民族抗日革命戰爭，以爭取最後的勝利。民族抗戰成功，是民族生存及南京政治前途的保證。紅軍改組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是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力量。前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第一軍團十五軍團及七十四師，由原陸軍第一一五師改編，師長林彪，副師長羅榮桓，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第二方面軍二十七軍團二十八軍團，由原陸軍第一二〇師及赤水警備司令部第一師第一二〇師改編，師長賀龍，副師長肖克，政治部主任關向應。第三方面軍二十九軍團，由原陸軍第一二九師改編，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治部主任張浩。以上各師改編人員，由總指揮部令行各師，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令行各師，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令行各師。紅軍在抗戰中，應以民族革命戰爭為中心，與全國同胞合作，共同爭取民族革命戰爭之偉大勝利。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席 毛澤東
副主席 朱德
周恩來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给朱、彭的委任状。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将军。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将军。

1937年9月7日，驻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的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之前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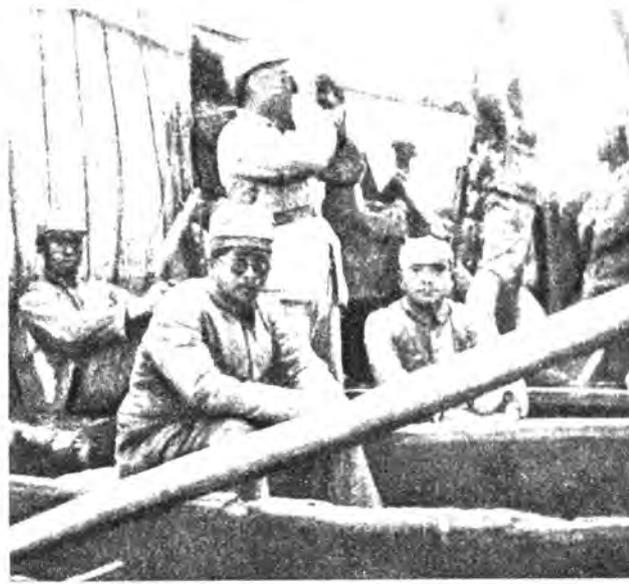




整编之后，准备东渡黄河的八路军。



由陕西东渡黄河的八路军。



在黄河渡船上。右起：邓小平、朱德、任弼时、左权。

1937年8月至9月初，驻在渭北一带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后，挺进华北抗日最前线。



国共两党军队团结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结束了十年内战，变对内用兵为对外用兵，国共两党的军队，包括由东北军改编的和由17路军改编的部队，于抗战爆发后，都调往各个抗日战场为国杀敌，对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兄弟
第一般的团结起来
为抗日救国而斗争
争达到民族独立民
主自由民生幸福之
目的这是我们的第一
二之任务
毛泽东

毛泽东题词
(1937)。



在晋北抗日前线(1937年9月)。右起：周恩来、何柱国（东北军骑兵军长）、彭德怀（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八路军的骑兵同东北军的骑兵联合抗日。





在华北敌后战场上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亲临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的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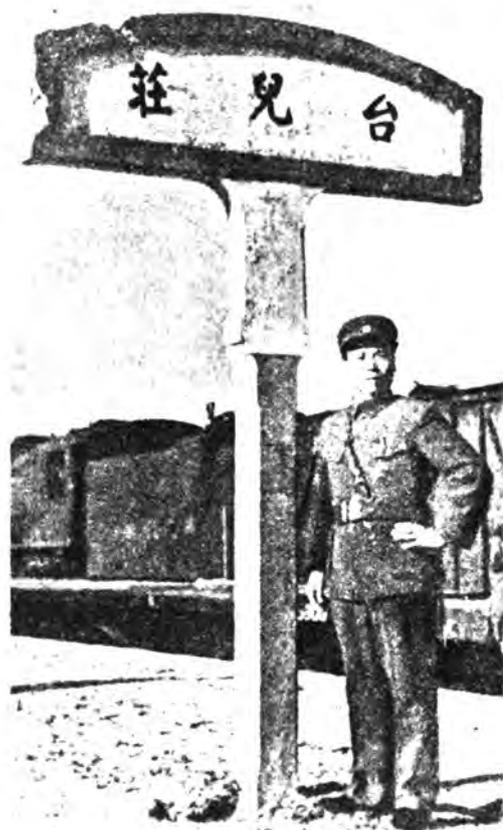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出发去前线。



在晋北前线视察阵地之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前)、副参谋长左权(中)、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后)。

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战斗中的指挥所。





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在收复后的台儿庄车站。



参加徐州会战的国民党指挥官关麟征(左)。

台儿庄会战之战场。1938年3、4月间，国民党军李宗仁部在山东南部台儿庄与日军第10师团进行了长达10天的阵地消耗战。由于李部的奋战和八路军、民兵在敌后的牵制，日军死伤两万余人。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在四行仓库奋战的八百壮士。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国民党军奋起抗战，坚守三个月，涌现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

像亲人一样同仇敌忾



为配合忻口战役，在夜袭阳明堡机场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3营营长赵宗德。

增援山西忻口抗日前线国民党军。

1937年9月下旬，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率部经涞源、灵丘犯晋。于9月25日在平型关为八路军腰击，损失惨重。后又沿同蒲线南侵，企图进占太原。国共两党军队为达成逐渐消耗敌人之目的，决定在忻口歼敌。忻口战役自10月13日日军攻击开始到10月28日国民党军后撤为止。敌人死伤惨重，滕田旅团长被我击毙。这次战役，国共两党军队互相配合是取得对日军作战胜利的根本。





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右起：朱德、刘伯承、邓小平。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前线。

纪念西安事变

周恩来同志

在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十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诸位先生，诸位同志，

双十二事变过了整整十年了。中国从内战转入抗战，现在又不幸的回到内战。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段历史教训。

不管现在又回到内战，中国总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阶段，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抗日的人民军队强大起来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在那里，人民实行民主，农民获得土地，而全中国人民在这种数午之下，亦认识了一个强大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这就是双十二事变的历史收获。

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九一八事变以后，人民已日渐不满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北上抗日与号召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呼声，更因之日益广泛，并影响到当时的“剿共”军队，首先影响到在内战前线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救亡运

周恩来讲话之首页。

周恩来同志

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

(摘要)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了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东北、西北两方面参加过西安事变的约有百人参加。

周总理在讲话中，首先谈到召开纪念座谈会的意义。周总理说：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但是纪念也要适合当时的形势。十年前，西安事变十周年，那时正是蒋介石撕破和谈决议，大打内战的时候，我们在延安曾大张旗鼓地纪念过，那时开了大会，报纸上还发表了些纪念文章。今年是二十周年，也值得大做，但今年正是提出争取台湾和平解放的时候，所以今年只是小规模地请大家座谈一下，不开大会。

针对过去有人说西安事变张杨的用意是好的行动是不妥的，假如那时一枪把蒋介石打死了岂不是天下大乱，给日本人造机会，更促使中国灭亡吗？周总理说：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即使当时一枪打蒋介石，也是千古功臣，那样不过再打一场内战，东北

延安各界代表千餘人 舉行「雙十二」紀念會

周恩來同志作嚴正講演

大會通過：要求國方釋放張楊二將軍
及一切政治犯，懲辦日戰犯岡村，反對
國美商約并堅決為保衛邊疆而奮鬥。

▲十二月十二日，延安市各界代表千餘人，在延安各界紀念會場，舉行「雙十二」十周年紀念大會。大會由各界代表推選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同志主持。會中，周恩來同志作嚴正講演，大會通過了關於「雙十二」十周年紀念大會的決議案。決議案要求國方釋放張楊二將軍及一切政治犯，懲辦日戰犯岡村，反對國美商約，並堅決為保衛邊疆而奮鬥。大會並推選了執行委員會，由周恩來同志任主席。大會最後，大會全體代表在會場前合影。

西安事变10周年纪念。

1946年12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的报道。

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周恩来讲话之首页。

195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座谈会。周恩来到会讲了话。



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

1961年12月12日，北京举行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周恩来出席招待会并讲了话。

西安事变46周年纪念。

1982年12月12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西安事变46周年大会。出席大会人员合影。第一排左起：孔从洲、何柱国、王炳南、刘澜涛、廖承志、王震、邓颖超、习仲勋、谷牧、刘鼎、吕正操、马文瑞。第二排左起：杨拯民(2)、张学铭(5)、阎揆要(7)、平杰三(10)、汪锋(11)、宋黎(12)、孙作宾(13)。第三排左起：杨荫东(1)、李慕愚(2)、贾桂藩(5)、杨拯坤(6)、杜瑞兰(8)。





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纪念

1983年12月6日，杨虎城将军纪念馆于西安止园开放。王震剪彩。

同日，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集会，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前来西安参加纪念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吕正操、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汪锋、王炳南、孔从洲。政协辽宁省委员会主席宋黎等。陕西省党政负责人马文瑞、李庆伟等。杨虎城将军的亲属杨拯民、杨拯坤、杨拯美、杨拯英、杨拯汉等。纪念会由政协陕西省委员会主席吕剑人主持。马文瑞在会上讲了话。

杨虎城将军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





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开放剪彩。剪彩者：王震。



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部分参加者。一排左起：王炳南(2)、马文瑞(3)、杨拯民(5)，二排右起：陈元方(3)、吕剑人(4)，三排左起：范明(2)。

虎城将军纪念馆开放剪彩仪



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开放剪彩仪式部分参加者。前排左起：赵铭锦、陈芳、杨拯坤、汪锋、马文瑞、杨拯民、陈英、孙铭。后排左起：何承华(2)、范明(5)、陈元方(7)。

后 记

本书的编纂，始于1982年，脱稿于1986年9月，历时四年多。其间，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图片的搜集方面。

本书采用的图片，共703幅，它的编排，大体以时间为序。这些图片是从搜集到的3000多幅中筛选的。上限起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下限止于1937年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正式形成和抗日战争开始。有些图片，如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留西安期间的图片，仍付阙如。这可能是当时没有留下镜头。

图片，是用感光材料记录下来的历史资料，它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事件、景物和人物的真实画面，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十分珍贵。但还须有简要的文字说明，方可取得背景清楚、文图并茂、相得益彰之效。本书是力图作到这一点的。缺点与不足之处，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编纂中，得到各方面的赞同与支持。先后为本书提供图片的有：政协陕西省委员会、西安电影制片厂、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共青团陕西省委员会青运史研究室、陕西省档案馆、陕西师范大学电化教学资料室、解放军画报社和米暂沉、张协和、俱瑛、王玉瓚、孙铭九、汪锋、宋黎、刘鼎、董学源、李连璧、杨拯英、朱平、聂景德、丁志明、刘芳、刘永端、蒲望文、曹冠群、刘日修、王宏谋、杜永诚、王喜得、黄葳、白茜、彭毓泰、孔从洲、赵元杰、王文、刘冀、赵一民、李慕愚、马忠义、杨中州、黄云兴、崔廷儒等。还有周梵伯先生帮助我们鉴定了图片上的有关人物。谨向这些团体单位和个人，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书由本会委托陈元方、史础农编著。顾问张协和。图片拍摄陈击、郭佑民、路辛安。绘图王玉瓚、赵瑾、董国祥。

本书经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审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批准出版。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6年9月于西安

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陈元方 史础农 编著

主编：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出版：长 城 出 版 社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40号)

陕 西 旅 游 出 版 社 (西安市长安路)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印刷厂 (北京花园路)

87·1092 82 16开 181千字 90°000 10865

4500,001 1.000

11,00·12 2.00 17,00

责任编辑:

李 铁 杨赞贤 马忠义

装帧设计:

郭道义 冯大海

统一书号: 11269·13

定 价: 13.00元

责任编辑：

李 铁 杨赞贤 马忠义

装帧设计：

郭道义 冯大海

统一书号：11269·13

定 价：13.00元